

[日] 纘纘 厚——著 毕克寒——译

# “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

“聖断” 虚構と昭和天皇



## FICTION OF THE EMPEROR'S DECISION AND THE JAPANESE EMPEROR SHOWA

●本书明确地阐明为了摆脱“圣断论”，着眼于新的战后史，分析被虚构的“圣断”事实，及导致“圣断”的政治过程。其根本既不是“圣断”也不是“英断”，而是为了国体护持，昭和天皇的犹豫之断。



# “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

FICTION OF THE EMPEROR'S  
DECISION AND THE JAPANESE EMPEROR SHOWA

ISBN 978-7-5549-1021-4




9 787554 910214 >

定价：27.80元

# “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

[日] 額 纈 厚 著 毕克寒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6 - 2015 - 86 号

© 毕克寒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断”的虚构与昭和天皇 / (日) 纘纘厚著; 毕克寒译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549 - 1021 - 4

I. ①圣… II. ①纘… ②毕… III. ①日本—现代史—研究  
IV. ①K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471 号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200 千字 图片 5 幅

印张 11

定价 27.80 元

译者 毕克寒

责任编辑 刘 琛

责任校对 张 权

封面设计 王 萌

版式设计 王 萌

# PREFACE



## 前言

### 何谓“圣断”

昭和时代已经结束近二十年了。在昭和时代接近尾声的同时，作为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体制的支柱，以美苏为中心的东西冷战格局也迎来了尾声。

在东西冷战格局的国际秩序和战后日本保守体制中，象征天皇制也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也可以认为是这两种内外体制支撑了象征天皇制。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虽然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但事实上对日本实施了间接统治。在亚洲，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默认着战前势力残存的同时，试图维持和重建日本的保守体制。在这种保守体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就是战后天皇制。

正是美国的这种构想导致了战败后日本面临天皇制存亡危机的天皇及其势力，在战后全力配合美国的占领政策：积极地提出缔

结日美安保条约、由美国对冲绳进行军政统治提案等，也由于昭和天皇理解了在美国的亚洲战略里日本的利害关系，所以才积极地付诸行动。在战后的保守体制和冷战体制的相互作用下，战后的天皇制被保留下来。在此条件下为确保天皇制的稳定性，就有必要掩盖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有必要正面描写出昭和天皇作为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原动力，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之前的战争正是昭和天皇的决断，即所谓的“圣断”，才促成了“终战”这个概念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体制发生了动摇。“圣断”作为补救方法，强调了其与天皇制的互补关系。

在下文中，关于何谓“圣断”这个话题加以说明

何谓大日本帝国宪法（1899年2月11日制定，以下称明治宪法），简而言之，就是多元化联合体。也就是在军部、议会、官僚等国家机构并立共存的关系中构成，以天皇执掌大权的形式来保持统一的机制。和平时期，这个多元联合体没有产生较大的问题，即使各机构之间产生对立和不满，以天皇权力也能掌控全局。

换言之，和平时期的天皇以宪法的立宪主义为施政方针；紧急时期以绝对主义为施政方针；以“圣断”的方式收拾政治残局。对此，制定宪法的伊藤博文，在最初就说明了它的必然性。伊藤在给井上馨的信中曾记述“有必要以诏书的形式，表示圣断



的决心，说明圣断的意义所在”（信夫清三郎《圣断的历史学》）。

由此可见，“圣断”是在明治宪法体制最初蕴含着的一种政治体制。“圣断”作为行使战前政治的最后手段，以决定性的强制力，在政治体制中发挥了超越明治宪法的作用。

昭和天皇在即位后，最大限度地按照立宪主义的原则行事，然而，在准战时体制向战时体制过渡时期，直至与英美开战以后，在非常时期的政治环境中，“圣断”这种政治体制一直左右着日本的政治。在国家体制危机暴露最为明显的非常时期，天皇实行绝对主义方针，抛出“圣断”这种绝对政治体制。昭和天皇在“二二六事件”决定日美开战和承认战败时运用政治体制镇压叛乱，企图以发动战争的方式扩张天皇制国家，结束战败的残局，都以“圣断”成功地完成了保护天皇制和国土完整的使命。

“圣断”在战败的决定过程中，不仅成功地维持了国体，也使战后天皇制的实质得到了宣传。不仅如此，在战后的政治中，通过大力宣传“昭和天皇的英断”，使本应是战争最大责任者的昭和天皇被歌颂为“救国英雄”；原本是以逃避战争责任为目的的伪装，也不断升级，甚至给予昭和天皇以“和平主义者”的评价。

清本溯源，本书的目的是以证言记录，明确昭和天皇时期的政治发展方向。



### “圣断”与战后“圣断论”之间

“圣断”这种政治体制，具体来说多数是由御前会议等非立宪机关来引导的。本书是从打倒东条英机内阁运动开始，到决定战败为结束，并以这种政治体制为契机，探索多个政治集团为执笔的起点。打倒东条内阁运动的最大目的是保守天皇制支配国家体制，即“国体护持”，同时也是从主战派手中夺取战争指导权，为了战前的保守政治权力向战后转变而设置的政治决断。为了在战后恢复保守权力体制，急于在历史认识中抹杀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战败责任。因此，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同时，也大力宣传“圣断论”。随着战后保守政治权力体制的稳定，“圣断论”彻底渗透进了日本国民意识中。

媒体，在操作舆论和形成舆论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以区分战前和战后关联性的方式，把日本国民从战败意识中解放出来。战后保留天皇制也成了战后社会的一种潮流。昭和天皇在地方巡幸时，各地方纷纷出现狂热的欢迎场面；国民体育大会上成为开会宣言人；观赏相扑比赛时，频繁地出现在日本国民面前……均包括并体现了普及“圣断论”的意图。

虽然，在昭和天皇访问欧洲和美国期间，特别是在欧洲访问时，也出现了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氛围，但这仅是例外的事例而已。昭和天皇的行为在某种情况下，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圣断论”与其说是上层灌输给下层的，还不如说是很





多日本国民意愿中的“历史故事”。这种“历史故事”不仅安慰了日本国民战败的心灵，事实上还孕育出了日本战后复兴的活力。但是，它搁浅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意识，同时也剥夺了面对及质疑、指责此类问题的机会。

由天皇的“圣断”开始的战争被称为“正义的战争”或“圣战”，战败不过是没有完成这个崇高目的的结果，这已成为日本普遍的历史认识。把战败换成“终战”这种中立的言辞，也是在这种原因和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东西冷战结束已近十年，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仍然存在肯定“圣断论”的舆论倾向。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以政治理念和思想为论点的争议中，甚至可以说“新天皇主义”和天皇支持论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

在多数情况下，日本社会中由“圣断论”形成的对天皇制的认识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因此，揭露昭和天皇“圣断”的真相，重新考证战后昭和史和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战前作为政治体制，把日本引向侵略战争的“圣断”；战后把战败换成“终战”，甚至“圣断论”还起到了隐瞒侵略战争的本质作用。而战后的昭和天皇却作为和平主义者、和平再建的功臣被赞扬。“圣断论”的“圣断”作为一个专有词汇，概括了其潜在的问题。在本书中，主要以其用意来使用“圣断”这一说



法。

本书为了摆脱“圣断论”，着眼于新的战后史，明确地分析被虚构的“圣断”事实，及导致“圣断”的政治过程。阐明了其根本既不是“圣断”也不是“英断”，而是为了国体护持，昭和天皇的犹豫之断。

笔者之所以要指出“圣断”的虚构性，不仅要提出昭和天皇个人判断的正确与否，还要明确“圣断”所蕴含的战后构想和战争意识给战后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导致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不能真诚地面对历史的局面。

本书内容是从东条英机内阁末期开始，也就是说，从打倒东条英机运动开始的政治过程到接受日本战败的历史现实。为了不使战争责任涉及昭和天皇及其周围党羽，围绕接受波茨坦宣言，宫中、重臣党羽和盟国之间进行了反复的外交接触，因此提出了固有天皇制的政治体制。

因此，天皇及其党羽，最终成功地取得了战后复权的机会。“圣断”在模糊了战争责任归属的同时，也成为保存战前权利和战后复权的决定因素。本书尝试着由追溯昭和天皇及其集团的言行，来重新明确这段历史事实。

写作本书的目的不仅在于明确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还要论述“圣断”作为政治手段，连接了战前和战后，同时在决定战后天皇制的本质中，也成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太平洋战争也就是作

为“天皇的战争”开始的。更应认识到的是，这场战争事实上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由天皇及其集团发动的“统治者的战争”。

战后被广泛接受的战争认识是：战争这种行为，是偶然连续发生的现象。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的确，这场战争是在没有明确的战略基础上进行的，但实际上是由天皇的意图和命令开始，也是由天皇的意图和命令“终战”而败的。

天皇“终战”决定的过程直到战争末期，也是极为动摇和混乱的。天皇本身也陷入持续战争的意图和接受战败的事实而终战的思想斗争中，这个过程是最需要天皇决断的。但正是由于天皇的犹豫不定，造成了更多的战争死难者。因此，探讨因何使天皇犹豫不决，同时对战前天皇制国家的性质也将有新的认识。换言之，追溯“圣断”推迟的理由，可使天皇及军部等战前权力体制的本质更加明显地表露。本书由此入笔，希望通过此书，清楚地认识过去的战争，并进一步指出因战争所应吸取的教训。

另外，在引用资料中，没有将片假名书体全部改写为平假名书体。

# PREFACE



## 目录

### 前 言

何谓“圣断” / 1

“圣断”与战后的“圣断论”之间 / 4

### 第一章 秘密开始的“终战”工作

#### 1 迫使东条内阁倒台

党羽的活动 / 1

谁将作为重臣会议的出席者 / 3

木户拒绝调停 / 4

天皇信任东条 / 9

在东条拥护论中 / 11

#### 2 打倒东条内阁的过程

木户的心理变化 / 13

围绕主导权的斗争 / 16





执行天皇的意愿 / 19

党羽所列出的打倒东条内阁计划 / 22

### 3 处于劣势的主战派势力

近卫一木户集团的形成 / 24

穷途末路的执政者 / 26

不再支持天皇、东条 / 29

从打倒工作到“终战”工作 / 32

## 第二章 天皇持续战争的意图和“终战”工作

### 1 推迟“终战”工作

与主战派的妥协 / 35

成立小矶内阁的缘由 / 37

独占政权的一方 / 40

坚持继续战争路线 / 43

### 2 与“和平”工作的关联

迈向遥远的和平 / 45

“和平”工作的迹象 / 48

国体护持论 / 51

顽固的天皇续战意图 / 54

### 3 转变天皇的续战意图

与陆军立场一致的木户 / 57

近卫的上奏文和天皇的反应 / 59

鲁莽地指导战争 / 61

倾向“终战”工作 / 64

### 第三章 决定“圣断”的过程及其真相

#### 1 “圣断”初期的设想

“稳健派”势力的复权 / 67

“和平”工作被封杀 / 70

迫使天皇“决断” / 73

收拾残局的对策试行方案 / 75

#### 2 对苏工作与转换政策的决心

以苏联为中介 / 78

政策转变的决议 / 80

对苏外交工作受挫 / 83

天皇的亲笔信 / 86

#### 3 采用“圣断”方式的原因

《波茨坦宣言》的发布 / 89

等死而已 / 92

围绕接受《宣言》 / 95

收拾时局的最后方案 / 98



## 第四章 被继承下来的“圣断神话”

### 1 决定投降前后的昭和天皇

认不清时局的天皇 / 102

天皇的动摇和变节 / 106

围绕捍卫国体的对立 / 108

第二次“圣断” / 111

《终战诏书》 / 113

“圣断神话”的形成 / 117

### 2 战后“圣断论”的流传和意义

战后“圣断神话”的形成过程 / 120

旨在战后保持天皇制的“圣断论” / 124

“圣断论”的渗透与战后天皇制的再生 / 126

改朝换代与后冷战时期的“圣断论” / 130

结束语 / 134

后记 / 139

引用·参考文献 / 143

关联年表 / 156

## 第一章

### 秘密开始的“终战”工作

“军务局和宪兵，以东条的名义为所欲为。我不认为东条是那种人。像他是一个能把我的意图完全执行的人”

——昭和天皇的发言（木下道雄《侧近日志》）

## 1 迫使东条内阁倒台

### 党羽的活动

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8日，日美开战，日军势如破竹。自1942年（昭和十七年）8月7日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登陆以来，开始转为守势。争夺岛屿战中，日、美两军展开血战，日军不断投入兵力，结果是年末做出了撤退的决定（撤退结束于次年2月）。

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日军损失了很多运输船只，导致海上输送能力明显下降。不仅如此，通过这次战斗，日本的战争领导层陷入了深度的分裂，各种矛盾相继而出。发动瓜达尔卡纳尔岛作





战之前，日本海军为了阻止美军进攻，策划了进攻夏威夷和澳洲；而陆军为了对抗苏联，计划增强关东军和中国大陆的兵力。在最需要陆海军协同作战的时期，陆海军各方只强调自己计划的优越性，没有协同作战的表现。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占领计划，在陆、海军没有充分协调好的前提下，实施了FS作战（切断美澳作战）。陆、海军在作战中配合不好，也低估了美军的反抗能力和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进攻速度，因此导致惨败的结局。

开战以来不断进攻的日军，由瓜达尔卡纳尔岛败退开始转为守势。加上由于美军增强航空兵力和大量建造航母，从1943年开始，日美军战斗力差异急剧加速，最终美军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导权。

为此，1943年（昭和十八年）9月30日天皇召开了御前会议，在采用的《今后应实行的战争指导大纲》中，决定缩小战线。以千岛、小笠原、内南洋、新几内亚岛西部、苏门答腊、缅甸为防线，其内侧为“应绝对确保区域”，并称此为“绝对国防圈”。

然而，此方针并不能认为是在陆、海军完全同意的基础上决定的。事实上，死守“绝对国防圈”需要频繁地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南方战场，而陆军却把保障和扩大中国占领区置于主要地位，不积极合作，不积极响应用陆军保卫海洋的战略构想，因此被抽调的多是装备上不完整的部队。

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岛反攻中，随着日本守军“玉碎”



和战局不断恶化，东条内阁对开始动摇的战争指导机构进行了强化。因为东条内阁的政治根基仅在于：天皇的信任和开战以来取得的胜利，战局一旦恶化就导致了东条内阁的衰弱。另外，有着首相经历的重臣们对战局的恶化和东条英机的一意孤行一直抱有不满意，开始加强相互联系，试图介入政局。

### 谁将作为重臣会议的出席者

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名为“重臣”的人如何选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东条英机内阁后期被称为重臣的人设置了重臣会议，可提出一定政治见解。

最初，重臣认定是以被称为“最后的元老”的西园寺公望的意向来决定的。西园寺去世（1940年）后，关于重臣的认定则有各种说法，选定工作并不顺利。西园寺生前，是以汤浅仓平内大臣、木户幸一内大臣秘书官长（后任内大臣），加上前首相近卫文麿、冈田启介等为中心，事实上西园寺保持的后继人选指名权，一直成功地实施并作为内大臣和重臣的协议结果。由此可见，重臣会议和内大臣一样是西园寺主导政权所不可缺少的政治手段。

继承西园寺的遗志，近卫文麿、冈田启介、平沼骐一郎继续利用权力，并得到米内光政、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广田弘毅的加入，向东条施加压力，阻止其一意孤行，迫使其尽早下台，以构造举国一致的政治形势。

可是，在重臣之间，并没有策划出确切的能迫使东条英机下台



的计划。从当年到次年二月，在东条和重臣之间举行了五次会议，仅仅是期待着东条向重臣靠拢，而重臣之间却失去了相互间的协调与配合。

东条对掌握政局失去自信，试图以取得重臣的支持来稳定政局。1943年（昭和十八年）8月30日，在东京九段的华族会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政府方面有东条首相、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海相嶋田繁太郎、藏相贺屋兴宣、外相重光葵等出席。

会议主要是听取东条汇报实际政局，并没有实现迫使东条反省、下台的意图。1944年（昭和十九年）6月21日召开的首相官邸重臣会议开始实施反对东条的计划。

重臣在会议以外，也试图发表反对东条内阁的言论，酝酿气势。但是在东条授意的宪兵监视下，打倒东条内阁运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其结果是，打倒东条内阁工作没有成为公开的政治运动，在躲避监视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暗中进行。

#### 木户拒绝调停

反东条浪潮不仅在政界上层展开，也扩大到在开战最初曾支持东条内阁的日本共产党（青田益三）、建国会（赤尾敏）、国粹大众党（川良一）、日本赤城会（桥本欣五郎）等右翼团体。为整合政治力量结成的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会长为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原首相），将这些右翼团体逼向解散的边缘，以此为契机打出反东条的



旗帜。

其中，东方会会长兼众议院议员中野正刚在《朝日新闻》发表的《战时宰相论》（1943年1月1日）中彻底批判实施独裁政治的东条内阁，煽动国民心理。文章的一部分内容如下所述：

“非常时期要求首相绝对的坚强，然而作为个人的坚强是有限的。作为首相真正的坚强需要与国民的爱国热情同步，需要时而鼓舞他，时而被他激励。——统辖着大日本帝国的是世界一流的皇室。其必备的是，非常时期的首相一定要是盖世英雄，才能完成此任务。此时日本的非常时期首相应具有临时受命的素质，不能只想着要英雄的盛名。”

中野正刚虽然强烈地批判东条英机的独裁执政，但这是以天皇的绝对统治为前提的。在天皇面前既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独裁者，这才是所谓的日本的国体。他把东条作为英雄来提起，也是因为他挑起了反对天皇的旗帜。

此时中野所代表的东条独裁论，在暗地里已经非常活跃了。现实中，勤皇诚结会（天野辰夫）的核心刊物《维新公论》激烈地批判东条。然而，受东条政府的镇压，言论被封杀了。至于中野，在1943年10月被宪兵队逮捕拘禁，最后在家中被逼自杀。这段真相至今还没有被公开。

这些右翼团体在成为有组织的运动之前被分割，没有成为改变东条政治的力量。而且，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左翼和民众，其潜在的



对东条内阁的不满，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也几乎没有爆发的可能性。

在反东条内阁运动被分割的情况下，是皇族和重臣党羽将东条内阁逼上了穷途，也就是密谋策划的倒阁运行。在这里，作为推动战争的内阁、得到天皇信任的东条成了被批判打倒的对象。

重臣和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直到最后，仍坚持对天皇支持的东条方针做出不懈的抗争，实现了打倒东条内阁的目标。从而通过打倒东条内阁工作集结的政治力量，策划新的政治目标即“终战”工作。

作为重臣身边的柳川平助陆军中将（原大政翼赞会副总裁）提出鲜明的反东条口号，并提出打倒东条内阁的具体方法：一面在帝国议会和枢密顾问官会议上陈述批判东条英机；一面通过重臣和高松宫（宣仁，海相）、伏见宫（博恭，前军令部总长）等皇族以上奏的方式提出东条内阁下台的必要性。



冈田启介

在此期间，重臣也上奏天皇，召开重臣会议。但是，此提案由于重臣们没有团结一致，没有能够立即实现。

在重臣中，对打倒东条内阁活动最踊跃的是冈田启介（“二二六事件”当时的首相）。与近卫文麿计划不同的是，冈田迫使东条内阁下台的唯一方法是联合深受天皇信赖的重臣党羽，让他们一致反对东条，并将其上奏天皇。



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4日，冈田策划实施了反对东条的第一步，弹劾海军部没有实力的嶋田繁太郎海相，并让对嶋田有影响力的伏见宫来劝其辞职。从而，东条内阁被打开缺口，成为东条内阁总辞职的突破口。

6月6日，冈田启介让木户劝嶋田辞职，结果木户通过东条的秘书官赤松贞夫要求嶋田辞职。6月8日，冈田直接与嶋田会谈要求其辞职，并且在这个时期避开了自己的提案。

10月29日，冈田在华族会馆与近卫会谈，席间就对东条内阁不满的见解达成共识。此时双方都没有打倒东条内阁的具体方法和提案。

冈田提到对会谈的感想时说，“东条内阁的执政已经无可挽回，很多人也有同感，可没有办法使其下台。近卫先生也没有提案”。

冈田对近卫有以下失望的评价，即：“如果说狡猾，那近卫最狡猾。让海军来担当此任，是很冒失的，在重臣恳谈会上我也曾想过让海军倒阁，可是行不通”（“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冈田大将时局谈其他”，伊藤隆编《高木惣吉日记和情报》下卷），结果冈田与反东条运动的伙伴——近卫开始产生分歧。

为迎合冈田的进言，以近卫为中心的党羽在与以东条为首的陆军强硬派对抗时，就战斗机分配问题和作战计划进展上，持续与海军对立并单列计划。

吉田茂（战后首相）、殖田俊吉（田中义一内阁时的秘书官、战



后法务局总裁)等近卫的智囊团,推举近卫文麿的亲信小林跻造担任海军大将,由此与代表东条的陆军统治派对立。呈劣势的陆军皇道派真崎甚三郎大将、小畑敏四郎中将被提升为陆相,试图一举掌握政局主导权。

参与这次组建新内阁近卫的智囊团之一——酒井镐次陆军中将(开战最初任参谋本部顾问)在第二年以后发表意见:“将要面临战败,战斗是徒劳的。东条无能,陆军政权无能,为了挽回时局只有建立海军内阁”(高木惣吉《高木惣吉日记》昭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的记载),强烈要求成立海军内阁。

然而,成立海军内阁的构想并没有得到天皇的应允,同时可以想象,这种方案也不是木户幸一等宫中集团所能接受的。虽然计划以近卫为中心秘密进行着,可是海军出身的冈田启介并没有参与计划的意向。假设冈田知道此计划,在皇道派系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政变”时,作为当时首相的冈田启介则不会有着九死一生的经历。

冈田通过“二二六政变”得知天皇对皇道派系军官不满,因此没有参与此计划。和冈田、近卫一同参与打倒东条内阁运动的木户,再次说“很难找到可以代替东条的人选”,进而“加强海军的统帅部,就要考虑有力的大臣人选”(《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木户内大臣谈要旨》,伊藤隆编《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明显对东条有着较深的信任感。

因此在1943年这一阶段,重臣间虽潜藏着反东条情绪,但却没

有形成规模。“要求东条下台”真正成为政局焦点是在1944年（昭和十九年）以后的事。

### 天皇信任东条

东条为了对抗重臣的倒阁运动，试图强化其内阁的实力和战争指挥权力。

1944年2月17日，在中部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基地图瓦卢群岛遭美军空袭，日本海军受到重创。次日，东条英机与内大臣木户幸一会谈，以参谋总长、次长二人制（分别分管作战和后勤）来强化统帅力度，以此强化内阁机制，加强与重臣和财界的接触，提案改造内阁，在宫中设置天皇亲政的大本营。

最终，东条任命石渡庄太郎为藏相；内田信也为农商大臣；财界的五岛庆太为运输通信大臣。对东条来说这是第二次改造内阁，由于多数阁僚是自荐入阁的，所以与当初的内阁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东条想通过这次改造，与财界、官界等各集团达成妥协，以延续政权。在改编统帅部的工作中，东条自己兼任参谋总长，海相嶋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总长，后宫淳和秦彦三郎任参谋次长，塚原二郎和伊藤整一任军令部次长。

从此，东条英机身兼首相、陆相、参谋总长三职，并且由与东条关系密切的嶋田海相就



东条英机





任军令部总长，东条内阁同时集国务和统帅大权于一身，从1944年（昭和十九年）2月21日起，便形成了强有力的斗争态势。

迄今为止，日本的战争指导形式仍是以国务、统帅分离为原则的。东条这次以国务最高权力人兼任统帅最高权力人的方式，实则否定了军队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因此受到统帅部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19日召开的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陆军三长官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曾向东条抗议：“在传统上，统帅和政务不能合一，这是传统的原则。陆相和总长兼任，即是政治和军队混淆。”对此，东条并不在意地解释说：“陛下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参谋本部编《杉山记录》下卷）。

东条尽早地达到了靠拢天皇的目的，并使天皇对杉山下达了协助东条三职兼任命令：“向东条确定了其想法，东条也表示要小心行事。”（东条英机刊行会编《东条英机》）

另外，根据木户的记载，天皇曾问起兼任参谋总长是否影响统帅权。对此东条回答说：“现在的战争阶段，如能形成政治追随作战的态势，没有弊害。”（木户幸一《木户幸一日记》下卷昭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

从此，在天皇的支持下，东条实现了权力集中。然而，这并没能使东条内阁的政治、战争指导态势得到加强。也就是说，统帅部依然固守既得权力，不让政治介入战争指挥中。重要的战争指挥由统帅部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掌握主导权。

尤为重要的是，东条为了强行将权力集于一身，反而推进了国体和军队统帅的分裂。从此，以宪兵为后盾的东条政权，招来了更多的不满，以至于潜在的打倒东条内阁的呼声，迅速高涨。

策划打倒东条内阁的团体有包括吉田茂、殖田俊吉在内的近卫文麿集团，还有与近卫交往深厚的外交官僚及酒井镐次、高木惣吉等海军派。

近卫内阁的主要中坚富田健治（近卫内阁时期的书记官长）、高松宫等的政治秘书细川护贞（近卫内阁时期的首相秘书官）也在计划中起联络作用。除此以外，还有以大藏公望为中心的宇垣一成集团；东久迩宫为中心的石原莞尔集团；试图组建以陆军大将寺内寿一为内阁的岸信介、松前重义集团。

这些主要的政治集团，虽然就打倒东条内阁达成一致，但是对打倒东条以后的政权构想和政局运营各持己见。因此，这些集团党羽能够为“终战”凝聚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小。

### 在东条拥护论中

为了对抗冈田等人提出的东条下台要求，高松宫和东久迩宫与木户一起转向支持东条。他们支持东条的行为即可代表天皇的意向。

作为天皇的兄弟，高松宫面对政界各方掀起的反东条内阁浪潮，向细川护贞表达了支持东条的心态：“虽然说东条不行，可又能让谁来做呢。如果没有可替代的人选，就尽量去想办法援助东条内阁吧。”（细川护贞《细川日记》昭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后）



在重臣中，作为打倒东条内阁的关键人物——木户幸一，于1943年3月对作田高太郎代议士说过如下言论：“可以说对东条有不满，但是我又能怎样呢。让我负推荐的责任吗？那样的话不论是谁，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负面评价的。另外对深得信任的东条我是不能要求他辞职的，也不可能要求天皇罢免东条”（木户内大臣谈，前揭《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昭和十九年三月）。

木户内大臣同时也对批判代表冈田大将的嶋田海相抱有不满，发表过如下意见：“海军对自己的上司抱有不满，要弹劾他，就要同时打倒东条内阁，这是很狭隘的想法。”

原本东条英机就深得天皇信任，因此在日美即将开战时，被木户幸一等人推举到首相的位置。冈田启介等人以战局恶化为理由要推翻东条内阁，分明会招致木户和天皇的不信任。于是，冈田为实现打倒东条内阁不断摸索着各种方法。

同年3月11日，冈田再次与伏见宫面谈，汇报了海军内部对嶋田海相的不满。此时的伏见宫对曾经是自己部下的嶋田海相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使冈田没能实现借伏见宫的力量来解任嶋田海相的计划。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伏见宫与嶋田的亲密关系，还证明了包括伏见宫在内的重臣、皇族的政治倾向，反映出反对东条内阁的时机还未成熟。

接下来冈田于次月12日与木户会谈，向木户幸一表明了东条为了强化内阁，实施了兼任参谋总长和任命嶋田海相兼任军令部总长



的动机，其目的是让国务和军队统帅一体化来延长东条内阁的执政寿命。在此会谈中，冈田向木户询问了他和天皇对东条内阁的看法。

木户向冈田回答说：“现在替换东条很困难，陆相兼任军需大臣使东条过于权力集中。如果他让出陆相，设置专人；或把军需大臣移交海军，这些都是东条不愿意则办不到的事”（前揭《高木惣吉日记》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前后）。同样伏见宫也不同意解任嶋田海相的要求。

自从东条肩负重任以来，木户没有改变一贯支持东条、支持陆军的态度。天皇也持这种态度。打倒东条内阁的活动，是以冈田为中心开展的，在重臣中没有统一的步伐，但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反东条——反陆军的势力，为以后国内政局的展开做了准备。与开战以来即得到天皇信任和支持、在战争指导和政治指导两方面实施独裁、独断地实施战争指导的东条内阁和主战派势力，形成有力的对抗势力。在战局恶化的同时，以打倒东条内阁为政治目标而聚集的宫中重臣，起到了一定的政治作用，但并没有形成被之后称为“稳健派”或“和平派”的政治势力。

## 2 打倒东条内阁的过程

### 木户的心理变化

与冈田启介共同实施“倒阁”的近卫文麿，在1944年以后，



“倒阁”的意图更加明显了。在和细川沪贞的会谈中，近卫谈道：“我深深地感受到悲惨的失败，（中略）如果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巴布尔陷落了，统帅部一定会辞职的，也许还会辞去东条内阁的职务”（《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二月一日前后）。为了让东条内阁承担起战局恶化的责任而辞职，开始有了新的进展。

然而，近卫集团中的富田健治却对推翻东条内阁抱有谨慎的态度，他表示：“现在很难找到打开时局的办法，并且在他还没有失去天皇信任的情况下，发动政变不可行。作为现实问题，如果事态不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打倒东条也许是不可能的”（《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二月七日前后）。

富田健治的言论，说明了天皇支持东条的态度是打倒东条内阁活动进展的最大障碍。



木户幸一

在很多高级军事官僚印象中，东条是忠于天皇的，因此深得天皇的信赖。在日美即将开战之际，为组成强有力的战争指导内阁，天皇委东条以重任，东条的推荐人木户也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启用东条的原因：“东条就任陆相以来，对陛下的意见尊重执行。这虽然是陆军军人共同的作风，可是东条却更为突出”（木户日记研究会编《木户幸一日记》“东京裁判期”昭和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前后）。

另外，天皇在战败后的回忆录中，对东条的“宪兵政治”做过

如下的评价：“东条兼任各省大臣，自己的意见被贯彻实施，也许是军务局和宪兵借东条的名，为所欲为。我想东条本身并不是那样的人。没有人像他那样忠诚地执行我的命令”（木下道雄《侧近日志》昭和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前后）。由此可见，在战后对东条评价不一的时候，天皇仍然没有放弃对东条的信任。

“倒阁”工作的核心人物细川沪贞，在2月15日召开的海军恳谈会上说：“为了打开局面，想到除了政变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是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天皇对东条的深厚信任，如果实施政变也许会有相反的效果，至于为何天皇如此信任东条，却不得而知”（《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

不论是细川沪贞还是木户幸一，都深知天皇的此意。由此证言可以看出，天皇对东条的信任是阻碍东条内阁下台的最大原因。

为改变天皇的这种态度，细川沪贞一边展开“倒阁”工作，一边靠近皇族，想最后说服高松宫。高松宫对此表示：“天皇所说的，是由天皇的性格决定的，打倒东条是办不到的。如果有了东条内阁倒台的环境，我想就简单了”（《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昭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前后）。至关重要的是，团结重臣、说服天皇才是“倒阁”工作的重要条件。

进入四月，在重臣当中，一直支持东条的木户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近卫的证言有如下记载：“最近木户对东条的评价逐渐下降，在



十一日会上也对东条表示不满。说东条妄断孤行。我想可能是对东条内阁的认识有所变化”（近卫公政局谈，《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后）。

同时，此事在细川沪贞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木户侯，自身也加入反东条阵营中来”（《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六月七日前后）。

根据佐々弘雄（当时《朝日新闻》记者）的记录，木户和东条面谈时，追问东条：“近来国内外局势不好，如何打算？”东条回答说：“遗憾的是民心偏离政府，可是既然有天皇的信任就不能坐视不问。”

对此木户表示：“从此对东条的重用，应该谨慎上奏天皇后决定”（昭和十九年五月二日佐々弘雄氏，前揭《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

从此木户转向了鲜明的对东条批判的立场，虽然没有表面的反对，但是开始同近卫、冈田等人联合，协助了打倒东条内阁的工作。

接下来，宫中、重臣集团借势开展具体“倒东”工作：6月15日美军塞班岛登陆成功，6月19日马里亚纳海战，日本海军惨败（损失航空母舰3艘、战机430架）；7月7日塞班日军3万人战死（居民约死亡1万），塞班失陷。

### 围绕主导权的斗争

当时被认为是东条内阁支持派的东久迩宫揆彦（时任防卫总司

令官兼军事参议官)在日记中记载了对东条英机提问的回答。内容如下:东条问:“最近我对自己越来越没自信了,如果有合适人选的话,我想辞职。”回答说:“现在绝对不可以,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东久迩宫捻彦《皇族的战争日记》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东条到防卫司令部提出:“战争的前景不好,内阁方针受阻,我打算辞职。”东久迩宫以支持其内阁为立场,鼓励他说:“现在辞职太不负责任了,如果想辞职的话,处理好战后的问题,讲和与否,做好善后工作再辞职。”(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东条接受建议并放弃了其内阁总辞职的打算。

根据《近卫日记》记载,东久迩宫对近卫说:“我认为应该让东条负起战争的全部责任,过错也全部是东条的过错,全部的责任让东条来承担。内阁交接的话,责任可能会转到皇室,所以这次让东条负责到底是上策”(《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阐述了战局恶化的责任全部由东条承担的见解。

此见解在重臣中被广泛传播,引起了对东条的厌恶情绪。在此之前,近卫也曾对东久迩宫说:“既然东条和希特勒一样被世界所批判,那就让他负全部责任吧”(《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也就是说,让东条英机做替罪羊,集所有的战争责任于一人,从而避免国民的怨念指向天皇及皇族——这种宫中、重臣的保守思





想随着政局的进展更加浓厚。

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细川沪贞、富田健治等人抱有疑问，然而逐渐倒向反东条立场的木户幸一，在会见近卫时做了如下表态：

“尽可能让东条内阁持续下去，在最后关头——受到大规模的空袭和本土登陆时组建新内阁，推举宫殿下（东久迩宫）为总理。即使东条下台，准备组建的新内阁也只能坚持两三个月，由那儿开始，建立彻底逆转方针的内阁。您所说是正确的，可是国民对现在的局势并不了解，即使组建新内阁，也未必会得到支持。因此，不得不在大规模空袭和本土登陆之后，使国民开始觉醒。”（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此内容对于了解打倒东条内阁的目的及在其过程中“终战”工作的真相，以及对此默认为天皇的态度等，成为重要的证言。也表明了当时“倒阁派”希望给对手一次打击，在有利的战局下促成讲和。例如，东久迩宫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在与近卫的谈话中，认为有必要更换东条内阁，并为此设想各种办法。日本海军尚有决战的实力，集中陆海军的航空兵力，给美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换取和谈的有利地位”。（《皇族的战争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

也就是，以国民为人质和牺牲为代价，来转变局势的政策方针，在此谈话后付诸实践。天皇固执地坚持战争，几次计划最后打击美



军，导致错过了结束战争的机会。对此，下文做详细说明。

在这种政策转换的方针下，宫中、重臣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的行动，即“终战”工作与“和平”工作。其中有很多是不能向民众公开的。

一边策划政策逆转，一边进行打倒东条内阁运动，其结果成为争夺政局主导权的斗争。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为了从战争中挽救民众，放弃战争政策，停止对外战争的改革。

在此意义上，当时的打倒东条内阁运动是几股势力围绕政局主导权的斗争，它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并无根本关系。

### 执行天皇的意愿

在此后，担任打倒东条内阁运动主要角色的木户幸一，经过与重臣党羽的协商，作出了以下结论：

“一、国家如果决定停止战争的话，后组内阁就非东久迩宫来接任不可。但是，如战争不能立即停止，就要慎重斟酌。二、在终战时，为防止陆军、海军、政府、国民相互推卸责任，天皇有必要明确全部责任于一身。三、如果不明确责任的话，对东条也应有适当的处置。”（前掲《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六月二日）

由此可见，木户幸一赞成打倒东条内阁，也就东条内阁总辞职后，何人以何种方式接班这一问题试图与重臣达成一致。但关键是在何时以何事能使天皇放弃对东条的信任。



事实上，天皇仍然对东条抱有幻想，并决定不取得一定的胜利就不和谈。想要改变天皇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天皇在接受高松宫及重臣对战局恶化和对东条政治不满的上奏时，坚持说：“不要听皇族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毅然表明坚持维护东条内阁的态度。

天皇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持续到东条下台以后，直到“终战”工作正式开始的1945年（昭和二十年）初，没有任何根本改变。天皇对冲绳会战过度的期待，成为推迟“终战”工作最大的原因。

在塞班岛沦陷之前，平沼骐一郎曾说：“与其说东条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倒不如说招来很多抱怨。此时，正是‘天皇’圣断的好时机。所以，请重臣上奏。”（《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二日）

平沼提言由天皇“圣断”来实现东条内阁下台，战局恶化已引起了国民的反皇室情绪，进而，统治阶级所坚持的“国体护持”将面临崩溃。

关于以“圣断”的方式迫使东条内阁下台的方法，由宫中、重臣所提出。例如，富田健治阅读酒井镐次中将起草的读稿：“您和重臣以紧急上奏的方式，避开东条内阁，转向圣令。使总理政策转变，给予敕许。”（《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并试想在实现打倒东条内阁工作后，直接进入“终战”工作的政策方针。



可是此方案并没有直接被采用，细川沪贞说“重臣中两三人认为应该紧急上奏”，高松宫回答“重臣却没有这种能力，即使上奏了，天皇如果问东条君的话，这些也将起不到作用。所以还需要木户幸一进言”（同上，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可见高松宫对此方法依然谨慎，同时强调了天皇对东条英机的信任成了阻碍打倒东条内阁的关键问题。

以“天皇圣断”为政策转变方针，在同年7月2日，近卫在木户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的文书中间也简述了其内容。（《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二日）虽然较长，但其是促成政局转换的重要文书，现做简单介绍如下：

首先，“塞班会战以来，海军承认联合舰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陆军也认为没有希望使战局好转。也就是说，陆海军对战败已经达成了共识。只是没有勇气明说”。统帅部也认为是即将战败之时，由于没有勇气公开，只有靠“天皇书面下问”的方式来打破僵局。

在所有问题中，统帅部预测，将出现“一、立即提出辞职；二、求得圣断；三、对战败的责任逃避，避免明确答复”的局面，希望在其他的环境下彻底澄清。现任内阁总辞职之后，皇族组阁，新内阁的使命是下达停战诏书。

现内阁总辞职后，若不能在短时期内结束战争，组建此内阁可谓“失策”。其原因是：一、敌方将东条和希特勒并列认为是战争的



元凶，集中于其一人，如果出现其他人持续战争，其结果将是战争责任不详，战争责任转向皇室。二、东条一直将倒阁视为阴谋，如果组建中间型的内阁，此说法一定会广泛传开，引起混乱。三、即使继续战争，战局会更加不利，国民会认为由于东条下台而战败，对新内阁的信任度不利。

#### 党羽所列出的打倒东条内阁计划

在这里最受瞩目的是：对战败责任和战争责任的认定，仅限于东条内阁的政治、战争指导过程中。这在国内外被广泛认同。也就是说，在东条赎罪论的诱导下，试图从陆军主战派推出的东条内阁手中夺回政治指导权。

关于停战诏敕准备了三种方案，“鉴于战局的推移，为了不让国民继续付出牺牲，必须做出决断”。“加深皇室与臣民的良好关系，避免思想恶化，爆发革命危及国家”，加上“迅速做好停战工作”，其目的是“国体护持”。

近卫文麿为了达到“国体护持”的目的，主张早期停战的背景是：他深刻意识到如果持续战争将招致人心动摇和混乱，甚至对皇室不满；会出现潜在的左翼分子借机煽动革命等一系列的危险局势。这种对“红色革命”的危机意识，在宫中、重臣中达成了共识，即将“国体护持”“坚持天皇制”的绝对信念视为行动规范。

近卫还指出：“所谓的作为右翼最强硬的结束战争的方式，消灭



英美的主张将转向左翼，意图可想而知。在混乱中很难预测会出现何种局面，因此在败局已定之时，无休止地继续战争对于‘国体护持’是极为危险的。立即停战至关紧急。”

近卫在陆、海军的主战派中发现共产主义的踪影，在败局已定之时反复主张持续战争，也许是在主战派中存在着希望废天皇制，发起共产革命的志向，或受共产主义影响的见证。近卫的这种想法在次年二月著名的《近卫上奏文》中反复地出现。

在本书结束时，前面提到的中间型内阁“失策”，如果停战的真相使军队、国民有异常反应，给皇族内阁的统治带来不便时，在中间型内阁中也不得不加入主战派的强硬分子，最后进行决战，在败局明朗化以后，重新组建皇族内阁。此亦为一提案。

在这里，“中间型内阁”的意思并不明确：第一，近卫在天皇的绝对权威下推翻东条内阁，夺回政治主导权。第二，以近卫等宫中、重臣为中心的势力极力主张继续战争，在取得战果后以有利的条件来缔结停战。

在近卫给木户的文书中，集中阐述了打倒东条内阁工作的行动方针，事实上在此后的政局展开中，大体是符合近卫预想的。小矶内阁是主张继续战争的“中间型内阁”，进一步讲，此后成立的铃木内阁，接受《波茨坦宣言》后，近卫所希望的皇族内阁——东久迩宫内阁成立了。



### 3 处于劣势的主战派势力

#### 近卫—木户集团的形成

近卫文麿的上书很快被木户幸一和东久迩宫重视，七月八日上午，在内大臣官邸，木户与近卫等人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东条英机针对召集的陆军部主要干部，做出了敌军本土登陆时，先放敌人上岸再做歼灭准备的决定。木户说“虽然最后还没有舰队决战，可是战局已经近乎绝望。推卸战败责任在陆海军和其他方面，因此天皇认为自己有必要承担所有的责任，来平息国内的纷争。”（前揭《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八日）现阶段，天皇出面平息政局，即为最现实的选择。

木户对打倒东条内阁的工作没有异议，可是对方法依然持谨慎态度。他提出了有突破性的建议：首先，采取有效的手段，使朝香宫、高松宫、东久迩宫三皇族上奏天皇，要求罢免东条的参谋总长，确保统帅权；其次，拿下东条的战争指导权，这两条建议于三皇族上奏次日实现；最后，提出由木户出面主持政局，来说服天皇。

木户作为内大臣比近卫等人更了解天皇的态度，深知如不能使天皇有所转变的话，就不能转变政局。因此他重新体现了现实主义者的立场。



在会谈中，木户看过近卫的文书，大致是对战局的绝望状况作一简单概述，之后冈田启介、末次信正、小林跻三等海军大将介绍详情，阐述了“最后的归结大致可见，为了让国民做最坏的打算。只能组建新内阁来实施舰队决战”。（同上）依然幻想以“舰队决战”来扭转战局。

这也是与还没有放弃对战局留有期望的天皇态度保持一致的表现。木户虽然赞同东条下台，可是对战局的态度却和陆军主战派一致。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木户的言行仅限于打倒东条内阁，与“终战”实现和平并无关系。

近卫与木户会谈后，同日下午在贵族院议员中川良长邸与东久迩宫会谈，陈述了与木户会谈的结果。即战局进入最终阶段，陆、海军的主战派依然强硬地主张继续战争，所以早期和谈的可能性不大；还指出东条内阁提早下台缺乏现实性，有必要为下台创造条件；继承东条内阁的应为短期内阁，推荐候补人选为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元帅，以寺内为候补让东久迩宫组阁，策划和谈。促成英国为和谈中间人；天皇退位，皇太子即位；其间高松宫摄政等事项（前揭《皇族的战争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八日）。

由冈田启介领导的打倒东条内阁运动，终于有所进展。其中以主要成员近卫文麿为代表，接近天皇亲党木户幸一，在木户与近卫





的联合体制下发展皇族加入。

然而，之后实现的东条内阁倒台，也随即关系到天皇对战局认识的转变。

无论是近卫的政局转换案，还是在近卫、木户的会谈中所制定的打倒东条内阁工作的政治安排，其关键都是，怎样把以东条为首的主战派从天皇身边分离，和木户、近卫联合掌握政局，由宫中、重臣主导“终战”工作。

因此，着手研讨东条内阁总辞职后的新内阁候选及其性质、“绝对国防圈”被打破后，打倒东条内阁工作本身就成了“终战”工作的第一步。

### 穷途末路的执政者

形成近卫—木户联合体的同时，在政界顶层，打倒东条内阁工作也进一步开展。一直作为东条内阁后台的翼赞会，围绕塞班陷落的责任问题亦做出了结论，实际上表明了对东条内阁的不信任。由此反东条内阁运动的力度骤然加大。

对此，东条也推出了内阁改革和强化大本营的策略，试图继续执政。

东条于七月十三日下午会见木户，提出重臣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的入阁，设专职军需大臣。追加入阁重臣和外相为大本营成员，统一指挥陆、海军航空兵等，并制定改革提案，征求木户的意见

(前掲《木户幸一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对此，木户向东条提出统帅的确立（陆相和参谋总长的分离）、解任嶋田海相兼军令部总长、促使重臣和指挥部相互包容等建议，即所谓的“三条件”。

东条对此向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表示：“此三项太苛刻，内府的态度变了，在帮助重臣倒阁。不仅如此，上奏也使天皇对我失去信任。”（佐藤贤了《佐藤贤了的证言》）表明了辞职的决心。

于是，东条为试探天皇的本意，专门晋见天皇。

天皇对此表示：“第一，关于统帅的确立，如果不实施的话就会流失人才，要慎重。第二，关于嶋田不仅是东条的部下，就连伏见宫元帅也开始对其采取行动。”（前掲《木户幸一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不仅向木户转达了此次谈话，还表明了原则上支持此提案。

然而，天皇与木户对东条的建议，此时略有不同。木户认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内阁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转向对天皇的批判。”表示了相当强烈的重组内阁要求。与此相反，天皇认为，只要在表面上能确立统帅权就可以了。（保阪正康《东条英机和天皇的时代》下卷）

自此木户应天皇的意愿，进行打倒东条内阁工作。但实际上此时的木户对东条着重阐明：“在此之前的改革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



都认为不妥的是统帅权的问题。天皇对此也很不安。”（前掲《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

木户的态度在东条内阁下台的转折点方面与近卫相同。对此，东条采取了对抗措施，次日再次晋见天皇，奏请恢复参谋总长和军令总长的专任制，并且上奏了嶋田海相解任的事项。

东条英机认为实施天皇认可的统帅权，才是延长内阁生命的焦点。

东条于十七日会见木户幸一，任命野田直邦海军大将为海相；嶋田为军令部专任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为参谋总长，以实施确立统帅权来挽回局面。此行为表明，其背后不仅有东条党羽的怂恿，更表明了晋见天皇时东条通过谈话内容发现天皇并没有完全失去对自己的信任。

因此，东条在十四日晋见时表示“改变统帅的现状，改变内阁的阵容，决心一路迈进”（同上，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从中可以看出他延任内阁的决心和感触。

面对东条的态度，近卫表示出如下的感受：“所谓的统帅（笔者注，为天皇），其结果也都是不信任的意思，即使这样理解也不出意料”和“实际上厚脸皮也好，狂人也好，结果是沟通不了。因为天皇也不能将其罢免，对保持其统治整体性的不信任的指示，实际上已经震惊朝野了”（前掲《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相反，近卫的心中已被反东条内阁情绪所左右，此时的近卫并不一定了解天皇的想法。

作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内阁，天皇原想通过东条英机这个忠实的军事官僚来进行政治指导和战争指导，所以对木户幸一提案的三个条件没有充分地重视，到最后仍存有对东条内阁的幻想。天皇原则上是明确的战争持续论者，因此一贯对东条的战争政策有所期待。

天皇在这一点上与近卫等重臣之间有所分歧，这种分歧在战争后期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 不再支持天皇、东条

根据贺阳宫恒宪王（战败时的陆军大学校长）对近卫的留言，以战局的恶化和反东条内阁的动向来看，此时的天皇“有些神经衰弱，被兴奋所控制”（前揭《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近卫等重臣一直试图借皇族势力实现天皇与东条内阁的分离，天皇对此表示出厌恶的情绪。

同月三日，高松宫与朝香宫鸠彦王（陆军大将，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同晋见天皇，与木户对东条的意见相同，加上对东条参谋总长一职的不合理兼任及掌握大本营幕僚长不满，建议将此位让于海军。

天皇回答说：“政府也认为应该设置专任参谋总长”（前揭《皇



族的战争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一日)。他此时也想借设置参谋总长专任制度来确立统帅权，从而使东条内阁再起。

尽管如此，东条已深知重臣的倒阁运动已进入最后阶段，但他仍然拒绝放弃，并试图坚持到底。这样反而使重臣党羽发生了动摇。冈田启介为了有效地对抗东条，于七月十七日召集了重臣集会，试图由木户来转变天皇支持东条的内阁立场。

木户幸一表明，内大臣与重臣联合上奏天皇很难，如果重臣直接上奏的话，可以从中撮合。（前揭《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

此刻木户幸一已掌握天皇的意向，为了避免成为重臣直接代言人，坚持与天皇态度保持一致，他表面上还是保留了其个人立场。但因此也使得已经鲜明地站在反东条内阁立场上的他，陷入了天皇和重臣的夹板中。

在木户与反东条势力的接触中，意识到倒阁已进入最终阶段，对重臣的活动不可视而不见。因此木户以苦肉计来敦促重臣的表明意向，也使天皇能认清木户的反东条立场。

东条英机从宪兵那里得到倒阁势力的情报，作为对策他使出了最后上奏天皇的王牌。因此，在反东条内阁的势力中，很多人担心东条以天皇的权威为后盾，做最后挣扎。如果那样的话，木户作为天皇的亲信，则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



冈田启介在允许米内光政入阁以前，为了使重臣的意见达成一致而召开了重臣会议。

会议于十七日十八时三十分召开，席间就打倒东条内阁议题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最终由冈田作总结并向木户汇报了其内容：“为渡过难关，必须重振人心，国民相互协力，一路迈进，创建强有力的政府。”（同上，昭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午后四点）

决定上奏的第二天，与东条关系密切的阿部信行告知东条会议内容后，东条立即递交了内阁辞表，决定辞职。他已充分预想到重臣上奏后，天皇会放弃对自己的信任。

东条英机在内阁中辞职的原因还有，申请入阁的米内光政以重整人心为由，因反东条意向而被拒绝入阁，分裂重臣的计划失败；为空出大臣的职位而被要求辞职的国务大臣岸信介拒绝辞职；加上外相重光葵与商务大臣内田信也同时要求辞职，其结果暴露了东条内阁不团结等问题。

天皇通过木户掌握了反东条势力的动向，最终改变了支持东条内阁的态度。对东条辞职的决定，天皇只是做了简单的答复。（前揭《东条英机与天皇的时代》下卷）

虽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可以充分感受到，作为天皇已经不能无视政界上层的反东条内阁运动了，无论怎样，天皇都会放弃对东条的信任。就这样，执政了两年零十个月的东条内阁，于当年



七月十八日集体总辞职。

### 从打倒工作到“终战”工作

在实现打倒东条内阁的过程中，作为重点人物的冈田启介、近卫文麿和木户幸一的加入，扩大了宫中重臣集团的影响力，同时与陆军主战派之间形成紧张的关系。随着战局的恶化，政局流动的状况也成为准备建立新政局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战争政策的进展，在上层的内部围绕着持续战争或结束战争进行调整和妥协，总体上向结束战争的方向逐渐发展。

另一方面，开战以来一贯固执地认为持续战争可以迎来胜利的天皇，其态度也由战局恶化和东条下台而引起了对战争指导的不安。此后，天皇也在持续战争和结束战争之间动摇不定。加上之前一贯支持东条内阁的木户，与近卫等人态度的转变，无疑对天皇也是一种打击。

在战局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天皇丧失了对持续战争和取得胜利的信心。尽管如此，他原则上还是没有改变持续战争的方针。在东条英机下台后，他仍然坚持持续战争，反复强调“一击论”，期待战局能够改善。

对于宫中重臣来说，木户推荐东条英机，是东条内阁诞生的根本，也是战争指导内阁的势力之一。战局的恶化是两者间分裂和对立的根本原因，由此产生了动摇天皇统治体系的危机。作为保守势



力的宫中重臣对此有着共同的认识，因此，与天皇意向相同的同时，促使了打倒东条内阁的工作。

以下是打倒东条内阁工作的开始到结束的政局过程。

第一，开战当初达成的共识，即陆海军主战派势力、革新官僚、资本家与稳健派宫中重臣集团间的同盟关系分裂，后者在种种抵抗下成功地夺回政治主导权。

第二，天皇直到最后都坚持信任东条，这成为打倒东条内阁的最大阻碍，迫使其下台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第三，不论是拥护东条还是反对东条，为了压倒对方，其结果是必须依靠天皇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重新认识到了天皇权限的强大性和绝对性。在以后的终战工作中，天皇的权威和权限怎样在政治过程中运用，成了最大的焦点。

第四，由陆军主战派持续战争导致的战败，进而出现国体天皇制的危机，对此有所察觉的宫中重臣，在没有足以对抗陆海军主战派势力的情况下，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发挥了作用。在依靠天皇权威这点上，与东条政治相同。可是在对战败后国体破坏的危机这点上，它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此集团在以后的“终战”工作中，完全掌握了主导权。

因此，通过战败过程、“圣断”及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决定过程，来理解东条下台的原因，对于重新认识向天皇要





求“圣断”的主体，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东条下台的过程也是终战派主体形成的过程。

在打倒东条内阁过程中，观察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等重臣的政治思想和行动理念，在以后研究从小矶内阁到铃木内阁的“终战”工作中，是究其真实意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关键的是，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圣断”，为何如此迟延，从而导致了冲绳的悲剧和东京大空袭等，最终造成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等结果，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第二章

# 天皇持续战争的意图和“终战”工作

### 1 推迟“终战”工作

#### 与主战派的妥协

从《木户幸一日记》中所记录的“重臣会议始末”（前揭《木户幸一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中总结一下小矶内阁的成立经过：

接受东条内阁辞职后，为了选出继任内阁，1944年（昭和十九年）7月18日召开了重臣会议。席间，东条派的阿部信行陈述了对继承人的要求：“国务和统帅间关系恶化，有必要紧密联系。”主张尽早继承军人内阁，并提出了以米内光政为首的海军内阁方案。



米内光政对此做出了“作为军人应全身心专念于统帅作战，政治由文官所为”的见解，提出了文人内阁方案。阿部信行不同意此案。米内光政又提出了陆军内阁的第二方案，得到了若槻的赞成，并推荐宇垣一成陆军大将为候选人。近卫文麿则认为从战争指导内阁的角度来看，文人内阁不妥，陆、海军内阁才合适，平沼骐一郎也表示赞同。

木户幸一提出以持续战争和重建政治体制作为内阁的使命。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与五位重臣的提案，遭到木户的反对；广田弘毅的皇族内阁提案也遭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的反对。

经过一系列的讨论，最终认为军官内阁更有实力，在重臣中除阿部信行之外，几乎全部支持陆军内阁。下一个讨论焦点是，怎样把陆军军人从派阀中选出来。重臣的共同意见是，要在统治派中选出具有压制东条英机能力的军官，并列出了以下候补人选：寺内寿一（时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时任参谋总长）；畑俊六（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后任教育总监）；本庄繁（原关东军司令，原侍从武官长）；小矶国昭（时任朝鲜“总督”）等陆军军官。

由于更换前线司令官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因此第一候选人寺内寿一被排除；梅津美治郎也由于刚就任参谋总长，所以很难当选，另外陆军皇道派的近卫、平沼等重臣认为他与统治派的左翼军人有接触。就这样，从第二候补人选中，小矶国昭胜出。



下面追述在小矶当选的过程中及在小矶内阁成立前后，政局时态的变化。

首先宫中重臣集团，在成功打倒东条内阁后，依然作为与陆军主战派妥协的结果，顺理成章地决定了后继人选。续选工作在以阿部信行为代表的陆军内部的东条派与反东条派之间进行，木户幸一作了如下发言：“从内外的局势，特别是今后强化国内的防卫态势这一点来看，陆军当仁不让”，宫中重臣以陆军内阁的路线结束了此会。

其理由有陆军提出强化国土防卫体系、增强陆军在内地的装备、强化宪兵等目标。从其现状来看，成立反陆军内阁与非陆军内阁有着很大的副作用。也就是说，没有形成因打倒东条内阁而清除东条派，也没有清除包括东条残余势力在内的陆军主战派的影响力。

宫中重臣与陆军主战派的妥协，不过是先找到了政策转换的机会。

由此可见，木户是在陆军两派中寻找平衡，从当时陆军内阁主张继续战争的过程中，找到“终战”的可能性。木户将权力斗争和战争责任淡化，以避免内部的分裂与对立。也就是说，宫中重臣与主战派势力妥协。

### 成立小矶内阁的缘由

近卫指出，打倒东条内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赤化问题，并在重



臣会议中提出：“数十年来，陆军内存在着一些左翼思想分子，他们与军官及平民联系，企图策划左翼革命。如此举动比战败还要危险，本人觉得左翼革命的结果比战败更令人担心，战败还可以维持皇室与国体，而革命则不然。”对左翼革命与国体危机，近卫文麿认为：包括陆海军在内的统治阶层应该团结一致，避免天皇制的危机。

近卫对赤化思想的恐惧是以对陆军内统治派的不信任引起的。他深感统治派所提出的国家总力战体制与高度国防国家论中，暗藏着共产主义方面的统治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近卫的反东条内阁立场根本在于东条英机权限高度集中的独裁政治所引起的反抗心理。

因此，近卫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得到拥护天皇至上主义的陆军皇道派积极援助，还试图从陆军内部排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人员。此时有关于小矶内阁的人事，平沼骐一郎说“从思想问题上来看有必要采用皇道派的人”（前揭《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他也期待着皇道派的荒木贞夫和柳川平助的入阁。

然而，近卫的反统治派立场并不彻底，小矶国昭个人的经历和人脉也并不充分，因此他本人则附属于统治派。作为推行总力战体制构建的国家总动员政策的一名军事官僚，小矶近身于杉山、梅津美次郎等人。

然而小矶并没有近卫所期待的反统治派的人脉，虽然没能验证



东条、近卫等人在重臣会议决策中的影响力，但是木户幸一的政治现实路线与近卫的内部体系证明了左翼革命的危机，促使了小矶内阁的成立。

小矶虽然担任过平沼骐一郎内阁和米内光政内阁的拓务大臣，但并没有对当时朝鲜问题的政治斗争和陆军内部抗争进行直接干涉。即使他归属于统治派，当时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明确，关键的战争指导方法一窍不通。因此，对于任何集团来说，其被利用的可能性都很大。

米内光政评价他说“人品好、有能力、有城府”，平沼骐一郎也一致推荐（前揭《木户幸一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别说在陆军内部，即使是政界上层也因没有影响力，反而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小矶国昭本身是有野心的政治家，在中央政界却被认为是缺乏政治性的军事官僚。

在宫中重臣的眼里，小矶与东条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他对中央政治方面是明显的外行，因此，对小矶内阁的统制力和影响力相对容易渗透。

另外，在重臣中有人认为小矶内阁是东条内阁的延续。事实上在重臣会议上，米内、平沼提案的候补人选第一是寺内寿一、第二是小矶国昭、第三是畑俊六。对此，币原表示不满，质疑说：“他与东条有何不同”（前揭《近卫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同时



冈田启介和广田弘毅也表示有同感。

三人在陆军内部军历和人脉上略有高低，在组建陆军内阁的问题上都抱有危机感。在重臣看来：铃木贯太郎海军内阁、启用户户幸一等案，将会导致陆军主导政治，指导战争，延迟“终战”工作，选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混乱。

最终，小矶内阁是东条内阁的延续之说没能在宫中重臣中占多数，给东条内阁以后的政局留下了不和谐的音符。

此外，陆军内的反东条派试图通过小矶内阁来强化战争指导态势，持续战争。由此可见，小矶内阁是在各势力权力斗争的夹缝中所成立的内阁，当初就不应该对其政治力量有所期待。

### 独占政权的一方

另一方面，则涉及东条及东条派陆军主流的人事问题。东条英机本人辞职后，他还企图作为新内阁的陆相留任，以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在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的反对下没能实现，而在陆军内主张继续战争的东条党羽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和军务科长赤松贞夫依然掌握实权。

就连新就任参谋总长的梅津美治郎，也曾被东条提拔为陆军次官，得到了进入军事中央的机会。从教育总监到陆相的杉山，在与东条内阁对立之前，曾一直是东条的有力助手。东条试图留任小矶内阁的陆相，结果杉山就任陆相后，近卫说：“陆军依然有杉山，所



以东条一点也不担心”（前揭《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此之前，作为预备人选的小矶国昭被提拔为朝鲜“总督”，东条给予他向中央政界发展的机会。因此，东条说：“自己辞职后，由小矶接任，表示放心”（同上，七月二十四日）。这也就是说小矶内阁是东条内阁延续的原因，因为在他那里有东条的影响。

东条派直到杉山、梅津美治郎在陆军内部掌握实权为止，都没有被排除在军事中央之外。在陆军内部权力移交过程中，形成了反东条、非东条势力的战争持续派。小矶内阁在这种新的势力中主掌战争指导和政治指导，因此感到无能为力。

小矶内阁成立时，天皇按照木户幸一的上奏，欲从前线召回寺内寿一。并询问参谋总长东条有关作战的事情。东条认为，这对前线的士兵和大东亚共荣圈各国以及中立国都有影响，因此不能召回第一线的司令官。（前揭《木户幸一日记》下卷昭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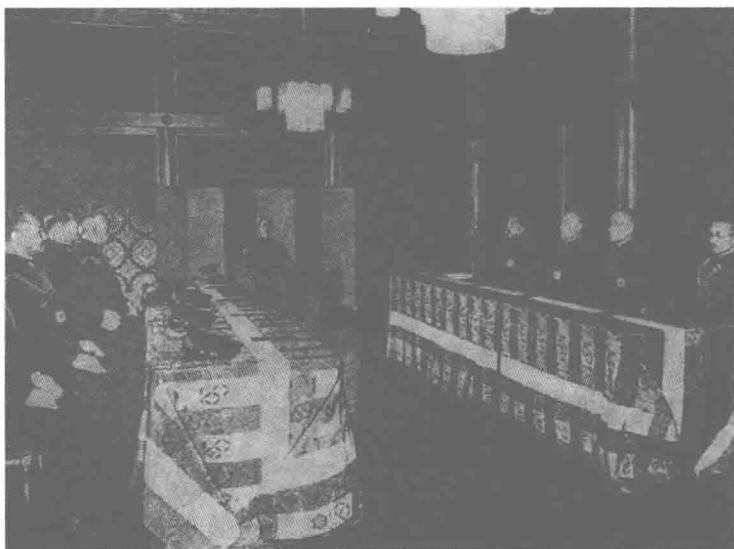
天皇放弃了召回寺内的打算，决定将小矶国昭从朝鲜召回。木户认为寺内是陆军元老，东条下台后势必会成为新的主战派势力。因此，对召回寺内表示为难，放弃了寺内内阁的构想。进而，木户与天皇议定最终召回小矶。

然而木户的选择暴露了小矶内阁的弱点，以梅津美治郎为中心





的陆军成为更加顽固的主战派，同时再次利用天皇的权威来选出后续内阁。如下文所述。



御前会议での昭和天皇（中央）

小矶内阁于七月二十二日成立。在这之前，米内光政作为海相入阁副总理。他是由天皇秘密委派的。

连立内阁的背后，小矶起用平沼骐一郎和米内光政为拓务大臣，由于其他的重臣对小矶完全不了解而感到不安，因此让以海军为后台的米内入阁来牵制陆军主战派。

广田弘毅在重臣会议中提议组建陆海连立内阁，除阿部信行以外的重臣皆表示赞同。七月二十日，天皇同时召集米内和小矶，指



示“卿等协力组织内阁”（前掲《木户幸一日记》下卷昭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连立内阁的背后，隐藏着对内阁本身弱点的不安和对陆军的担心。同时由于天皇组阁之时提出“遵守宪法条款，为大东亚战争的完成、不可刺激苏联”等注意事项，引起了苏联的警惕。

近卫分析，天皇的寓意是“压制皇道派”（前掲《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然而，天皇认为苏联是中立条约缔结国，也是列强中唯一没有交战的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窗口，苏联是有利用价值的，接近苏联也是避免日本被孤立的一种方法。

### 坚持继续战争路线

首先，关于在小矶内阁中陆军所表示的态度，以七月二十二日登载于参谋本部编辑的《战败记录》中题为“在今后的国政运营中陆军的对策”（起草者不明）一文为参考。

文章的开头，作为总论记载了“陆军依然是这场战争的中坚力量，在确认战争指导的先驱下，指引海军、鞭策政府向着胜利迈进。然而随着世界形势的推移，应观察战争动向不要错过转机。就现内阁的执政状况分析，应断然确立战时态势，以陆军为实质性中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前掲《战败记录》。）

文章基本把小矶内阁定义为结束战争的内阁，根据情况也将“终战”列为目标，调整为战、和两种态势。可是，小矶内阁将在陆军不利的情况下，公布戒严令、树立军部政权，顽固地将战争进行



到底。

另外，在分论“对内阁政策”的开头，也强调原则上“内阁的性质为结束战争，各种政策将被具体地实施，以应战局变化”。对小矶内阁不断地提出要求并监视其结束战争，同时“对于陆军，试想了政变的对策”。可见，现内阁的根基脆弱，并没有被当作长期政权来认可。所以下期内阁可能成为更加强硬的战争结束内阁。

在“重臣施策”的一项中，“这次的政变由重臣策划下进行，现任内阁负有重大责任，特别是在将陷入结束战争的同时，严密监视单纯的屈服讲和的局势”（前揭《战败记录》），正面批判了推翻东条内阁的重臣，表明了对重臣“终战”工作的不信任。

由此可见，这本起草者不明的文书，是陆军内部东条派起草编辑的。所以，虽不能断定它是陆军的共同认识，但从陆军中占主导势力的东条派与战争持续派的现状来看，其内容对实行终战工作的重臣来说是巨大的障碍。

当时的小矶内阁，对战争指导表示“现阶段，还不能断言没有在最后一战取胜的希望，即使不能歼灭敌人，如果能将敌人暂时击退的话，那时讲和也不晚”（小矶国昭自叙传刊行会编《葛山鸿爪》）。

其结果，不论小矶国昭的本意如何，表面上是为了形成对日本有利的局面而继续战争，他认为阻止战局恶化才能实现最初的终战工作。推翻东条内阁建立小矶内阁的重臣，在组阁当初对小矶内阁

就甚是冷淡。小矶内阁的内务大臣大达茂雄提出“战况令人绝望，对小矶内阁已经失去信心，这种内阁应尽早倒台，组建和平内阁”。对此，近卫认为其“是豪爽痛快的人”（前揭《细川日记》昭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同意了大达茂雄对小矶内阁的观点。

与此同时，小矶内阁的米内光政海相也表示“既然新内阁要持续战争，休战和平就应该委托下任内阁”（前揭《葛山鸿爪》），认为小矶内阁是持续战争的内阁。

从此，重臣打倒东条内阁的工作，以“组建和平内阁”与排除代表东条英机的陆军主战派为目的，完全没有期待小矶内阁向“和平政策”转变。

虽然小矶内阁在以“结束战争”为口号的战争政策中奔走，在持续战争的同时，与持续抗日的中国重庆政府之间展开被称为“缪斌工作”的和平进程，这也与终战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小矶内阁最终成为以梅津参谋总长为代表的新陆军主战派，其继续走战争持续路线、实施向和平转换的政策，最初就有它的局限性。在这种状态下，对于“终战”工作，宫中重臣集团还需要时间来达成一致。

## 2 与“和平”工作的关联

### 迈向遥远的和平

小矶首相在九月七日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第八十五届帝国议



会)中提出了六项当前的施政方针:增强斗志和确立必胜国家态势、增强战力、增产粮食及稳定国民生活、彻底实行劳务和国民动员、强化国土防卫、动员并应用科学技术。总之,明确指出要继续战争,为扭转已经恶化的战局而倾注全力。

小矶首相认为,在国内军需生产能力困窘和陆海军战力消耗的状况下,既然要继续战争,就必须形成以内阁为中心的举国一致的强有力的战争指导态势。

日本过去的战争指导是在参谋本部掌握主导权的作战优先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以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胜败关键的国家总力战中,国务与统帅的紧密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先前的东条内阁基于这样的观点,以身兼首相、陆相、参谋总长三职的东条和兼任军令部总长的嶋田海相人事关系为媒介,尝试过政战两略的统一。然而,由于未完全将伴随兼职而产生的细节权限下放,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小矶首相也基于同样的观点,以战局紧迫为由,企图成立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为成员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它得到敕裁许可,以正式的法制机构而设置(1944年8月5日),担负起了“制定战争指导的根本方针及协调政战两略”的职责。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承袭了先前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这一国务与统帅间的协调机构,但是在统帅部优先性上并无特别变化,具有

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相同的局限。因此，由内阁掌握实质意义上的主导权，开展战争指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争指导的实权依然掌握在强调统帅权独立制的统帅部手中。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1944年8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会上，小矶首相在解释今后战争指导的基本方针时指出，“第一，帝国将彻底集结现有战力及年末之前可形成战力的国力以击败敌人，摧毁敌人继续战争的意志；第二，帝国无论前项企图的成败及国际形势如何，在一亿国民钢铁般的团结下，以必胜信念保护皇土，以期最终完成战争；第三，在实行前两项的同时，帝国实施彻底的对外政策，以期世界战局的好转”。（前述《战败记录》）重新明确了继续战争的方针。

第一项是拿出陆海军的全部兵力在太平洋方面与美军决战，第二项是为了改变国民士气不足的缺点而将着眼点放在“唤醒维持国体精神”和“激发同仇敌忾”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无论“摧毁敌人继续战争的意志”这一企图成败与否，“以期最终完成战争”，其战争目的都在于“维持”“皇土”这一点上。这是试图将国民在绝望的战争中驱使到最后，以彻底抗战为名推行战争政策。第三项是企图促进与苏联及中国的外交谈判。

这些基本方针的特点是仍旧忽视了日本的战力及国内军需生产能力已经消耗殆尽的现状。与其说一味地从主观且乐观的观点出发，提出有利于日本的方针，莫如说实际上指导部连正视现实的余地和



勇气都没有，不过是一篇纸上谈兵的既不符合实际亦无合理性的作文。这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军事领导者们的不负责任。

不过，在决定的大纲中指出，“万一德国崩溃或者单独媾和，要不失时机地利用‘苏联’努力使形势好转”（前述《战败记录》），暗示出已开始以苏联为媒介开始与同盟国方面的谈判，准备在德国失败后避免所预料到的孤立。

然而，这里没有使用“和平”这个字眼。在将战争指导与政治指导的方针整合而成的正式文件——大纲中，也全然未具体表达出对“和平”的探索和意图，这说明，小矶内阁出于自身也好，来自统帅部也罢，面向“和平”或者“结束战争”的政策转换还不可能公开。

#### “和平”工作的迹象

虽然没有纳入大纲之中，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曾讨论过一种“和平”工作方案。

例如，在制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的过程中，在作为讨论参考资料而拟定的《基于〈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的对外政略指导要领（草案）》（1944年8月8日，省部主管者案）阶段，其第一项《对苏中积极政策》指出：“1. 以大约今秋时分取得的结果为目标，劝导‘苏联’出面斡旋结束帝国与重庆（含延安）的战争，即使不得已也要斡旋与延安政权之间的停战妥协，对德国与‘苏联’，则劝导两国复交；2. 首先对‘苏联’派遣有力的帝国



使节，其出发时间最迟预定为8月下旬”（同上）。同时以苏联为媒介，与中国开始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努力使苏联与德国复交。借此尽量避免日本遭到孤立，并确保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一定作用。

关于以苏联为媒介的“和平”工作，外务省方面也在逐步研究，但其基本的外交方针首先旨在日苏中立条约的前提下，维持日苏关系现状固定化及推进德苏和平。关于在陆军内部存在的德苏和平斡旋以及以苏联为媒介开展日本与同盟国方面和平谈判的构想，在外务省及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等人中间，弥漫着浓厚的不现实空气。

9月28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的《关于对“苏联”措施的文件（草案）》中指出，对苏外交的基本目标在于“努力使‘苏联’理解以对日合作为中心的东亚稳定，使之与帝国的世界政策相一致”（同上）。

文件内容缺乏大致的国际认识及形势判断，从外交常识上看也等于是纸上空谈。关于对华外交，8月30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并着手将其落实。

然而，其具体内容正如在《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9月5日）中所阐述的那样，“对重庆政治工作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迅速终止重庆政权的对日抗战”（同上），这是以片面且乐观主义的设想为前提的，它全然忽视了中国方面抗日意识之强烈以及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线的不利局面。

其中，作为和平条件，文件提出“以基于完全平等的条件为原





则”，但是在中国战线及整个亚太地区，从日本军队行将崩溃的现状来说，它也与对苏外交一样，“平等条件”的实现是仅仅有利于日本的过于脱离现实的构想。

其后，当9月6日小矶首相、梅津参谋总长及川古志郎军令部总长等就重庆工作的计划上奏天皇时，天皇陛下问道：“一、重庆工作岂非暴露出我帝国之软弱？二、该工作有成功之把握吗？三、是否影响军队士气？”（同上）等。

由此可以看出天皇对重庆工作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无论怎样，重庆工作毕竟是“和平”工作，一面抱有向中国方面“暴露出软弱”的戒备心理，一面又为了打破中国战线的僵局而不得不期待重庆工作。从中可以窥视到这样一种痛苦心境。

此外，天皇还在三天后的9日同样对小矶首相等指出：“先前关于重庆工作之上奏，此事极为重大，不可以单纯的谋略而告终。望将王道进行到底、以使对方彻底接受帝国的信义为主，不可满足于一时之效果，而应慎之又慎，使之收到永远之成果”（同上）。显示出对重庆工作的积极姿态，且表明了期待感。

在中国战线陷入困境、太平洋战线日军面临崩溃的状况下，虽然天皇对重庆工作寄予了些许的期望，但是，对以“使对方彻底接受帝国的信义”为条件的外交谈判有所期待是不可能的。

因此，天皇及小矶内阁能否正视日本所处的现实，在现实的应对中认真地致力于谈判的成功，是极其令人怀疑的。

关于重庆工作，此后在陆军内部以石原莞尔预备役中将为中心，通过汪精卫政权的“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开始实行。

谈判虽然暂时开始了，但是有关作为谈判前提的否认汪精卫政权的条件，遭到了政界上层的强烈反对。该“缪斌工作”也停滞不前，小矶内阁还因为内阁内部围绕这一问题的不统一而导致被迫总辞职。

### 国体护持论

由于马利亚纳的失陷，“绝对国防圈”的破绽显而易见。7月28日（1944年），大本营陆海军部制定了确定新作战方针的《陆海军而后之作战指导大纲》。

在其后的作战中，将本土、西南诸岛、台湾岛和菲律宾方面设想为之后的决战战场，如果在这些地区遭到美军的进攻，则决定发动“捷号作战”，大本营陆海军部为准备发动“捷号作战”而进入了正式的准备。然而美军的进攻比预想的更快，同年10月10日和13日，冲绳和台湾相继遭到了空袭。

继而，美军于17日断然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大本营陆海军部于翌日18日发动“捷一号作战”，倾尽陆海军的全力准备决战。小矶首相将莱特决战称为“天王山”，将战局的逆转寄托于此。

小矶战后在巢鸭拘留所记述当时心境的《葛山鸿爪》中称之为“天王山”，并说明道：“指望在胜利的时机步入停战和平，哪怕一次

也好，真希望能够取胜。”

由此可见，小矶国昭自己也为了在战局中形成有利的条件而将战力和国力的消耗置之度外，打算将本无胜算的无谋战争断然继续下去。在此，丝毫感觉不到他对战争的继续给国民带来更多牺牲的结果而感到忧虑和畏惧。

在莱特岛海战中，连特攻机都投入其中的海军丧失了“武藏”号战列舰和残余的全部航空母舰，海军战斗力遭到毁灭性的重创。陆军也因运载派往莱特岛的主力部队的多艘运输船被美军击沉导致其兵力损失殆尽，战役的趋势从一开始就很明朗了。

见此，统帅部果断停止了莱特岛作战，改以吕宋岛为新的决战战场，作战一改再改。对该作战变更原委全然不知的小矶首相被天皇责难道：“小矶，莱特岛决战被称为天王山，你认为如何？”回答说：“天王山现在已从莱特岛决战转移到吕宋岛决战了”，表现出了广播中所说的失态（前述《葛山鸿爪》）。

战局的恶化更加迅猛，在此次莱特岛决战大惨败前后，随着战局恶化的加剧，在重臣和皇族的言行中，不断体现出“国体”危机到来的意识。

例如，贺阳宫在与近卫的面谈中，曾表示“战争再继续下去将伤及我国的国体，仅仅这一点就何等无益，重臣们应努力转换”（前述《细川日记》1944年9月4日）。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战局恶化与国体危机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提出，与结束战争相比，其比重更

多地倾向于围绕维持国体的问题。

同样，高松宫也指出：“结束战争对策的着重点在于维持国体。非玉碎不能维持国体。当然，虽说是玉碎，但也并非连女孩子也玉碎。”（《高松宫殿下1944年9月17日项》，前揭《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他直言道，政策向结束战争转换的最终应以维持国体为目的。

高松宫同时指出，“必须下定七生报国、生死轮回、拥护皇室的大决心。希望怀着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心情。既然有七生报国这句话，应该使国民理解”（同上）。批评了安逸的“玉碎”论，主张国民必须为拥护皇室和维持国体而竭尽全力。

为了维持国体，国民的生命付出任何牺牲都是有意义的。基于这样的前提，高松宫提出了这样的逻辑：通过这样的牺牲来促使战局好转，尽快找到结束战争的途径，这才是维持国体的捷径。这个逻辑不仅是高松宫一个人的，也是宫中及重臣集团在其后进行的“终战”工作的根基中流露出的维持国体的逻辑。

战局恶化与战场“玉碎”的相继出现，使政界上层的领导者吐露出了在维持国体问题上无计可施、穷途末路的心情。

作为打倒东条内阁工作的中心人物之一，冈田启介认为“事到如今，唯有以一亿玉碎来维持国体的决心和心理准备，来激发起国民的士气，使其战事结束更有把握，除此以外别无他法”。高松宫也主张建立在国民牺牲之上彻底地维持国体，甚至还说他“相信如



果如此考虑，其间一旦有了适当的机会和方式，则应依赖政府的胆识，迄今为止的想法和说法都是岂有此理的”（《冈田启介大将意见1944年9月1日项》，前揭《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

打倒东条内阁工作对于冈田启介来说是什么？难道是政策向“结束战争”转换的一大机会吗？无论怎样说，冈田的发言都证明，重臣及宫中集团或处于政界上层人物的“结束战争”构想，仍然是旨在维持国体即维持天皇制统治体制的最大限度的选择，而绝非是为了将饱受惨祸煎熬的国民拯救出来的政治选择。

#### 顽固的天皇续战意图

政界上层更加露骨地表示出以国民的“一亿玉碎”为代价，顽固坚持维持国体的态度。另一方面，天皇也对战局的急剧恶化愈感焦躁。但是，天皇并未最终丧失斗志，从根本上说，他在取得重大战果之前不准备做出结束战争的决断。

在小矶内阁成立前的塞班岛失陷之后，天皇也鼓励海军：“此次作战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关键一战，希望作战部队取得像日本海大海战那样的赫赫战果。”（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6）》）并未掩饰其对作战的不满。

随后，天皇于8月23日在全国各道府县知事齐集的地方长官会议上谕：“在战局之危急与皇国之兴废息息相关之今日，汝等地方长官应更加奋发，率领激昂之民众，从物质上、精神上充实官民一体之战力，以此辅佐皇运”（前述《皇族的战争日记》）。



这体现出天皇本人在国体存亡之时的深刻的危机意识，为了避免生死存亡的危机，天皇希望“从物、心两面充实”。但是从国力耗尽的现实来看，这不过是不切实际的要求罢了。

9月7日召开的第八五届临时议会开院式，在敕语的“上谕”中“在战局危急与皇国兴废息息相关之今日”的字句，将天皇的悲壮感和决战意识又以书面形式重复了一遍：“敌人之反抗愈加炽烈，战局日益危急，皇国举其总力决胜之机尽在今日”（千田夏光《天皇敕语与昭和史》）。

天皇无视日军现状的决战号召，与莱特岛海战中海军特攻机的投入及其过度夸大的战果以及“必须这样吗？不过，打得好”的赞叹密切相关。

天皇甚至企图使用特攻机等舍身战法给予美军一击，创造些或许有利的“终战”工作条件，以此结束战争。天皇比任何人都熟知战况演变和作战情况、高瞻远瞩地做出合理判断，之所以如此执着地继续无谋的决战，不用说，就是缘于对战败导致国体——天皇制统治体制崩溃的危机意识。

由此说明，与通过继续战争取得的战绩相比，通过外交斡旋来获取维持国体的保证，至少在此时是渺茫的。

在这种岌岌可危的状况下，为了弥补粮食不足，政府甚至向全国的小学生发出了“橡子采集令”（1944年11月1日），给日本国内战时状态投下了阴影。在年末12月26日召开的第86届议会开院



式敕语中，天皇再次重复提出：“如今系战局日益危急，须亿兆一心倾其全力击溃敌人之秋，朕信倚尔等臣民之忠诚勇武，期待迅即达成征战之目的”（前述《天皇敕语与昭和史》），仍然主张将战争持续到底。

以天皇敕语的形式再三言明要继续战争，将战场上的士兵不断逼入绝望的境地。当然，这又导致了强化国内战争态势，导致了更大的牺牲。

与此同时，尽管日本遭遇了莱特岛海战等连续惨败，但是继续战争的倾向并未减弱，至少在政界上层内部几乎听不到公然谈论“和平”的声音。

翌年（1945年），接受了天皇继续战争的建议，大本营陆海军部首先于1月20日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以维护冲绳之外的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岛为目的，要在8月以前编成陆军240万人、海军30万人，合计达270万人的本土防卫军。

接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1月18日和25日相继制定了以整備防空能力和疏散军需工厂为目的的《紧急政策措施纲要》和《决战非常措施纲要》。

《决战非常措施纲要》的第一条指出：“帝国今后的国内政策在于迅速集结一切人力物力，举国家总动员之实效，确立为了必胜而决战到底的坚韧不拔的基础态势”（《败战记录》）。制定出了将天皇继续战争的意志付诸实施的作战计划，以“本土决战”为名，包括



冲绳在内，彻底将全体国民全部动员到战场或军需工厂。

即使在经历了3月9日至3月10日84000人死亡的东京大空袭之后，天皇继续战争的顽固立场也没有丝毫的变化。在天皇的思维里，只有通过战争胜利来维持国体。

### 3 转变天皇的续战意图

#### 与陆军立场一致的木户

进入即将战败的1945年，在政界上层内部及其周围，虽然仍存在着秘密探索结束战争的动态，但是能左右天皇的仍然只有高松宫和近卫文麿等部分皇族及重臣。

此前，在天皇向陆海军当权者询问有关战局的走向时，陆海军两位统帅部长一边较为悲观地阐述整体趋势，一边又表明最终仍有反击余地的判断，这也成为天皇继续战争的根据。同时，对于“结束战争”依然保持慎重的态度。

这一时期，天皇对皇族提出的应当准备结束战争的意见充耳不闻，但对战局的不安和动摇并未掩饰住其焦急。

高松宫对天皇继续战争的意志感到畏惧，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战略政策转向结束战争。但是，对于当时掌握着政策转换关键的木户幸一，高松宫对其与陆军的亲密关系抱有疑虑。

例如，高松宫就木户的动向指出，“木户这家伙没什么了不起，





但指望换成木户马上就能实现和平，那才大错特错”（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2月11日项），明确批评了当时弥漫在政界上层的所谓结束战争的动向。

事实上，木户此时也依然相信陆军的力量，认为舍弃陆军而断然开始以宫中及重臣集团为主体的政策转换为时尚早。其证据是关于同年1月6日美军在菲律宾的吕宋岛的登陆作战以及固执地坚持继续战争态度的天皇就战局恶化询问木户：“我觉得有必要听取重臣们的意向，你的看法如何？”对此，木户虽暂时表示同意，但是又回答说，“总而言之，我认为就此再观察数日为宜”（以上见《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1月6日项）。此外，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同月13日天皇又提出要听取重臣的意见，对此“奉答说应审慎考虑”（同上，1945年1月13日项）。

木户一边考虑天皇关于听取重臣意见的提议，一边继续采取慎重且消极的态度。对于他来说，重臣与天皇的过度接触也有刺激军方的倾向。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军方势力而决定的让步时间，表面上也要与军部的战争继续论相一致。

但是，虽然木户的判断是如此，但事实上仍然执行继续战争的方针。总之，木户是企图让军方彻底地失败，等待军方的威信随着战斗力降低而扫地，然后再实行以重臣及宫中集团为主体的政策转换，实施保证维持国体的结束战争方案。

但是，近卫对主战派军部的战争继续论持否定态度，对维持国

体也表示出强烈的危机感。

2月14日，近卫晋见天皇，上奏道：“败战（此言在上奏时改为危机）虽然遗憾，但我认为迟早必至。以下即以此为前提述之。败战虽为我国体之一大耻辱，但英美舆论迄今并未达到改变国体之境地（当然，有一部分过激言论，将来如何变化尚难测知）。因而，不必仅因战败对国体问题忧心忡忡”（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3月4日项）。

即，与败战的危机相比，更强调了以败战为契机而可能产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破坏国体的危机。这就是著名的近卫奏折中的一节。

### 近卫的上奏文和天皇的反应

关于这份近卫奏折，天皇与近卫进行了如下交谈。首先，天皇就维持国体问题提出：“军部预测美国甚至准备改变国体，你的看法如何？”询问了军方关于日本如果战败，则将被迫改变国体即废除天皇制的传言真相。对此，近卫回答说：“我认为这是军部为激发国民的斗志而提出的。我相信格鲁的本意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近卫对于美国的战后处理不至于变革国体的判断是基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要职的前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的言论。据此，军部认为基于战败等于美国强逼改变国体的预测而主张继续战争的判断是错误的。

近卫进而批评了目前陆军首脑部被统制派所占据的现状，提出了所谓的肃军提议，即基于形成的主战派势力的认识，试图肃清陆



军首脑部。当天皇询问具体方法时，近卫提出起用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等皇道派的人物。

近卫称，在构成军方主战派的统制派军事高官中，存在带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物，将其排除是避免国体破坏的危险、进而结束战争的决定性步骤。

为此，首先必须启用与统制派对立的皇道派人物。天皇即认为近卫的这一提议“如果不能再度取得战绩则很难实现”，事实上表明了否定的态度，同时显示出其对于军部势力所谏言的断然决战以扭转战局的决心。

近卫对天皇说，“能取得那样的战绩固然好，但是有这样的机会吗？接下来这是不可能的。再过半年一年也未必能奏效”，表达了对扭转战局的悲观态度。



近卫文麿

近卫之所以在奏折中强调如果以维持国体为最终目的，就应寻求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表明了唯如此，才是维持天皇制统治体制的最佳策略。

然而，天皇尚未放弃对于军部主战派的信任，因此阻止了近卫的这一行动，没有同意其政治判断。

诚如天皇在与近卫的会见中所说：“尽管梅津（参谋总长）说过美国有抹杀我皇室的意图，但是我自己仍心存疑问。”这说明，他



也未必完全相信军方的说法。

但是，他接着又表示了“陆海军如能共同将敌引诱至台湾外海予以重创，然后再谋求结束战争也好”的观点。这表明他对当时陆海军现状的认识较为盲目乐观、不现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期待近乎赌博的舍身作战（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3月4日项）。

天皇对继续战争的执着程度如高松宫所叹息的那样，“因为陛下对政局非常自信，所以虽然已从侧面对其阐明，但是恐怕不会立刻实行”（同上，1945年3月6日项）。在这一时期，天皇大概因战局恶化而产生了动摇和不安，所以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

高松宫所说的“对政局非常自信”，实际是对于天皇这种强硬态度的讽刺乃至批评。

### 鲁莽地指导战争

天皇的强硬态度导致了除空袭以外唯一以国土为战场的冲绳之战。进攻菲律宾取得成功，美军于3月26日早晨在位于冲绳本岛那霸以西约30公里的庆良间诸岛登陆，揭开了冲绳之战的序幕。

在马里亚纳诸岛被美军占领后，冲绳作为美军进攻日本本土作战的最后屏障，战略价值凸显。因此，1944年3月新成立的以防卫航空基地为任务的第三十二军（西南诸岛守备部队），截至同年9月末已组建了以4个师团和5个混成旅团为骨干的拥有18万地面兵力的大部队。第三十二军部队被动员去修建飞机场，在美军进攻冲绳之前，在第三十二军管辖下共完成了15处陆海军飞机场。

大本营陆海军部在冲绳之战中采取航空第一主义，拟定出了在



美机动部队进攻本土之前通过航空攻击予以阻止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在莱特岛决战失败（同年10月）后也基本没有改变，将冲绳作为空战的前进据点。

不过，莱特岛战败之后，本土决战计划的气氛在军部上方变得愈加浓厚，冲绳的战略价值反倒相对下降了。或者说，在本土决战计划中，冲绳已被看作是迟滞美军进攻的“弃子”。

另一方面，第三十二军与军部上层的航空第一主义作战计划不同，采取陆战第一主义，准备将美军吸引到冲绳本岛，通过地面战进行决战。因此，冲绳的所有部队构筑了洞窟阵地，准备利用自然的沟壑等尽可能地杀伤美军。

事实上，第三十二军即使在4月1日美军登陆冲绳本岛，同时占领中飞机场（嘉手纳）和北飞机场（读谷）以后，也没能发起正式攻击，而在一味等待反击机会中，进入了持久战。

相反，大本营陆军部及第三十二军所属的第十方面军，对两个飞机场的失陷感到震惊，督促第三十二军夺回飞机场并对登陆的美军发起攻势。

与此同时，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中将在4月2日召开的大本营作战联络会议上提出，冲绳失陷，“最终被敌占领，本土来寇是必然的”（前述《大本营机密日志》新版，1945年4月2日项）。这与将冲绳之战定位为“最后决战”的海军之间，也显露出很大差异。

相反，天皇对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让美军登陆冲绳的第三十二军表示出强烈不满。4月1日他对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说，“此战如

果不利，陆、海军便失去国民信赖，今后战局堪忧，当时部队为何不发起攻势呢？如果兵力不足，反登陆又如何？”（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0）》）要求第三十二军放弃持久战，发起积极的攻势。

天皇一心希望阻挡住美军占领马里亚纳、菲律宾的凌厉攻势，在冲绳与美军决战，试图报一箭之仇。然而已经没有足以实施反登陆的兵力，况且冲绳岛已被载有约 1500 艘舰船及 1600 架航母舰载机的 20 艘战列舰和 40 艘航空母舰所包围，要从背后贸然实施反登陆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之前的近卫奏折中，天皇执拗地期待着“再度取得战果以后”的反击机会，已经没有冷静地认识客观现实的余地，只是一味相信反击机会和期待毫无希望的战绩。唯其如此，才没有掩饰对于未按预期行动的部队和无法指挥控制部队的军方上层首脑的焦躁。

天皇对冲绳之战的这种态度迫使陆海军上层下了更为坚定的决心，大本营和第十方面军及联合舰队相继给第三十二军发电报，催促其立即发起攻势，夺回飞机场。该电报在第三十二军内部又导致作战混乱和内部对立的后果。

第三十二军作战主任八原博通大佐主张按计划继续持久战，参谋长长勇中将主张按照天皇和军部上层的方针发起攻势，他们互不相让，作战方针直到最后仍没能统一。

摇摆不定的作战计划更增加了日军的损失，也导致卷入战斗的冲绳居民和被动员到军队的冲绳县民付出巨大伤亡。据记载，军人



及文职人员大约死亡3万人，普通县民大约死亡17万人。

冲绳惨败是由于顽固坚持继续战争的天皇的强硬战争指导而导致的。如果天皇有对美军巨大军事实力的清醒认识以及对战局的冷静判断，冲绳之战就可以避免。在这里，也是天皇的“一击论”以及期待尽快取得战绩的战争指导决定了冲绳的命运。

#### 倾向“终战”工作

冲绳之战开始后，木户幸一接触到了小矶内阁的后继人事，也早就了解到小矶内阁内部不一致的状况。“如果陆军没有人选，铃木先生也行”（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3月30日项），暗示启用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

对于木户的这一动向，近卫表示：“因为海军丧失了发言权，所以陆军愈发表露出‘玉碎论’的倾向。而木户在宫中，已完全确定此人为阿南惟几。而且就日本国体来说，不管怎样想怎样说，没有天皇的许可，无论如何都很难。若想到如今疯狂指导的现状，真是不能不让人感到无奈”（同上）。打算在冲绳发起决战的海军已行将崩溃，而陆军则企图鼓吹“玉碎论”以继续无谓的战争，近卫对于这一现状深感忧虑。

并且，举足轻重的木户通过陆军主战派的阿南惟几大将（作为陆相进入铃木内阁），将其对不明确政策转换的展望而产生的不满表露无遗。近卫认为，只要天皇本人没有结束战争的意愿，政策转换就是不可能的，因此连同此时的天皇一起，严厉地指出其是“在疯狂地指导”。

4月5日，小矶内阁提出辞呈，人们期待着借内阁更迭之机转换政策。但是，近卫即指出，“宫中方面之气氛还并非是谈论和平的时候，因而天皇之想法可能亦与皇族们一致”（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4月5日项），表达了以高松宫为首的期待在新内阁领导下推进结束战争的和平工作的皇族和近卫所代表的希望政策转换的重臣的失望感。

这同时证明了天皇对改变政策的决心依然是不确定的。天皇逐渐开始关心“终战”工作，进入5月，日军在冲绳之战中败局已定，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5月7日）。之后，接替小矶内阁的铃木贯太郎新首相在组阁后（4月7日铃木内阁成立）的广播中对国民宣称，“跨过我的尸体重新站起来”，继而在5月3日檄文中说：“国民也要像特攻勇士那样。”然而在此形势下进入5月，天皇的态度却开始显露出较大的变化。

近卫不断劝说天皇尽早结束战争，但是看到的是天皇认为“还有希望”的回复，正如近卫所预料的那样：“天皇还期待着决战以后再结束，而实际上，既不能在冲绳予敌以歼灭性打击，也不能指望冲绳有较好的战绩了。在冲绳战局了然若揭之时，正是转换的时机。”（《近卫公爵传言记》1945年5月13日项，见前述《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冲绳之战的战局加大了天皇实行政策转变的决心，成为一大转机。

近卫上奏时，通过木户再次询问天皇关于结束战争的意见，对此，木户虽然转达了天皇继续战争的态度：“绝对不接受全面解除武



装和处罚责任者。如果那样则战至最后”，但是接着也表达了天皇态度的变化：“最近（5月5日的两三天前），陛下的心情有了变化。而对这两个问题也是不得已了。不仅如此，甚至反倒觉得尽早才好。虽说是尽早，但是也要注意时机问题，不过我觉得这已经是天皇做出决断的时机”（同上），他已预测到“天皇决断”即“圣断”。

松平康昌秘书官长也证实，这一时期“天皇也对首相说过是否应该考虑结束战争”。可见冲绳战局给天皇的打击之大。

天皇的态度变化与天皇所信任的陆军主战派丧失自信有很大关系。据松平所说，“一个熟悉陆军内部情况的人说，毫无疑问，陆军在冲绳失陷后变得失去了自信”（《1945年5月14日项，松平侯爵谈》，同上），米内光政海相也就结束战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陆军“大概软下来了”（《1945年5月17日项》，同上）。

于是，以冲绳之战为转机，天皇和陆军主战派一下子丧失了继续战争的自信，这才开始探讨了真正结束战争的政策转换。这证明天皇试图以冲绳之战为最后决战的战场，给予美军以打击，阻止战局恶化的计划是多么的不现实。

## 第三章

### 决定“圣断”的过程及其真相

“顺利的话，能够讲和，即使不顺利，也会因此加强国民的团结，使士气高涨，将战争坚持到最后”

——昭和天皇的发言（摘自实松让《米内光政备忘录》）

#### 1 “圣断”初期的设想

##### “稳健派”势力的复权

1945年4月5日，召开了确定小矶内阁后继人选的重臣会议。

会上，东条英机就下届内阁定位问题指出，必须明确其是坚持战争的内阁，还是和平终战的内阁。东条代表陆军主战派的意向，牵制重臣们“和平”工作的进展，正在计划以陆军主战派为核心，组建陆军内阁。

与此相反，冈田启介表示，成立集结国家总力的内阁即举国一致的内阁才是当务之急，结束战争或继续战争则是次要的问题。冈



田基于举国一致组阁计划，希望阻止陆军主战派的战争路线，扼制陆军，成立以和平推进派为核心的内阁。

在重臣中间，最强硬地坚持继续战争论的东条英机称，作为应该站在本土决战立场的首相，陆军军人最为合适，并推荐了畑俊六元帅。

木户幸一挫败了东条英机的陆军内阁论，提出了“必须建立一个既受国民信任而又稳健的内阁”（《木户幸一日记》1945年4月5日项）。他暗示：陆军已经失去了国民的信任。

处于劣势的东条英机虽然一语道破内心的反抗：“现在国内即将成为战场，如果不能备受重用，陆军有可能发挥不出作用”（同上），但是冈田等持反陆军态度的重臣们反驳了这一观点，东条英机的主张最终没有占得上风。鼓吹本土决战的陆军也已经失去了在政界上层维持政权的影响力。

然而，平沼骐一郎指出，“此时必须选择战斗到底之人。不能推选停战和平论者”，并主张坚持战争内阁，随后若槻也与之相附和地说：“推选为胜利而战的人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为下一届内阁设计出了一个非陆军内阁但却是继续战争内阁的框架。

而另一方面，与冈田启介立场一致的近卫表示，此次重臣会议的目的旨在推荐后继的首相，而并非审议战争指导方针。

同时，近卫注意到陆军主战派的动向，并指出“陆军的势头如果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终究不会看到转机”（《近卫公漫谈》1945年4月22日项，见前述《高木樾吉日记与情报》下卷）。他预测，



即使暂时阻止了陆军掌权，依然不能放松对陆军主战派的警惕，当前会实施陆军的阿南惟几和梅津美治郎的本土决战方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说，近卫认为，即使铃木内阁成立，只要没有完全扼制陆军主战派，就没有政策转变的希望。这也是与冈田、若槻等稳健派重臣们的共识。

因此，虽然成功地扼制了陆军内阁，选出了海军派代表铃木内阁，但是由于铃木内阁具有坚持战争内阁的性质，所以有必要得到陆军主战派的支持。进而，铃木新内阁也就在主战派与稳健派的较量中提出了将要坚持战争的政策。

那么，为何向铃木海军大将委以重任呢？按照高松宫的说法，暂且概括为“第一是天皇的巨大信任，第二大概是能够按天皇的意志实施政治策略，第三是意志坚强”（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4月3日项）。

即铃木被认为是由于天皇对其的信任，作为一位能按天皇的意志扎实执行结束战争的政策转变的内阁，才推举铃木实施“结束战争”的大任。

这就是“圣断神话”的关键要素：即“圣断”是在天皇与铃木内阁的合作下，从内阁成立初期开始计划，并在扼制陆军主战派抵抗的情况下实现的。

但是，并不能认为天皇从铃木内阁成立伊始就已经坚定了政策



转变的决心，铃木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内阁定位为和平内阁。内阁成立伊始，天皇依然对冲绳的战局寄予期待，如上一章所提的那样，与陆军的本土决战论相比，他更期待着在冲绳的决战。

至于重臣们也是如此，冈田和木户的反陆军态度并非直接意味着战争政策转变。在这个问题上，由于陆军的怀柔政策和铃木内阁的成立，冈田“在谋略上敢于主张主战论”的观点，仅仅是建立在战后盛行的对木户、近卫、冈田等所谓“稳健派”“和平派”为解释前提的推论而已。

#### “和平”工作被封杀

铃木内阁的成立，使“稳健派”首先阻止了陆军内阁，并从陆军手中夺取政局主导权，独自掌控政局。可以说这是自东条陆军内阁以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稳健派”重臣和宫中集团重新掌权的标志。

当然，这些“稳健派”势力并不是试图改变战争策略而团结一致，而是暂时在掌握政局中表示出了反陆军的态度而已。

在这些“稳健派”中间，还没有围绕政策方向而达成一致见解，在结束战争这一点上，与其说如同冈田启介的发言所表明的，不如说显然是在迎合陆军。这种战争政策的反陆军立场和在结束战争问题上对陆军的迎合，产生了很是奇怪的现象，也许就是号召本土决战的陆军认识到与宫中和重臣集团合作的必要性，承认海军派的铃木内阁，继而与宫中和重臣集团达成妥协，以期待铃木内阁基本上



坚持继续战争的政策。

从铃木深得天皇信任这一点来说，东条所推荐的畑俊六，虽然不及担任侍从长一职长达七年之久的铃木，但毕竟也担任过侍从武官长（1939年5—7月），此外在阿部信行内阁（1939年8月3日成立）时期被天皇破格提拔为陆相，说明畑俊六也是天皇极为信任的陆军大将。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深受天皇的信任，而是作为在陆、海军与宫中及重臣集团两者之间较量中妥协的产物，导致了铃木内阁的成立。也可以说，在陆、海军及宫中与重臣集团的政界上层中并不存在一致的政策转变方针，即使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秘密会议（5月14日）确定开始“终战”工作以后，在内容和具体方针上的制约条件分歧也还是很大的。

铃木内阁在推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所决定的开始“终战”工作的同时，还继续提出了强化以本土决战准备为前提的国内局势政策。例如，在从6月9日开始的临时议会上，颁布了《战时紧急措施法》《义勇兵役法》《国民义勇战斗统率令》等6项法案，谋求彻底发动全体日本国民。

《战时紧急措施法》将超越《国家总动员法》（1938年4月颁布）的内容，将专制性权限授予政府，《义勇兵役法》和《国民义勇战斗统率令》要求从15岁至60岁的男子和从17岁至40岁的女子都要服兵役，编入国民义勇队，作为正规军的后备部队随时准备本



土决战。

天皇也在颁布《义勇兵役法》时发表上谕，主张决战，具体内容有：“朕际会旷古之难局，对忠实之臣民奋勇挺身防卫皇土发扬国威甚表嘉许，经帝国议会赞同，御准《义勇兵役法》，予以颁布”（前述《大本营陆军部》）。

此外，6月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正式决定了本土决战方针。在其开头指出，“最终结束战争，用以维持国体，保卫皇土，以期达成征战目的”（前述《败战记录》），明确表示了通过彻底抗战继续战争的决心和本土决战方针。不过，关于这部《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的制定过程，正如丰田军令部总长在归纳冲绳之战时所说的“冲绳作战予敌以重创，其结果将延迟敌人之后的进攻”（《关于〈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的御前会议经过概要》，同上），这份文件是建立在陆海军当局所希望的乐观期许之上，只不过是完全缺乏具体实施的纸上空谈罢了。

陆海军的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国民的厌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如此形势下，天皇仍在战前最后一届议会——第八十七届临时议会开院式（1945年6月9日）上发表敕语：“值此世界大局剧变，敌之侵犯亦加倍猖獗之际，即将粉碎敌国之奢望，达成征战之目的，以应发挥国体精华之秋”（前述《天皇敕语与昭和史》），在日本因德国无条件投降而遭到孤立、盟军的攻势正在向日本本土发展的形势



下，依然命令“粉碎敌国之奢望”，“达成征战之目的”。

无论这一敕语是在什么背景下发布的，天皇这一时期在议会开院式上命令抵抗到底，至少在表面上是对以结束战争为前提主张“和平”工作舆论的封杀。因此，能将“和平”挂在嘴边的只有天皇本人或者宫中及重臣集团与其亲信们，也只有绝密地进行政策转变的方法了。

### 迫使天皇 “决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假如存在“和平”工作的话，那么这种“和平”工作并非是从做出牺牲的日本国民的角度出发，而是只考虑天皇及天皇制统治体制，旨在以保护国体为前提的“和平”工作。

行使专制权限的日本政府和天皇相继发表强硬声明，同时以陆军主战派为核心的军部对“和平”工作进行严密监视，重臣党羽则追随天皇顽固的继续战争的意志显得软弱无力，这些都使“和平”工作变得制约条件重重、缺乏具体性。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广泛地收集和平政策的具体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出举国一致的和平方针，确定协议的对象，进而听取各界各阶层的意见，才能最有效率且迅速地结束战争，否则，“和平”工作是无法得以实现的。

而事实上，结束战争或走向和平的努力最终只停留在追求密室中的“和平”，即各集团或重臣们反复表明个人见解的过程中。这也





是在毁灭性的战局面前，一再错过政策转变的机会，造成日本内外不断加剧牺牲的主要原因。这里也有包括天皇在内的政治军事领导层的重大政治责任。

从敕语中能看到天皇决战态度的变化，天皇本人在冲绳之战失败时，随着败局的临近，开始对战局的走向表示出动摇和不安。这一时期，基本上出于对天皇影响力的考量，近卫关于向结束战争政策转变的计划，基本上是建立在与木户幸一一致的态度之上的。

正如近卫对其亲信、贵族院议员富田健治所说：“如果综合铃木首相、木户内府的意见，由陛下做出决断的话，即使陆军表示反对，也不能坚持到底”（《富田健治贵族院议员联络》1945年5月9日项，见前述《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其估计是：铃木、木户的观点在政策转变这方面是一致的，如果能动摇天皇，使天皇也不得不决断，那么有了天皇的决断，陆军也不得不服从。

因此，近卫首先向对天皇有影响力的木户咨询了天皇对结束战争的意见。木户回答说：“先前，天皇曾说过，绝对不允许全面解除武装和处罚责任者，如果那样则战至最后。天皇的意见是如果解除武装苏联就会进来。因此，要缓和陛下的心情需要花很大精力。但是最近（5月5日的两三天前），陛下的想法有了变化。”这时，天皇反而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甚至表示出“我觉得天皇做出决断的时期已经到了”这种意味深长的观点（以上见《近卫公爵传言录》

1945年5月13日项，同上)。

同样的证言还记录在《细川日记》中，据木户称：“最近陛下可能自己思前想后，开始用心于结束战争，莫如说转变得令我们有些困惑，竟然说‘如果确定那样做好，那么岂不是越早越好！’”（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5月24日项）

关于天皇态度的变化，德国无条件投降（5月7日）和冲绳战局恶化显然是最大的要因。在德国投降的第二天，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因德国战败导致的在国际上的孤立和冲绳战局恶化而丧失对本土防卫的自信，使天皇对美军决战论的观点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以此为契机，天皇第一次对亲信表示了日本战败的可能性，同时，对天皇制产生深刻的危机意识。从天皇所说的“如果确定那样做好，那么岂不是越早越好”的说法中，可以看出其严重的焦躁感。

#### 收拾残局的对策试行方案

木户幸一从天皇态度的变化，意识到政策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从而开始着手制定避免天皇制统治体制崩溃且尽快结束战争的方案。这就是6月8日提出的《应对时局对策试行方案》（前述《木户幸一日记》，1945年6月8日项）。

在6月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以沿袭陆军主战派意向的形式，明确了本土决战方针，这同时使终战工作的政策转变戛然而



止。可以想象，如果强行实施基于本土决战方针的彻底抵抗政策，将会进一步导致国力衰退，相应地对战后日本的复兴也更加不利。

天皇在对终战工作的态度越发明朗的同时，又认可了陆军主战派强硬做法的做法，这使木户幸一更强烈地感到彻底失败将破坏天皇制统治体制，即对于国体破坏的危机意识。

因此，木户通过本土决战方针的翌日，即6月9日推出《应对时局对策的试行方案》，积极地制定应对战局的政策转变纲领，并制定了结束战争的计划。其简要内容如下：

木户首先承认了冲绳之战以失败而告终的事实。根据在御前会议上提出的国力现状调查结果，显然日本已经丧失了继续战争的能力，因此如果坚持继续战争，将要遭受重大空袭等损失，国内必然陷入更大混乱。

他指出，“基于以上观点，我相信此时果断地采取措施，设法应对局势是现在对我国的至上要求”，敌方和平攻势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倒军阀，本来由军部倡导和平，政府据此进入和平谈判更为妥当，但是坚持继续战争的军部并没有这种准备，如果照此下去，“必将重蹈德、意两国的覆辙，陷入达不到皇室安泰和维持国体至上的惨境”。

因此他提出，要打破这一局面，扼制军部的继续战争论，断然实行政策转变，虽然是极为破例且委实不敢当地惶恐之至，但是为

了日本国万民，希望天皇陛下果断决定，必须以如上方针来收拾战局不可，以此明确提出以天皇的“圣断”实现政策转变的方针（同上）。

依靠“圣断”断然实行政策转换的构想，在迄今为止秘密进行的“和平”工作中，也是早有设想，但是政策转变的关键性人物木户幸一提议与天皇联动，以天皇的权威为后盾，以“圣断”为最后王牌的建议还是第一次。

天皇和木户都已深知战局的恶化，终于决定行使通过“圣断”的方式，避免体制崩溃危机。

当然，“圣断”的目的在于维持天皇制即维持国体，称之为“为了万民”，不过是表象而已。

实际上，如果真是“为了天下万民”，早应该立即结束战争。事实上，日本政府一面戒备并牵制军部的动向，一面为从同盟国方面获得维持国体的保证而周旋，仅仅在这一点上就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圣断”的计划并非试图立即从战争的灾害中拯救日本和日本国民，只不过是為了將战争失败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转移的一种政治性伎俩而已。

因此，实施通过“圣断”拯救国民的伎俩中，使包括天皇在内的上层官僚的政治责任不受追究。总而言之，通过天皇—木户间的



协调，开始了结束战争的努力。

## 2 对苏工作与政策转换的决心

### 以苏联为中介

4月5日（1945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知日本，将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由此可以预测远东苏军将参加对日作战，因而在军部内部开始为避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而与苏谈判，并通过苏联的斡旋推进“和平”工作。5月7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和翌日（8日）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着手“和平”工作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铃木内阁在5月9日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指出“欧洲战局的剧变并未给帝国的战争目的带来丝毫变化”（前述《战败记录》），与德国投降的新事态无关，日本准备独自向继续战争迈进。

同样，铃木首相在谈话中还指出，“我抱定奉献全部绵薄之力战斗到底的信念。希望国民诸君也如同前线的特攻勇士一样，为了祖国防卫的圣业而怀抱超越生死的希望同舟共济”（同上），丝毫未向国民透露“和平”工作或“结束战争”的意愿。

虽然在表面上丝毫也没有政策转变的征兆，但是军部已感到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威胁，开始出现了以苏联作为“和平”中间人来摸索结束战争途径的倾向。



对苏工作的前提是担负中国东北（满蒙地区）防务的关东军战斗力低下，相反苏联远东军军力增强。

因此，在5月8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确定了希望与苏联进行和平斡旋的方针，且讨论派人前往苏联谈判（前述《大本营机密日志》）。接着，在5月11日至14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也讨论了对苏问题。陆军要求制定出防止苏军参战的具体方案，海军期待促成苏联的友好态度，寻求购买石油等资源的途径。

但是外相东乡茂德对于陆海军的方案极为悲观。他认为，时至雅尔塔英、美、苏三巨头会议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方针即已确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已经毫无利用苏联的余地了”（东乡茂德《时代的一面》）。

并且，东乡外相认为陆军对苏谈判的计划“如果认真去实施，必须放弃使美国丧失斗志的想法”，并指出“英美能够接受是非常不现实的”，批评了陆军在外交上的不现实性（《东乡外相内话》昭和二十年五月十六日、十九日项，见前述《高木樫吉日记与情报》下卷）。

不过从实际情况出发，东乡外相也是遵照梅津参谋总长的“针对英美能够以对我方相当有利的条件进行斡旋的，应该只有苏联”的意见和铃木首相的“因为感到（苏联）不错，所以才认为以苏联为和平中间协调为好”（前述《时代的一面》）的判断，把苏联作为与盟国的中间协调进行谈判。



于是，5月14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决定了对苏谈判方针并付诸实施，广田弘毅前首相被任命为日方谈判负责人。但是，对苏谈判的方针，在政府内部虽然就阻止苏联参战及保持中立状态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委托“和平”中间协调的问题上，由于未与陆军之间进行协调，对苏谈判与“和平”中间协调实际上也是分离的。

在6月23日实施的广田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的会谈中，议定7月10日派遣近卫赴苏，但与“和平”即结束战争计划无直接关系。除此之外，军部虽然未言及对于日本外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将盟国一员的苏联作为与英美取得协调一致的“和平”中间协调，保证与盟国方面谈判的外交敏感度。

这种外交状态与外交姿态也成为使结束战争比需要的时间更加延迟的一大原因。

### 政策转变的决议

在正式通过本土决战方针的情况下，军部又于6月9日首先向天皇详细报告了结束战争的方案。即《收拾时局对策试行方案》。接着，6月13日向铃木首相，15日向米内海相，18日向阿南陆相提交了该方案。除阿南陆相以外，包括天皇在内，都欣然接受了。

然而只有阿南陆相重复了先前的“一击论”，其主张继续战争的态度未有改变。不仅如此，在陆军内部，还有要求主导“和平”工作的木户幸一下台的呼声，甚至升级为恐吓。木户和陆军之间的蜜月时代行将终结。



在6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针对英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会议制定了继续彻底抗战，在有“战斗力”的情况下通过第三国的斡旋来开展“和平”工作的计划，和以维持国体为条件实现“和平”的方案。总之，是以苏联为中间协调的“和平”工作与坚持本土决战方针的继续战争路线两者并行。

这两条路线并行，最终没有形成战争指导层的强有力的统一方针政策，同时暴露出战争指导的不力和矛盾。

从此时开始，举足轻重的天皇所发表的下定决心进行结束战争的政策转换发言变得很引人注目。

例如，6月20日东乡外相在汇报对苏谈判过程时，天皇希望促进对苏谈判（外务省编《终战史录3》）；再如，6月22日天皇应木户幸一的请求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铃木首相、东乡外相、米内海相、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指示尽快将“终战”工作具体化。

会上，天皇指出：“关于战争指导，先前已在御前会议上做出过决定，但关于从其他方面结束战争，此时不必囿于过去之观念，望尽快开展具体研究，努力落实之”（前述《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6月22日项），命令尽快实施与本土决战方针并行的结束战争方案。

天皇仍继续认可陆军主张的本土决战论，同时开始寻求结束战争途径和方法。这已经与先前木户幸一《收拾时局对策试行方案》





的计划相一致。

御前会议本来是根据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两位统帅部长官的奏请而召开的，但是这次是天皇亲自召集。这种破例的形式，更显示出天皇及木户对政策转变方针是相当坚定的。天皇如此主动的表现说明：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轻易变化的继续战争的意志发生了变化，维持国体的危机感也瞬间加深。

德国投降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敦促日本投降，随即美军占领冲绳。此外，6月9日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总数，合计只有相当于美国的8个师左右，弹药也只能维持一次会战。从梅津参谋总长奏折所述的内容中，连天皇也无法支持陆军所主张的维持国体、继续战争及本土决战的强硬方针了。

在天皇召集的御前会议上，天皇亲自就收拾时局问题向与会者做出了提问。对此，铃木首相主张继续战争与外交谈判并用，米内海相指出了先前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的以苏联为中间协调来结束战争的方案，东乡外相认为必须就以苏联为中间协调所付出的代价和讲和条件准备作相当大的让步。

然而，对于既不放弃继续战争，同时也仍对和平谈判显露出消极态度的梅津参谋总长，天皇要求其重新考虑：“你说必须慎重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此不是反而会丧失时机吗？”这引出了梅津的“我认为必须尽快”（田中伸尚《档案·昭和天皇》第五卷·战败·下卷）的建议。于是，天皇断然地发挥主导权，迫使有强烈抵触的



陆军首脑层同意结束战争的方针。

一直以来，天皇发挥主动性是与天皇的国体危机认识程度相一致的。只要天皇容忍陆军的继续战争路线，陆军便成为天皇忠实的战争指导的代理人。

但是，一旦天皇的意图与陆军之间发生了偏差，陆军对政局的主导权将被天皇及木户的政策转变方针逐步夺走。余下的问题是对于接受天皇这一意向而开始对结束战争方针呈妥协态度的海军派和军中的中坚层。

凭直觉，他们认为在以宫中及重臣集团为主导的结束战争计划中，如何从盟国得到维持国体的保证，其方式手段并不可靠，此外还有解散军事机构的可能。因此，在军队内部握有实质性主导权的军队中坚层，对于试图推进结束战争政策方针的宫中及重臣集团来说，将是最大的阻碍。

### 对苏外交工作受挫

在这种情况下，7月以后，天皇开始对日苏谈判显示出积极的姿态。7月3日，天皇找来侍从长，指出：“问问木户对苏谈判怎么样了”（藤田尚德《侍从长的回忆》）。

随后，7月7日，天皇召见铃木首相，指示其尽快促成谈判：“尽快派遣特使去开展对苏外交”，显示出其对日苏谈判很是期待。同时，天皇自己也对铃木首相谈了对苏谈判的目的：“顺利的话，能够媾和，即使不顺利，也会以此来加强国民的团结，从而导致士气



的高涨，将战争继续到最后”（以上，实松让《海军大将米内光政觉书》）。

对苏谈判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它的失败反而会导致国民士气的高涨，对于天皇的这句话，很难让人欣然接受。只是恰当地表现出了天皇希望尽一切可能尽快结束战争的焦躁感。天皇以苏联为中间协调来打开局面的焦虑和期待交织在一起的想法不断深化，后来又制定了派遣近卫文麿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的计划。

接着，在7月10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会议）上正式决定向苏联派遣特使。天皇对此表示同意，于7月12日要求近卫文麿就任赴苏特使。至于此间的日苏谈判，按照在7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的以苏联为协调开始与盟国谈判的方针，一直处于中断的广田—马立克会谈也于7月24日重新开始。

马立克大使在会谈中要求日本提出具体方案，日方则以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伪满洲中立化、取消渔业权等一些条件相对应。然而，至7月29日会谈结束，马立克大使没有回应日方今后继续会谈的要求，日苏谈判搁浅了。

不久在德国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召开的美、英巨头会谈上，苏联方面在对日态度上已经与盟国方面基本一致。因此，继续日苏谈判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必要了。即便如此，为谋求促进日苏谈判和打开局面，还是决定派遣特使。

天皇认为，促成近卫携带天皇的亲笔信会见斯大林，通过苏联



的斡旋来结束战争，这是维持国体的最佳途径。但是对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来说，则多少有些唐突。米内海相等透露，“亲笔信这件事并非木户及其他下属的意见，似乎完全是天皇的设想，但是尽管这样，过分焦虑也无济于事”（《米内大臣直言 1945 年 7 月 9 日项》，见前述《高木惣吉日记与情报》下卷），预示着派遣近卫的决定也是按天皇的意向行事的。

但是，对于通过派遣近卫去请求苏联担当中间协调就如同东乡外相自己分析的那样：“苏联的态度与四五月份相比，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感觉简直就是上演了一场如同以濒死的病人（指日本——笔者注）被对手的伎俩愚弄”（《东乡外务大臣直言》1945 年 7 月 10 日），苏联的答复是：派遣近卫特使的目的不明确，无法做出是否同意的判断。

日本虽然表达了以对英美进行和平斡旋和加强日苏关系为议题的意愿，但是加之外交程序错误的原因，前期谈判未能取得进展。

受命赴苏的近卫当场被天皇问到对收拾时局的意见，他指出：“民心并不昂扬，充满着一种期望天皇而天皇却束手无策的心情，并且偶尔能听到似乎怨恨天皇的传言”，表明担心舆论正在向危险的方向发展。他还指出：“我坚信必须尽快终结”（前述《木户幸一日记》1945 年 7 月 12 日项），主张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此时，近卫痛感必须尽快结束战争，天皇也就这一意愿对木户谈过自己的感想：“我认为此次近卫也好像下定了决心。”（同上）



至此，天皇总算接受了近卫的尽快结束战争论。

天皇舍弃军部，转而同意近卫的唯有尽快结束战争才是维持国体最佳方法的见解，并派近卫作为天皇的代表，将其推到了对苏谈判的前台。

这同时也意味着形成了天皇—近卫—木户的“终战”工作推进核心。天皇期待的对苏工作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后来因“圣断”而完结的“终战”工作却是由这个核心导演和转入实施的。

#### 天皇的亲笔信

接受天皇赴苏之命的近卫立即召集智囊着手准备制定与苏联的斡旋方案。在会见天皇时，近卫获得了很大的与苏联谈判的临机处置权，企图采取非常的手段——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以预先决定的条件经天皇敕裁后即可决定（近卫文麿《迷失的政治》）。

7月15日，近卫会见了外务省松本俊一次官，近卫称：“自己打算带一张白纸前往……到了莫斯科后，准备将斯大林的意见直接转达给天皇陛下”（前述《终战史录3》），显然，这是打算以近卫—天皇的计划通过苏联的斡旋一举实现结束战争，外务省也不会等待对近卫赴苏抱有戒心的军部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战争指导部作出判断。

这正是依靠“圣断”实现日苏谈判的妥协和以此结束战争。近卫集团的成员之一酒井镐次起草的《和平谈判纲要》提出了维持国体的方案，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在最坏情况下的让步方案，诸如天

皇主动提出让位，暂时取消军备，容忍外国军队部分占领，放弃日本占领地区等（富田健治《战败日本的内侧》）。

从近卫的分析来看，如果最终的目标在于维持国体，那么不接受容忍和让步条件，则以苏联为中间协调的和平谈判是不可能达成的。

该《和平谈判纲要》的内容中包含一部分后来的《波茨坦宣言》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内容是现实而灵活的，但也是陆军主战派最终无法容忍的内容。

在近卫做派遣准备的同时，外务省也在准备向苏方转达近卫赴苏目的和天皇亲笔信（前述《终战史录3》）。

但是，其内容字面上写的是“天皇陛下对此次战争给交战各国国民带来的惨祸和日益增大的牺牲而感到痛心，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采取了好像是第三者强加给国民的“惨祸和牺牲”的写法，只字未提因天皇的“圣断”而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之责任所在。字里行间也丝毫看不到对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充斥着战争是自然发生的而非人为现象的内容。虽然天皇作为日本最高政治军事领导者，但至少从这份文件中读不到他的自责和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即便这不是天皇本人撰写的，但既然是经过认可的文件，当然就应该认为是准确地表达了天皇的意愿。

信中还提到了与盟国的和平谈判，天皇的态度是“在大东亚战争中，只要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日本唯有为了帝国的荣誉和生存



而不顾一切战斗到底，因此徒增敌我交战国国民之流血诚非本意。为了人类之幸福，希望尽速实现和平”（同上）。

获得关于天皇的地位及天皇制的未来保证，成为谈判的第一条件，关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隐藏了日本在未得到其保证的情况下，坚持绝不能结束战争的态度，因此影响和平谈判进展的障碍，单方面地在英美一方。

实际上，天皇亲笔信的最大目的是维持国体和通过苏联作为中间协调获得对此之保证。东乡外相7月12日对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发出训电，通知他近卫将携带这封意义不明确且未提出任何具体方案的亲笔信前往苏联。

但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由于出席波茨坦会议而离开莫斯科，苏联外交当局对这份亲笔信的内容和近卫特使的到来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通过波茨坦会议，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并已进入准备阶段，因此，完全不理睬作为谋求“和平”的秘密文件——天皇亲笔信和派遣近卫特使的企图。日本政府和天皇仅仅为了维持国体而联络苏联，继续浪费着宝贵的时间。

如果真的想要实现亲笔信中避免“国民的惨祸和牺牲”的措辞愿望，就不应该顽固地坚持维持国体，而应无条件地尽快达成外交妥协。因为“国民的惨祸和牺牲”的现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了。即便如此，陆军派继续鼓吹本土决战论，以维持国体为最终目



标。继续下去，那么日本国民不可避免地将付出更大的牺牲。

### 3 采用“圣断”方式的原因

#### 《波茨坦宣言》的发布

意大利和德国投降后，只有日本还继续与同盟国作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围绕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各方角逐已经悄然开始。

在与英美的谈判中，苏联就雅尔塔会议所制定的战后利益分配方针取得了最后结果，确保了战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地位，进而影响在未来美苏争霸时代的格局。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暂时与英美保持一致，将日本作为共同的敌人。

另一方面，美国于6月22日正式宣布冲绳之战结束。美国成功地占领了冲绳，全力通过空袭日本本土来破坏日本国力，为全面进攻做准备。另外，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了获得战后世界新格局中的主导权，美国是不会接受日本通过日苏谈判来实现“和平”的要求的。

7月17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杜鲁门（美国总统）、丘吉尔（英国首相）和斯大林（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谈。正如日本所预料，美苏的共同立场，使日本的“和平”愿望破灭。当然，日本国内对此是无从知晓的。



波茨坦会议结束后，7月26日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这是在美国主导下拟定的公告。其原案就是于先前7月2日由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对日计划草案及备忘录》及《联合声明草案》。

其中，包含了美军以优势兵力攻击日本本土从而消灭日本军队的可能性、永久驱逐战争主导者、日本主权限定为本土、占领日本的盟军在建立和平政权的适宜时机撤军等内容。并就举足轻重的天皇地位作出判断：如果表明“不废除现在的皇室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那么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会很大（中村政则《走向象征天皇制》）。

在投降条件中，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最关注的也是天皇的地位及天皇制的续存问题。在美国政府内部及舆论上，大体上分为天皇制废止论、保留利用天皇制论和保留天皇制停止其功能论三种意见。经过太平洋战争，舆论的焦点由废除、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转向展望战后政治重建，美国的对日舆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总而言之，战争初期，是天皇制废止论占上风，而在战争末期则出现了保留利用天皇制的论调，尽管在政府内部也重复着多种议论，也有长期担任美国驻日大使、在美国国务院内被称为日本通的实力人物格鲁等人的活动，最终在政府内部认识到天皇及天皇制是占领统治日本的不可缺少的稳定势力。

总之，按照《对日计划草案及备忘录》及《联合声明草案》的



脉络，美国的对日声明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了《波茨坦宣言》的草案。

草案指出，在日本建立和平政权，该政府具有不再图谋侵略的性质，在其为全世界接受时，“可以包含现皇室下的君主立宪制”（同上）。

在这些所谓的“天皇条款”中，共同的一点是未明确表示保留天皇制，均以建立永久的和平政权为基础，以一定条件的实现为前提。这也是考虑到了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在中国、英国等其他同盟国内也依然存在的天皇制废止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皇条款”与其他条款相比，是遗留有更多暧昧性和抽象性的内容。不过，在7月26日发表的总计十三条内容构成的《美英中三国公告》（通称《波茨坦宣言》，亦称《波茨坦公告》）中，删除了这些“天皇条款”。

如果说与之有关联的地方，那就是第一条的“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撤退”（同上）。

其他条款虽然大体准确地承袭了史汀生的《对日计划草案及备忘录》及《联合声明草案》，但是只有“天皇条款”最终在美国政府内部是主张应删除任何暗示将保留天皇制这一字眼的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及军方的强硬意见占了多数。

从日本政府的立场上看，它完全无视了维持国体，是战后政治



体制最终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决定的内容。不难想象，它在将维持国体作为金科玉律来致力于结束战争的宫中及重臣集团或者称为“稳健派”的这些集团的亲信们中间引起不安和动摇。

况且，《宣言》的第九条明确指出，“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其返回家乡，取得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这必然遭到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对。

### 等死而已

收听到《波茨坦宣言》后，日本政府首先是外务省开始讨论《宣言》。在7月27日的外务省干部会议上，确认接受《宣言》、结束战争是尚存的唯一方法。

然而，最终仅达成了消极应对的意见，即虽然许可将《宣言》的内容全文见报，但是没有就具体对策发表任何声明。外务省认为他们，当前即使进行日苏谈判，也必须留出就《宣言》内容与盟国方面的真实目的进行照会的宽裕时间。

东乡外相于当日上午拜见了天皇，呈送了《宣言》的译文，并提出，希望对《宣言》慎重应对，日苏谈判目前尚在进行中，待看清其发展后再作结论。天皇接受了上奏，据说他对《宣言》并未表态。不过，据加濑俊一说，天皇此时称“原则上可以接受”，但是无法确认其真实内涵（加濑俊一《走向密苏里号之路》）。

天皇和外务省都依然期待通过日苏谈判实现和平，在看清谈判发展之前，即使“原则上可以接受”，毕竟还没到立即接受的地步。

据东乡外相日记记载，在当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成员会议上，丰田军令部总长提出，如果不对《宣言》做出任何反应，采取无视的消极态度，有可能对军队的士气产生不良影响，日本政府应当公开表示坚决拒绝的立场。接着，在当日下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了解到外务省此前的判断后，决定公开发表的文稿按情报局要求以尽量不醒目的形式刊登。

翌日（28日），各报刊登了《宣言》的内容。例如，28日的《读卖新闻》以“可笑！对日投降条件”为题，将其含义报道为盟国“国内对日脚踩两只船，是狡猾的谋略”，还作为日本政府声明报道说：“向完成战争迈进，帝国政府视其是问题”。铃木首相甚至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对《波茨坦宣言》的看法时断言：“政府认为没有什么重大价值，仅仅是不予理睬”（前述《终战史录4》之《7月30日报纸报道》）。

在铃木首相的“不予理睬”发言中，无疑有笼络要求尽快表明拒绝接受《公告》的军部的意图。

实际上，在《波茨坦宣言》中，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内容是极有限的，而且都是有利的解释和要点性的条款，第九条“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可以获得和平的生产生活之机会”的内容仅归纳为“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其内容的原意事实上都被隐瞒起来，这说明了军部对《宣言》内容的强烈反对态度。



此外，第一条至第四条隐瞒了全文，其中第四条“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政策的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地，军人统制，或走向理智之路”的字句，表明同盟国明确地批判性地抓住了日本的战争指导是由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势力主导的底细。

当然，《波茨坦宣言》还围绕处理战后问题做了展望，认为作为对日政策的前提是战后日本的国家状态应是日本国的主体性选择，显示出了依据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决定而选择道路的方针。

从这个意义上说，《波茨坦宣言》显然是以倡导和平的内容为主的。日本政府无视《宣言》的根本原因，除了对军部势力的顾虑和对《宣言》内容的不相信之外，还在于日本的统治势力完全不信任日本国民。

总之，不断寻找避免《宣言》明确指出的以国民主体性政治的方法，是最终拖延做出接受《宣言》决定的主要原因。

不过，对于军部要求发表明确拒绝《宣言》的正式公文，外务省和政府都未予同意；对于隐瞒部分内容后再在报纸上发表，首相“不予理睬”的态度，军部也妥协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军部势力也在退让。

因此，铃木首相“不予理睬”的态度与其说是迎合军部而妥协的产物，莫不如说至少是以天皇及日本政府为主体做出的判断。

由此看出，天皇及政府并未放弃在苏联斡旋下进行和平谈判的

方案，并且认为：与没有明确表明“天皇条款”，原则上听凭“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这样与同盟国直接谈判，是无法获得维持国体的保证的。

即使到了最后阶段，天皇仍然对完全无望的日苏谈判寄予期待，错过了结束战争的最好时机，只是坚持维持国体，不顾及日本国民因战争带来的伤害，各统治势力的这种政治责任实在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虽然日本政府内部围绕《宣言》的评价和是否接受《宣言》的问题而产生了种种对立，但是从代表日本政府的铃木首相口中说出的“不予理睬”则成了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予理睬”的态度是重大的政治失误。

#### 围绕接受《宣言》

战后，铃木首相在涉及当时的发言时回顾道：“此乃余诚感遗憾之点”（铃木贯太郎述《终战的表情》）。

然而，“不予理睬”的态度显然会被盟国方面理解为表明了继续战争的立场，应该懂得这一点的铃木首相没有行使自己的职责，迅速做出接受《宣言》的决断，因此其责任是极为重大的。在这种刻不容缓的情况下，不能允许犹豫不决的态度。就这样，自《宣言》宣布以来，日本政府耗掉了宝贵的时间。

此时，天皇也只是一味等待来自苏联的答复，没有打算采取任



何结束战争的有效行动。在此期间，天皇对木户幸一说：“要是能把伊势和热田的神器移到自己身边来守护就好了”（前述《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7月31日项），天皇想守护作为天皇皇位象征的“三件神器”，并考虑将其搬到信州（松代的大本营）。天皇的这一决心说明，与接受《宣言》尽快实现和平的期待相比，本土决战准备的意识依然强烈。

战后，木户曾就接受《宣言》问题回顾道：天皇和木户本人虽然都希望接受《宣言》的“和平”，但是因为军部内部的强硬派有发动政变或骚乱的可能，所以在立即接受《宣言》的问题上不能不犹豫再三（同上）。这种老套的辩解，自然令人无法接受。

这个重要的时期应该排除一切阻碍也要立即接受《宣言》，进而尽快实现和平，天皇及木户犹豫不决的理由，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从《波茨坦宣言》的内容中未得到关于维持国体的保证。

同时，军队的骚乱加速了国内政治的混乱，并迅速转向对主张“和平”的天皇及天皇亲信的攻击，不难想象，皇室还面临因与军部的本土决战而分裂的危机。客观上，天皇和木户都持同样判断，为了达到维持国体的目的，无奈之中采取拖延接受《宣言》的下策。

美国急于迫使日本投降，同时牵制苏联，掌握占领日本计划的主导权，并确保战后在远东地区的地位。于是，8月6日，首先在广岛，接着又于3天后的9日在长崎投下研制成功不久的原子弹，一瞬间夺走了30多万人的生命。



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世界公布向广岛投原子弹的事实。铃木内阁虽然当日就召开有关阁僚会议商议对策，但是按照陆军的方案，以正在调查为由，将事实对日本国民保密。在大本营战报中，将原子弹称为“新型炸弹”，企图隐瞒出现这一可怕武器的事实，政府最终也附和了这一做法。

随即，东乡外相以投下原子弹为由，提出尽快做出结束战争的决断，对此，天皇答道：“是的。既然使用了这种武器，战争不可能继续，所以不应该为获得有利条件而错过结束战争的时机。”（前述《时代的一面》）

此时，虽然政府内部就和平条件进行了讨论，但是并未达成一致。天皇以尽快结束战争为方向，指示将这一精神传达给铃木首相。

据《木户幸一日记》记载，天皇此时说道：“我认为必须尽快应对时局，因此希望与首相充分商谈。”

至此，天皇不再恐惧谈判对手苏联，而是担心日本发生苏联共产主义革命。与先前坚持日苏谈判相反，表示要避免这种可能，计划与《波茨坦宣言》的盟国方面接触。

尽管如此，天皇仍然表明了一如既往的对结束战争的期望，指示立即接受《宣言》，但是并未准备亲自做出具体措施。对于天皇来说，结束战争、无条件投降和接受《宣言》完全是不同的问题，并没有设想采取接受《宣言》——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的路线的方式。





### 收拾时局的最后方案

苏联将8月9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看作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第一步，基于此比预定时间提前对日参战。于是，在同一天，苏联做出了参战的决定。苏联参战后，天皇及其亲信一下子转向了接受《宣言》。

据说，9日黎明，得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情报后，东乡外相见了铃木首相，主张必须以接受天皇此前指示的形式“尽快决断结束战争”（前述《时代的一面》），铃木首相也表示同意。

在当天上午10时半的最高战争指导会成员会议上，虽然东乡外相主张立即接受《宣言》，米内海相也认为战争已无胜算，倾向于接受，但是阿南陆相坚持反对论：“对于将来固然无法乐观，但是就此结束战争的话，大和民族无异于精神上死亡。”（前述《战败记录》。）

陆军依然重复抽象的观念论，竭力避免因接受《宣言》而导致军队组织机构的解体。

在会议上，米内海相认为首先应决定是无条件接受还是有条件接受《宣言》，东乡外相认为应以“维持国体”作为保留条件，此外不可附加任何条件。与之相反，阿南陆相和梅津、丰田两位统帅部长认为，除了维持国体外，还应就保障占领、解除武装、战犯处置问题提出条件。

会议于是决定有条件接受的方针。对此，他们还就将条件集中



在—项还是四项（—、承认皇室，二、自主性撤兵，三、在本国处理战争责任者，四、保障占领）展开了的论战。

会议本来是决定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宣言》的第五条明确指出“无其他另—方式。犹豫拖延，更为盟国所不容许”，所以《宣言》是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并且，日本政府拒绝要求后立即面临了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的境遇，此时，唯有立即接受并立即停战，才是要求日本当局必须做出的最后政治抉择。

会议最终没能在保留条件的问题上达成—致，在下午2时30分的临时内阁会议上，仍然是东乡外相和米内海相的—项条件论与阿南陆相的四项条件论激烈对立，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导致会议讨论搁浅了。

此间，仅在这一天，木户幸—就先后于上午9时55分（5分钟）、10时55分（50分钟）、下午3时10分（15分钟）、4时35分（35分钟）、10时50分（3分钟）、11时25分（12分钟）总计拜见天皇六次，合计时间两小时，意在随时跟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的进展情况，向天皇请示善后方案。

木户还在当天会见了铃木首相、重光前外相、近卫等，进而还与高松宫通电话，探讨事态的发展和对策。其中，重光前外相认为提出四项条件必会决裂，高松宫认为提出条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正如木户对四项条件表现出了“不好办”“不得已”的感触（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8月9日项），至少9日—上午都在就



四项条件进行协调，天皇也与木户持同一观点，考虑有条件接受。

但是木户通过接触得知，重光、近卫再加上高松宫等都对四项条件论抱有疑虑，同时，他们还曾劝说木户，木户转而向一项条件论倾斜。

特别是在传来长崎遭到原子弹攻击消息时，重光在与木户的会谈中提出：“此时不必依靠对军部缺乏扼制力的政府，应该由天皇直接立即决定”（《重光文书和平的探求·之三》，见前述《终战史录4》），催促他依靠天皇的“圣断”来扼制继续战争派，接受《宣言》从而结束战争。《木户日记》中记录了“四时，重光氏来室，论及提出四项条件则必至决裂，希望妥善处置”（前述《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8月9日项）的内容，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形。

木户了解到时局后，将重光的意见上奏天皇。天皇这才放弃了四项条件论，同意仅以一项条件接受《宣言》。木户更坚定了通过“圣断”来决定的意志。

因此，虽然附加了条件，但是在接受《宣言》的最终决定过程中，天皇和木户以及铃木首相都不能准确地控制局面，最终只能通过“圣断”来接受《宣言》。

此时，促使实施“圣断”方案的，是高松宫、近卫、细川沪贞等置身于政治指导层以外的所谓天皇的亲信和宫中集团。

此时，天皇和木户仍然无法正确理解国际形势，也不具备收拾时局的能力，只是更加深了混乱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日本军部也



是如此。

因此，天皇和木户才最后决定了重臣及宫中集团提议的“圣断”方式。作为最后收拾时局方策的“圣断”就像这样，既不是天皇和木户的“英明决断”，也不是他们的“主体性判断”。

虽然在临时内阁会议上未能做出结论，但是在下午2时50分开始的御前会议上，在进行了一番与内阁会议同样的讨论之后，经天皇、木户、铃木事先商量，在铃木首相“圣断”的要求下，天皇做出了采纳东乡外相的“一项条件投降论”的决定。

其结果，虽然是以皇室、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但是围绕这一内容再次引发了争论。

## 第四章 被继承下来的“圣断神话”

“（昭和天皇）是神。经受了如此的考验仍维持着帝位，非神是办不到的。不是吗？”

——“东京审判”审判长的发言（摘自《木户幸一关系文书》）

### 1 决定投降前后的昭和天皇

#### 认不清时局的天皇

关于天皇在8月9日御前会议上的发言内容，《木户幸一日记》中做了记载，在此仅引用其中重要的段落。

说是本土决战、本土决战，但是最重要的九十九里滨防御都还未完成，而且决战师团的装备也不完备，要补充装备将在9月中旬以后。飞机的增产也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计划总是不能被如期执行。这样怎么能打赢战争呢？当然，战败后就要解除忠勇军队的武装、处罚战争罪犯等，这些人都是极尽忠诚之士，想到这里真是于



心不忍。但是当下是难忍也必须忍。我现在回忆起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的心情，自己是含泪赞成原案的（前述《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8月10日项）。

其内容与战败《诏书》的主旨大致相同，最主要的观点是明确否定了陆军的本土决战论。天皇虽然勉强同意了同年2月近卫奏折中结束战争的方针，但是一直以来对军部的继续战争论都不置可否，其原因就是天皇还固执地坚持着一种幻想，企图以冲绳之战和其后的本土决战的成果在有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也可以说，天皇对战争指导是在允许军部的继续战争论存在，在激励军部中展开的。日本军部一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将其无休止的军事膨胀政策作为王牌，不断实现其自我认知价值。甚至可以说天皇与日本军队是一体的，一直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并且，军部不断提出“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圈”等形形色色的口号，大力推行其膨胀政策，结果导致了失败。

时至今日，因为要解除军队的武装、处罚战争责任者，所以天皇终于下定决心舍弃军部了。这是准备选择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军部，以牺牲军部来维持天皇及天皇制，即维持国体。在这里，天皇对自身的战争责任只字未提，同时容忍军部的继续战争论，指挥激励他们一贯地指导战争政策时，作为最高责任者的姿态。

而且，“回忆起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的心情”这段文字，是将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与由于军事能力有限而不得不屈从俄、法、



德三国的要求而将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历史等同起来。

天皇以明治时期日本在三国干涉的激励下谋求东山再起，其后强化国内军事体制的历史作为论据，希望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决定作为以其日后东山再起的过渡性对策。由此可见，天皇对战争没有丝毫的反省，对接受《宣言》的投降也缺乏现实的认识。

虽然被迫接受了《宣言》，但是就其中的天皇条款提出：“在保证不包括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要求的前提下接受的。”同盟国方面对此的答复（贝尔纳斯答复）是12日发来的电报（正式答复是在13日）。然而，围绕其中天皇条款的内容，在日本政府内部再次引发了争论。

争论是围绕答复书中的如下内容“自投降时起，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的国家统治权置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的内容。

在这里，天皇的国家统治权“置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然而，“最终的日本国的政府形态应按照《波茨坦宣言》依据日本国民自由之意愿来决定”。

对于贝尔纳斯的答复，军部首先表示反对。即当天上午8时20分，梅津、丰田两位统帅部长立刻表示“敌国之意图从名到实就是要求无条件投降，尤其是玷污了天皇作为国体中心的尊严”，并上奏道：如果就此接受下来，“即使说其将带来国家内部的崩溃，导致我国体之破灭和皇国之灭亡的危险，亦确信其毫不夸张”（《1945年8



月12日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联名上奏（草案复印件）》，见前述《终战史录4》）。

与此同时，军部企图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进一步明确“断然拒绝答复书中的条件”，“向完成大东亚战争的目标迈进”的决心，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还在电报中指出：答复书“无异于抹杀辉煌之帝国，作为帝国臣民决不可服从”（前述《战败记录》）。同时出于抑制各军动摇的目的，梅津参谋总长和阿南陆相还联名对各军发出了“坚决继续战争”的电报。

随后，东乡外相拜见了天皇，得到了接受《宣言》的允许，但是到了中午12时50分，平沼枢密院议长在拜访铃木首相时，与接受《波茨坦宣言》时不同，从维持国体的角度出发，表明了反对贝尔纳斯答复的立场。此后，平沼还于下午1时40分拜访了木户，请其出面说服天皇撤回接受《宣言》的决定。

在当天下午3时开始的阁僚恳谈会上，反对派反复发表态度强硬的意见，阿南惟几表示其对解除军队武装难以服从，要求对答复书重新照会。

内务大臣安倍源基和司法大臣松坂广政等也予以附和，最后，铃木首相发言称：“如果强制解除武装，作为帝国军人断不可能接受，必将决心继续战争”（《东乡外相口述笔记·终战之际》，见前述《终战史录4》），暗示其放弃了先前的通过“圣断”实现结束战争的政策转变。因此，此次内阁会议也未能达成一致，事态陷入了





无法收拾的局面。

### 天皇的动摇和变节

针对贝尔纳斯答复而引发的内阁内部分裂和军部的强硬态度，促使东乡外相决意为打开局面而单独上奏。东乡外相之所以决意单独上奏，原因之一就在于天皇态度的动摇。

天皇一接到贝尔纳斯的答复，12日晨即对东乡外相指示道：“我认为可以按照对方的答复，准备接受”（同上），表明了收到答复后立即接受的意向。

但是，了解到内阁内部的争论、军部的强硬态度及平沼枢密院议长的动摇后，天皇对铃木首相说：“那么，再好好研究一下吧”（同上），事实上等于放弃了立即接受的方针，突然开始表露出慎重的态度。

在对维持国体的保证不可靠的争论中，天皇表示出了动摇和保留接受的意向。因此，铃木首相也几乎无法发挥其影响力，束手无策，无法在打开局面上采取任何有效的办法。

铃木首相本来就没有足以打开局面的能力和意志，在政局的潮流中，基本上是或者顺从“稳健派”与“和平派”的宫中及重臣集团，或者倾向于军部的“主战派”，其立场始终摇摆不定，无法掌握政局的主导权。

米内海相为了抑制天皇的动摇和变节，强烈地谏言欲使天皇做第二次“圣断”和通过木户内大臣劝说铃木首相。



米内光政海相从一开始即表明赞成接受《宣言》，并努力使内阁统一于这一原则上，扼制反对派。

因此，米内首先严厉地斥责丰田军令部总长和大西泷治郎军令部次长在没有与海军大臣取得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反对接受《宣言》方针的单独上奏。此时，米内称，“天皇既已圣断，就必须绝对照办，即便有任何困难，都要竭尽全力”（米内海相面谈，1945年8月12日项，见前述《终战史录4》），强调了对“圣断”绝对性的无条件服从。

强调“圣断绝对论”的米内海相指出：“可能我说得不妥当，遭受原子弹攻击和苏联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天保佑我们。这样可以回避‘停战’二字。我一向主张的收拾时局的理由，既不是敌人攻击的可怕，也不是原子弹和苏联参战，主要是国内形势的堪忧事态。因此今天不将国内形势摆到表面上争论就能收拾时局，毋宁说是幸运的。”（同上）

米内认为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因投降或战败而导致的军事机构解体，而是随着战败而产生的国内动乱或国内共产主义革命，并因此而破坏国体。

他也曾指出，比战败带来的危机更迫切的问题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天皇制统治国家一贯追求的冒险主义的膨胀政策所蓄积的国内各种矛盾将会随战败一举爆发。为了不暴露这一矛盾，将这一切封住，将战败责任问题搁置起来，不强调国家体制地结束战争，这才



是优先一切的政治选择。正如米内所言，以遭受原子弹攻击和苏联参战为契机的无条件投降确实是掩盖这些矛盾的绝好机会。

这在近卫文麿奏折中也阐述过，重臣及宫中集团对此有着相同的认识。例如，木户在劝说铃木首相接受贝尔纳斯答复时指出：“时至今日，我认为纵有国内发生动乱等之担忧，亦力主断然实行”（前述《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8月12日项），在木户看来，其接受《宣言》时的最大畏惧与其说是国内动乱，莫如说是因此而引起的对“国体”的破坏。

正是重臣及宫中集团这种对于可能引起国内矛盾爆发的恐惧心理，和因此而引起的国体崩溃的危机意识，才是他们从根本上希望结束战争，并希望以天皇“圣断”为尚方宝剑尽快结束战争的最大原因。

#### 围绕捍卫国体的对立

13日，日本接到同盟国的正式答复。这天早晨，阿南陆相拜访了木户，重申了只要没有得到维持国体的保证，就反对接受《宣言》的态度。

此时，木户并不同意阿南的见解，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在维持国体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其计划和方式也各不相同”（同上，1945年8月13日项），明确地表示与军方划清界限的态度。至此，可以认为，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倾向于陆军的木户决意要与陆军决裂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其背后隐藏着的将因为战败而在不久的将来将要产生的战败责任问题转嫁给军部，并为此而舍弃军部的想法。

同日8时半，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会上，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等军方首脑反复地主张必须要求得到维持国体的保证，并且对占领和解除武装加以限定。

这些军部首脑的主张在4时的内阁会议上又被提起，对此，内务大臣安倍源基等再次表示支持，重新开始了向盟国方面再次发出照会的争论。正如木户所言，无论是反对接受《宣言》还是赞成接受《宣言》，在维持国体这一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接受《宣言》赞成论者积极地想要从《宣言》的内容中找到维持国体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接受《宣言》反对论者则坚持《宣言》中没有确切性的解释。

最后，与接受《宣言》赞成论者所认为的接受《宣言》投降与捍卫国体的观点相反，接受《宣言》反对论者则认为接受《宣言》等于投降，等于破坏国体。

特别是反对接受《宣言》的主要势力——陆军主战派认为，军队是具体支撑“维持国体”的核心，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即日本军队的解体，其后果则无异于破坏国体。

在8月10日召开的重臣会议上，东条英机指出：“我陆军犹如蝶螺之壳，一旦蝶螺失去外壳，其内脏也就到死期了，解除武装将使我国体无法维持”（前述《细川日记》，1945年8月10日项），他

将螺蛳比喻为国体，用其壳比拟陆军，强调国体与陆军是一体的。

陆军的解体与维持国体的关联性并非仅是东条一人的逻辑，而是陆海军主战派共同的逻辑（《日本终战史》下卷）。

因而，战后被称为“稳健派”或“和平派”的宫中和重臣集团及其亲信与被称为“主战派”或“继续战争派”的陆海军集团之间的对立，不过是对“国体”的解释和维持‘国体’方法不同而已。两派都希望通过维持“国体”而坚持天皇制，回避因战败而要承担的战争责任，保存其组织和权力。在这一点上两派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内阁会议召开三个小时后，军部的反对论逐渐变成了少数意见。对于认为“尽管不情愿，但是应该以战争已无希望的认识为基点”，东乡外相主张立即接受《宣言》，就连曾持异议的司法大臣松坂广政也发言表示：“如果有想法也千万不要抵制。因为圣断不能违背”（《下村海南终战记》，见前述《终战史录5》），这事实上表明了对于“圣断”的顺从。

另外，主张反对论的内务大臣安倍源基并没有放弃一直以来的“只要不能捍卫国体则唯有打下去”的态度，继续重复着强硬论：“我等必须一亿同心，维持‘国体’迈进。在不可能胜利时唯有一亿玉碎，唯有孤注一掷。”

阿南陆相也从捍卫国体的角度指出：“唯有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去谈判才会有希望，我相信不必导致战争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



映，应该采取的方式就要坚决采取，丝毫也不能让步。”

阿南还反驳东乡外相，强调必须要求解除武装和限制占领的条件，其理由是“日本还有余力。在这一点上存在判断的差异”。就这样，在内阁会议中，双方互不相让。

见此情形，铃木首相以天皇有结束战争的意向为出发点，鲜明地对反对派表示了反对的态度：“虽然认为在维持‘国体’上会有危险阻力，但是要继续战争的话，实在无能为力，天皇此时是希望停战的。”

铃木接着表示：“从臣下的忠诚来说，也可以战斗下去，但那仅仅能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日本国将会危机四伏。陛下既知晓如此危险，待陛下‘圣断’后，我等就唯有克己奉公。因而，我认为，将今天内阁会议的情况禀报天皇，再次请天皇圣断”（同上），根据讨论的大体情形，最终放弃了通过彻底抗战来捍卫维持“国体”的论调，认为正是为了维持“国体”，才必须按照天皇的意愿结束战争。

在内阁会议上并未对是否接受《宣言》做出结论，而是将最后的决定权交予天皇，试图通过天皇的决断来结束战争。当然，这是木户幸一等和宫中及重臣集团之间早已设计好的构想。

### 第二次“圣断”

这天，美军飞机空投了传单，将此前一直对日本国民完全保密的答复书的内容告知了国民。



得知这一消息，木户更加大了“全国可能陷入混乱”（前述《木户幸一日记》下卷，1945年8月14日项）的危机感。14日上午8时40分，木户与铃木首相一同拜见了天皇，提出“请求召集内阁成员，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联席的御前会议，并承蒙天皇就势下令终止战争，起草诏书”（前述《终战史录5》）的意图，奏请天皇召集御前会议。

从上午10时30分起，天皇亲自召集了阁僚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联席的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中，铃木首相汇报了上述内阁会议的情况，再次奏请天皇的“圣断”。此后，阿南陆相与梅津、丰田两位统帅部总长还得到了发表反对意见的机会。在此之后，天皇即下达了“圣断”。

此时，天皇决然地说：“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这是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以及敌我国力战力做出的判断，并非是草率做出的。至于国体，我想敌国也会承认，并无丝毫的不安”（《1945年8月14日上午11时于宫中防空室御前会议上》，见前述《战败记录》）。

对于反对论者所坚持的“维持”国体，说到“并无丝毫不安”这种话，那么在“圣断”这种天皇的权威面前，反对论者也不得不同意了。于是，虽然军部中坚层有实施政变的计划，但是军部首脑的反对论终于平息了。

日本政府于御前会议之后召开了内阁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国投降。为了向国内外公布战争结束的消息，

起草了天皇下达的战争结束命令的诏书，在翌日（15日）正午通过天皇亲自站在话筒前录制的录音带播放出去。即所谓的“玉音放送”，其内容阐明了天皇及日本的战争指导层对此次战争的总结。

### 《终战诏书》

在此，为了再一次了解“圣断”的背后真相，笔者想重读一遍《终战诏书》，让我们暂且把焦点返回到决定投降过程的那段时间。

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陆相阿南惟几和梅津、丰田两位统帅部总长的有条件投降论与外相东乡茂德的维护国体条件论尖锐对立，无法实现统一，从而铃木首相向天皇请求“圣断”，天皇采纳了东乡茂德外相的意见，同意接受《宣言》并仅以维持“国体”为条件，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两国公使向盟国做了回复。美国务卿贝尔纳斯答道：“遵照《波茨坦宣言》，日本国最终的政治形态应依据日本人民自由地表达出的意愿来决定”，事实上拒绝了维持国体的条件。

接到贝尔纳斯的答复，内阁会议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再起纠纷，阿南陆相和梅津、丰田两位统帅部总长主张再次照会，铃木首相再次请求天皇“圣断”，天皇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无条件投降，经过两次“圣断”做出了终战的决定。

在此次“圣断”时，天皇还下达了立即起草诏书的命令。但是，实际上在此之前的第一次“圣断”之后，诏书就已经在起草中了。诏书的起草是由迫水久常内阁书记官长和汉学家川田瑞穗担任。川田首先草拟了草案，完成了“朕深鉴于世界大势……”的开头。在





此基础上，迫水写出了第二稿。

对此稿加以润色的是阳明学者、大东亚省顾问安冈正笃。在安冈草案中，主要修改的是著名的“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前后的各一句话。即在其之前加入了取自《春秋左氏传》的“义命之所存”一句；在其之后插入了《近思录》中的“为万世开太平”一句（茶园义男《密室的终战诏敕》）。这成为安冈草案中著名的一段：“然义命之所存，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诏书草案”于14日下午4时提交内阁会议后，并未得到内阁会议认可。尤其是因为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陆相阿南惟几对“诏书草案”吹毛求疵，加上安冈修改的“义命之所存”被改为“时运之所趋”等，最后修改竟多达40处。天皇进入由NHK设在皇宫内的录音室时，已是夜里11时半了。这样，天皇亲自朗读诏书，完成了“玉音盘”的录制。

迫水久常内阁书记官长晚年曾这样回忆道：“已经反复了多少遍啦？10日晚、11日、12日、13日晚。就是说，不知是否真的有付诸实施的阶段？说不准在什么阶段，我们就都人头落地，胡乱一埋，而说不定又出来一份宣战诏敕来。所以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就是已经被杀了”（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政治谈话录音·迫水久常·关于终战·二二六事件等》）。可以感受到迫水非常担心军事政变。

这种最坏的事态最终发展成了现实：15日凌晨1时多，发生了夺取玉音盘未遂事件，夺取以未遂而告终，“诏书”于正午播放。其全文如下。虽然不是著名的文章，但却是历史性的文章，它公示了昭和天皇对战争的基本认识。

### 诏 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掌控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飭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除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士勇敢善战，百官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预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朕将以何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邪！此为朕之所以飭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



则肺腑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为朕所深深挂念。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哀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耐其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步。望尔等臣民克体朕意。

诏书首先指出是为了结束此次战争而“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强调了通过“圣断”来结束战争的事实，并将结束战争的原因归结为“战局并未好转”，而对战局恶化和日本失败的事实全然佯装不知。

接着指出，敌使用“残酷之炸弹”（即原子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如果继续战争的话，很可能招致日本民族的灭亡和人类文明的破坏，需要通过“圣断”来挽救局面。

还将此次战争定义为“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和对朝鲜等的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重大人力物力的损失，



以及使日本国民也饱尝无以计数的不可估量的痛苦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所承担的责任，则只字未提。

岂止如此，竟然还称此次战争是希求日本自立和亚洲安定、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事业的组成部分。通篇都没有使用投降的字眼，更看不到侵略的事实、失败的结果和深刻的反省。

此外，还声称通过“圣断”终结战争的结果在于“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确信“神州之不灭”，应着眼于国家之重建。

到此为止，依然视“维护国体”和“神州不灭”为金科玉律。由于战争的结束，天皇制国家的事业可能会暂时中断，但是依赖“臣民之赤诚”，即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心，还将重新实现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以上就是诏书全文的要点。

就这样，隐瞒了接受《宣言》无条件投降的事实，并且完全隐藏了应对战败负战争指导和政治指导最高责任的天皇的身影，在这份《终战诏书》中，巧妙地构筑了对保留天皇地位和天皇制的新构想。

而且，采取天皇亲自对国民口诉的形式，也在战争的损失和战败的冲击中陷入极度混乱的大部分日本国民当中，有效地起到了免除对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的心理效果。

#### “圣断神话”的形成

战争的开始与结束都是由天皇的“圣断”决定的，体现出几个



重要的问题。首先第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开始日美战争和结束亚洲太平洋战争都是根据天皇明确的意志进行的。

从旧宪法中的天皇大权看，本质上天皇并不能成为国家意志的决定主体。

尽管如此，只有采取“圣断”这一超出旧宪法限制的形式，才能决定日美开战，决定结束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也具体地体现出了一国实际的国家体制，即代行天皇大权的政治军事机构在其内部调整和统治陷入困境时，最终只有依靠天皇的权威进行调整和统一。

明治国家体制在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时，国会和内阁或者巨大的官僚机构都无法发挥任何有效的功能，只有依靠天皇的权威，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治国家体制的分权性。换句话说，本书的《前言》中也曾提到，在战前，日本国是一个多元化的联合体。

由此证明，要克服天皇制统治国家的弱点，进而度过紧急事态，所有的权力都无能为力，唯有权威这一超宪法的应对才有可能。

因此，虽然由于战败实行了国家机构的大幅度变更，支撑天皇制的军事组织解体、宪法全面修订，但上述的政治变革，仍然使天皇制得到新的起点，有了保存的基础。天皇的政治权力由于战败而丧失了，但是天皇的权威反而通过“圣断”这一政治仪式有了倍增的机会。

由此，作为第二个问题，采用“圣断”来决定开战及结束战争的方式，模糊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争责任所在，导致了国家发动



战争行为的意图也变得不明确。

总而言之，“圣断”搁置了战争责任，而且在使天皇制机构向战后新国家体制转换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系列占领政策实施过程中，战前与战后不断被分割开，但是以“圣断”为契机的新天皇制机构的重建却扎扎实实地进行着。

因此可以说，所谓“圣断”，就是以天皇为中心，由构成保守权力的宫中及重臣集团实施的着眼于战后经营的一大政治计划。由于在此计划中不追究天皇战争指导政策的失败和责任，因而成功地保留了天皇制机构。

在战后保守势力的重组和强化过程中，将由“圣断”而“转变”为“和平主义”天皇，并且“象征”的形式继续存在下来。

另外，战后流传了诸多的“和平天皇”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圣断神话”：“和平”是由于天皇的“圣断”带来的，它从战争的惨祸中拯救了日本国民。正如本书各章中所阐明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圣断神话”真的是“神话”，仅仅是对历史的歪曲而已。这就是说，战后天皇制的存留本身需要形成“圣断神话”这一点已无须再言。

只是，笔者想在此重新说明的是，如前所述，尽管“圣断”方式的构想和使用既不是天皇自身的“决断”，也不是“主体性判断”，但是为了维持国体，从最初开始，天皇自身就与通过“圣断”结束战争的政治伎俩有着很深的渊源。



的确，“圣断”的构想是由天皇的亲信提出的。但是，尽管反复出现过动摇和变节，天皇最终还是接受并且按照计划“精彩”地展示了出来。这是在维持国体问题上走投无路的天皇所进行的最后政治方针，正因为如此，“圣断”也是天皇的主观选择。

由此可见：亚洲太平洋战争是基于天皇或者以天皇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的明确意图而实施的侵略战争，能够开始战争并结束战争的唯一人物就是天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圣断神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此，只要不摆脱“圣断神话”的虚构性，就很难真正地总结认识昭和这一个时代。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中，笔者想在总结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认识的基础上，探讨战后“圣断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2 战后“圣断论”的流传和意义

### 战后“圣断神话”的形成过程

1989年1月昭和天皇逝世后，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卡斯珀，寺崎真理子（真理子·寺崎·米勒）发现了昭和天皇的口述书，一时成为热点话题。

寺崎真理子是战后不久担任宫内厅与裁员的寺崎英成与美国女子格温德琳·哈罗德所生的女儿。她的儿子科尔发现了家里所藏的



该文件，并将其全文发表在1990年12月号的《文艺春秋》上。这就是后来发行的《昭和天皇独白录》。

它是由松平庆民宫内大臣、松平康昌宗秩寮总裁、木下道雄侍从次长、稻田周一内务部长，以及担任宫内厅职员的寺崎英成听取并记录的从1928年9月柳条湖事件直至战败大约15年间发生的事件和天皇就其发表的感想。

正如反复阐述的那样，总而言之，它是在准备东京审判期间为了使战争责任追究不到昭和天皇头上而作为辩护书被急忙拟定的。

《独白录》是天皇及其亲信为了回避昭和天皇战争责任而急忙拟定的辩护书。

问题在于它不仅是回避起诉的消极性行为，而且从其结果而言，它在战后将昭和天皇塑造成为战后日本和平的“推进者”这一新形象，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又是积极的尝试。

如果是这样，所谓的“圣断论”究竟是怎样形成，并在战后日本社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战后在日本流传的“成功阻止了日本人灭亡的大圣断”这一“物语”，向战后的日本人传达了怎样的含义呢？

对此，笔者想先引用昭和天皇本人直接提出的关于“圣断”形成过程的两份证言。

一份是在1950年9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记者的“在日本关于结束战争的决断中陛下作出了哪些贡献”的提问所做的回答：





“本来这应该是内阁做的事。我虽然听了报告，但在最后的御前会议上大家还是争论不休，结果请求我做出决定。我以我的意愿决定结束战争。”（高桥紘《昭和天皇发言录》）

第二份是战后昭和天皇接受著名的德裔记者伯纳德·克里舍采访（1975年9月20日）的发言：

“哎，终战时，虽然是按我的意见决定的，但是当时总理大臣自己拿不定主意，所以我只是说了自己的意见。在战争以前，这都是由内阁会议决定的，所以，已经做出的决定，不可能因为我的意见而推翻，这是日本的宪法里写着的。所以要遵守宪法嘛。”（伯纳德·克里舍《专访·从天皇到不破哲三》）

天皇将战后反复主张的“天皇傀儡”论从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还有许多天皇免罪论的典型事例。天皇曾指出：内阁“正式”决定后上奏的事情，即使是天皇也不能否定。

作为其根据，我们找到了日本帝国宪法第五十五条的条文规定。上面写着“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并对其负责”，如文字所述，辅弼者即内阁优先的原则作为立宪主义的理由。

果真如此吗？的确，此时基于内阁一致的原则，内阁成员即全体阁僚的同意必不可少。但是身为天皇臣下的阁僚都是在弄清天皇的意志后才上奏的，因此是绝对不能允许与天皇的意志产生分歧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上奏并不是形式上的，实质是由天皇的亲信准备好一定的结论，上奏只是遵循它而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



过程也是如此，天皇最终同意接受，以接受的形式由内阁上奏接受文件。就是说，昭和天皇对采访的回答显然只是一种形式逻辑，是隐瞒了实情的。

不过，这种形式逻辑在战败后能够被接受的政治背景正是问题之所在。的确，通过远东军事审判（以下简称为东京审判），各同盟国严厉地追究了日本的战争责任。

关于东京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在此就不详细叙述了。它是“胜利者的审判”也好，“基于国际法的公正审判”也好，显然所追究的对象都是昭和天皇的“幕僚”，而非昭和天皇本人。其背景是盟国方面尤其是美国着眼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政治意图，这已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最高战争责任者的昭和天皇被免于起诉的事实本身已成为战后“圣断论”的主要根据，则是毫无疑义的。

“圣断论”本身或许绝非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方面的意图所在，但是其结果不仅是昭和天皇的免责使战争责任问题变得不透明，而且使战后日本社会应该面对的战争责任也被搁置了起来。

另外，它导致了“圣断论”广泛流传的事实。“圣断论”不仅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打上了封印，还赋予昭和天皇以构筑战后和平最大贡献者和功劳者的地位。

而且，它绝非是偶然的，而是作为有意识的且具有政治高度的判断提出来的，对此必须引起关注。说起来，它是将对历史的恣意解释强加于人，也可以说是使历史相对化的行为。



### 旨在战后保持天皇制的“圣断论”

美国对战前的天皇制不仅在宪法上做了修改，而且在财政方面，作为占领政治的主要措施还强行冻结了皇室财产，使得天皇的政治实质基础遭到了重创，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从新宪法制定前后开始，昭和天皇不仅没有丧失对政治的兴趣，还积极参与其中。

在新宪法体制实施后，天皇的地位和身份变成了“象征性的”，失去了主要职能，天皇自己也无法过问政治了。但是天皇的亲信及战后内阁的阁僚们不断地向天皇“内奏”，企图以此提高自己的政治权威，天皇也接受“内奏”，为脱离政治的天皇及天皇制注入新的气息。

将“内奏”付诸行动的典型事例是片山哲内阁的外务大臣芦田均。芦田于1947年7月22日获得了拜见天皇的机会。当时，天皇就日本的对苏外交方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即应重视日美关系，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此后，芦田外相又数次内奏天皇。

例如，芦田在日记中写道，1948年8月10日拜见时，当昭和天皇说到“我认为对共产党必须设法采取措施”时，芦田回答：“我认为要消灭共产党，而且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消灭。”（《芦田均日记》，1948年8月10日项）

在历任首相中最积极内奏的人物当属佐藤荣作。



在《佐藤荣作日记》中，记载有其就归还冲绳问题、日美纺织品进出口问题、安保问题、治安问题等诸多问题内奏的情形。接替佐藤内阁的田中角荣也与佐藤一样不定期地内奏。

于是，昭和天皇对外交问题、治安问题等国内外一切政治问题都非常关注，这种倾向在后来也一直延续。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田中角荣内阁的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内奏”特别政治问题的事情。

事情的真相是，他就尚未确定的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的内容内奏，昭和天皇就周边各国质疑自卫队加强装备的反应表示不满，随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增原又将这一内容直截了当地对记者发表。这件事引发了对增原从政治上利用天皇的批评，最终发展为增原被迫辞职的结局。

从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内容看，增原惠吉企图利用天皇来发展日本的防卫力量，因而遭到了弹劾。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天皇对防卫问题也很关心，并敢于发表政治性的言论。

“内奏问题”不仅反映出具有复古主义性格的增原惠吉从个性出发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以军事专家自居的昭和天皇对防卫问题的兴趣之深，从而导致“内奏”行为被抓住不放。

对于以增原长官为首的涉及内奏问题的阁僚或政治家们来说，昭和天皇依然被认为是保持着战前权威的君主。

正因为如此，昭和天皇在发表《非神宣言》后，便被当作“非



神天皇”，但对于受新宪法的制约而遭禁止的政治行为并不介意，还屡屡发表政治性言论，做出政治性行为。

后来更发展成为政治问题，又是发表美军占领统治冲绳的愿望，又是以积极的姿态对待《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昭和天皇的这种追随美国和舍弃冲绳的立场也作为天皇自己的一种政治判断而间接地对政府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天皇屡屡地在自我意志的基础上实施政治性行为。

虽然受新宪法的制约，但是昭和天皇也常常能够实际行使政治判断和发挥政治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天皇自己及其亲信都认为，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就意味着允许其继续做出一定的政治性行为和言论。唯此才是“圣断论”重新产生的原动力。因此，如上文所述，“圣断”作为政治伎俩发挥了适当的作用。

### “圣断论”的渗透与战后天皇制的再生

这样的作用和期待通过1945年9月开始的天皇“巡幸地方”而进一步扩大。天皇因为《非神宣言》而丧失了作为神的性格和神圣性，作为获得新的“天皇认识”策划了“巡幸地方”的活动。

正如正木吴曾经在《从近处》（1946年复刊第一号）中一语道破的那样：所谓亚洲太平洋战争“应当看作是为了朕（即天皇）的自身安全而宣战，为了朕的自身安全而投降的”，策划这一活动是因为有对上一场战争的过程与本质的认识。这也是本书所反复论述的。



天皇巡幸地方是旨在保持战后象征天皇制权威的行为，其结果引起了天皇的亲信的不安和踌躇。

也就是说，巡幸地方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好反响。这到底是“圣断神话”渗透的结果，还是天皇通过巡幸地方时“亮相”和“言谈”确实成为产生“圣断神话”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很显然，两者的效果是相得益彰的。

它使天皇失去神的性质之后，获得了亲和性，这样的结果将“圣断论”提升到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变得根深蒂固。

但是，这给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而公开化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侵略主义蒙上了一层面纱，剥夺了战后一代人追问战争本质的机会。

在这样的结果下，不仅无法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质疑天皇制本身也与战前一样被视为禁区。

松浦总三在《“天声人语”的天皇与战争》中指出，在战前的新闻界，有天皇、革命和性三个禁区，而到了战后，就只剩下天皇了。不用说，这种有关天皇报道的管理和控制状况，正是战后日本新闻界的现状。

曾谈及天皇战争责任的长崎市长本嶋等遇刺（1990年1月18日），明治大学研究生院筹划了有关天皇制问题的集中讲习班和研讨会时，发生了右翼阵营暴力事件；另外，在地方议会，议员因对天



皇的战争责任提出疑问而被问责或受到警告处分，这种显而易见的言论封杀行为，时有发生。

对于这些封杀言论的行为，新闻界并未严肃对待，知识分子冷眼旁观。新闻界的这种态度使舆论也更加内在化，同时，也在许多保守派政治家们的天皇观中有所表现。

这种象征性的事例有很多，其中森喜朗首相（当时）的“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论断中所谓的“神国”发言（2000年5月15日）仍使人们记忆犹新。

在职的首相竟发表否定以主权在民为基本原理的战后民主主义言论，这是十分反常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因“圣断论”而保留的战后天皇制正是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的产物。

在此，人们似乎无视了昭和天皇自己明确指出的“圣断”的真相——“维持国体”（即保住天皇制国家统治体制）是第一位的，而解救国民于战火的目的意识则是第二位。

例如，天皇所说的“如果继续战争，就不能保护三种神器，国民也必遭杀戮，所以必须饮泣努力保留国民的种子”（《新潮》1986年5月号），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包括“神器”与“国民”的主次摆放，连昭和天皇自己也承认“圣断”是以维持国体为第一位的政治性决断。

昭和天皇在战后会见盟军最高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之际，



谈到会见目的时指出：

“我作为在国民遂行战争时，对政治、军事两方面做出的全部决定和行动负全责的人，我自己将听任您所代表的各国的裁决”（《麦克阿瑟回忆录》下卷）。

至于《麦克阿瑟回忆录》对于其记载事实的可信度，至今仍有种种疑义。即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主要国家美国的战后亚洲战略中，为了顺利地完 成作为间接统治而对日本的占领，构想出了与英国和苏联不同的对天皇制的政治利用，而在转入实施的过程中，即使有政治性的作为当然也并不奇怪。

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若不是日后经麦克阿瑟之手将美国的这种意图公开发表，就会表明昭和天皇持有自己承担战争责任的见解，并企图以此作为不追究昭和天皇的理由。

这绝不是美国的意图，该书是想通过承认战争责任，给作为谢罪行为的会见定位，企图将美国未追究昭和天皇的责任以及昭和天皇本人的责任一同消除。

所谓会见时所表明的昭和天皇的言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在该回忆录出版的1964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运会，昭和天皇宣布奥运会开幕，当时也是这种解释成为压倒性舆论的时期：昭和天皇的“圣断”成为战后复兴与繁荣的契机，亚洲首次举办奥运会就是其现实的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圣断神话”以由神话变为近乎“实话”的形式被接受和认同。包括奥运会在内，天皇作为此后每年在全国各地依次举办的国民体育大会上的开幕宣布者，在这一全国性活动中，他一直扮演着主角，“圣断”作为“实话”进一步扩大开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麦克阿瑟的会见则进一步扩大了昭和天皇不顾牺牲自己去拯救日本国民的巨大影响。笔者认为，这给追究昭和天皇在位期间的战争责任问题打上封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 改朝换代与后冷战时期的“圣断论”

这一点在1989年1月改朝换代以后似乎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一方面虽然作为讨论对象的昭和天皇的离去，使论及昭和天皇时获得了某种解放感，而另一方面，也给追究战争责任问题时带来了困难。对于死者的关怀意识经常成为先导，学术上的研究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压力下，得以贯彻的可能性则无法得到保证。

与其说这是自慎，是他人强加的，不如说是自己主动接受的，换句话说，是自我审查的态度暂时变得突出。

开展历史研究，明确日本侵略战争责任之所在，在国内舆论中作为侵略战争来捕捉上一场战争的本质的历史判断和历史认识也在加深，但另一方面，却是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相对淡化了。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终归是将其置于评价的对象之外了。

但是，也出现了可预测到明显转机的事态。这就是支撑战后日



本保守体制的国际秩序的冷战体制，以苏联解体为契机而结束了。冷战体制的结束，不仅仅使各国从美苏对立的紧张感中解放出来，而且引发了在这种政治军事秩序下受到封杀的自由讨论，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呼声。

这就是迄今一直受到压抑或封杀的曾经遭到侵略的各国人民要求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殖民地统治、军政统治责任的呼声。它以“随军慰安妇”问题、对殖民地统治责任或者追究为协助战争而奔走的企业的战争责任等形式爆发出来。不仅是国内，而且韩国、中国（包括台湾）、菲律宾等亚洲各国的人民相继提起诉讼，日本国内也以后援的形式要求追究战争责任问题，这一动向来势凶猛。

这种举动使趋于停滞的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和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加快了步伐，战争责任研究正在取得相当程度的成果。现在，随着研究和讨论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市民也加入其中。

可是，在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层面上，不仅依然停滞不前，而且在将注意力集中到日本的总体战争责任上的倾向逐渐增强的情况下，甚至有所倒退。

其理由不尽相同。如果按照本书所探究的脉络来说，在于“圣断”这一“神话”与历史事实的分离，换句话说，在于“圣断”与“实话”的差异太不明确。“神话”与“实话”混杂的状况使“圣断”的真相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恕笔者重复，笔者之所以对“圣断”的真相如此较真儿，并非仅仅是为了明确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明确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实现了。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圣断”本身是战前保守权力向战后转换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避免了昭和天皇受到追究、并使天皇制以“象征化”的形式得以延续。

因此，问题在于由于从《非神宣言》到亲自巡幸地方而开始的天皇的政治行为，迫使人们不必追究战争责任，相反却将其定位为战后日本复兴和繁荣的最大功臣，这使得对历史事实的探究变为废纸。

如此说来，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的历史或许是虚构的产物。可以说，作为高度的政治判断的“圣断论”甚至起到了将战后日本的历史也虚构化的作用。由于这种虚构化的历史的束缚，笔者认为，从改朝换代直至进入后冷战时代，我们已经错过了能够逼近历史真相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对于亚洲各国人民发出的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一致呼声，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只能做出极为模糊的回应，因为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就有在此指出的课题。

这还与最近的靖国神社问题相关。为什么亚洲各国人民强烈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些呼声可以看作是，对于包含那些企图只以过于漫不经心且非历史性的语言去面对历史的日本政界高官



和日本媒体在内的，不想正确认识历史的态度的某种焦急和气愤。

东条英机是因为获得了昭和天皇的信任而登上首相宝座的。对于由东条英机内阁发动的战争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亚洲各国人民来说，作为甲级战犯而被处死的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者和侵略战争的领导者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得到英灵的牌位，这是无法理解的。

恕笔者重复，为了解亚洲各国人民的这种感情，现在要求我们日本人做的，就是从正面批评“圣断”的虚构性，从“圣断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感知到亚洲各国人民呼声的分量和意义所在。

只有这样做，我们日本人才会被接纳为亚洲各国人民的一员。对历史的回顾，是一门旨在使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自由、丰富的基础课。

# PREFACE



## 结束语

现在，我的手头有一部为纪念1988年6月23日冲绳慰灵日而由冲绳琉球放送（RBC）制作的特别节目《过迟的圣断——论证·通向冲绳之战的道路》的文稿。

这部根据编剧中里雅之先生的文稿制作的节目，是一部能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刻反思的优秀作品。它认为，昭和天皇如果不是在1945年8月13日而是更早时期做出“圣断”的话，不会有同年4月1日盟军在冲绳本岛的冲绳之战，也就不会有15万人在那场被称为“钢铁风暴”的悲壮战斗中牺牲。

作为关键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在冲绳之战开始一个半月前，近卫文麿向昭和天皇提出的要求尽快“结束战争”的所谓“近卫奏折”中，昭和天皇的态度是“若非再度取得战果以后”的消极面对。

该节目对昭和天皇的“不决断”和“不负责任”进行了严厉抨

击。昭和天皇不能正视日本陆海军战力消耗殆尽的事实，一味命令冲绳守军和冲绳民众进行毫无希望的抗争，正是这种不合时局的判断和仅对“维持国体（即天皇制统治国家体制）”的一点固执己见，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牺牲。

该节目不仅在冲绳，在社会各界都得到了强烈响应，并获得了JCJ（日本记者会议）奖、时代电影最优秀奖、“银河奖”特别奖等。当时我作为以藤原彰先生（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已故）为核心组成的“冲绳之战反思会·东京分会”（1986年成立）的会员之一参与了该节目的制作。

此后，我与同为会员之一的山田朗先生（现任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合作出版了《过迟的圣断》（昭和出版，1991年）。在这一系列工作中，我对发掘和叙述与昭和天皇“圣断”有关的历史事实产生了兴趣。

此后，我在探寻“圣断”的昭和天皇及其亲信动向的同时，还发现，战后日本社会上出现的“圣断神话”“圣断礼赞论”对于搁置昭和天皇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与今天民族主义的高涨如出一辙，形成了新的潮流。

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高涨，是指在经历战败后由于形成了向国际社会过渡的市民社会，自主地重视主体性的价值判断，但相互尊重而又共同开拓共生之路的精神和意识有所后退，在与他人、其他民族或国家的过度竞争中，显露出歧视意识和崇外意识。



当今，在亚洲各国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中，日本社会有所滞后，再加上因为经济差距而产生的优越意识遭到排斥，加深了这种闭塞感。也可以说这是某种孤立感和焦躁感。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更需要对自己的传统和历史重新认识（归属意识），找回日本曾经丧失的自信。在此时代背景下，日本人值得“骄傲”的，是对于天皇及天皇制的憧憬之心再度加深。恕笔者再次重复，问题在于“圣断神话”和“圣断礼赞论”的出现。

“编撰新历史教科书会”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的“圣断论”、森喜朗前首相的“神之国”和“国体”的言论，每年夏季“终战纪念日”都要泛滥的“拯救日本的圣断”这一惯用语。还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和历史认识的缺乏。凡此种种，让后人从历史事实角度客观地认识整个侵略亚洲太平洋战争，以史为鉴的真挚态度已经丧失殆尽。

在这样的趋势中，我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试想重新审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战败过程中，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指导部实施的以战后保守体制为目的的终战工作。

作为问题核心的一部分，之前在研究的以海军势力为中心的记录终战工作实态的《日本海军的终战工作》（中公新书，1996年出版）中阐述过。此后，我的脑海中时常有一种想法，想要去探寻昭和天皇“圣断论”的实现过程和形成战后保守体制恢复的战后战略。

因此，本书从以上现状着眼，以终战的政治过程为主线，反思



战前昭和史究竟是怎样的时代？在战后的昭和与平成时代，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被传续下来的。

进而言之，首先要重温导致昭和天皇“圣断”的历史过程。我想强调的是，“圣断”是以维持国体为最终目标的政治判断，是将战后复兴也纳入规划之中的政治战略，其结果导致，天皇制和战前权力体制顺利地过渡至战后。本书对其大体结构的描述，我想基本情况都是清晰的。

其次，是要证明战后的“圣断神话”“圣断礼赞论”对于战后保守体制和日本的天皇观赋予了怎样的意义。我认为，如果不摆脱这种“圣断神话”“圣断礼赞论”，就不可能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

因此，本书从东条内阁末期，宫中及重臣集团开始的打倒东条内阁运动起笔，重点在侵略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整个过程。之所以执笔于该时期以后，是因为从终战工作开始直到通过“圣断”决定投降，这个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蕴含着这场战争的本质。

前面已经引用过，正如正木晃在《从近处》中所述的，总而言之，所谓“天皇眼中的为天皇而战的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如果换句话说就是“天皇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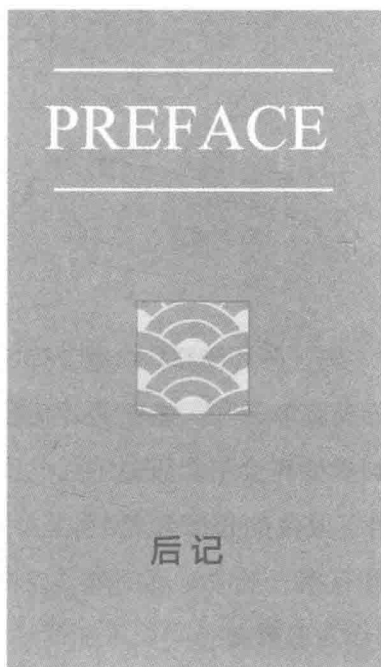
由此，我认为，这场战争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天皇制本质的战争，开战和终战都是根据天皇所谓的“圣断”实施的，这也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它是“天皇的战争”。

亚洲太平洋战争究竟是什么？对此，当下和未来都会做出诸多





评价。但是，通过不断的研究探索，加深应有的战争认识，在未来的时代也将成为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实。基于此，本书也是我作为历史研究者对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观点和认识。



2006年7月迎来战败61周年，有关昭和天皇的资料发现相继被报道。

其一是以《日本经济新闻》独家报道的形式公布的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记录昭和天皇发言记录的所谓《富田笔记》。其内容为昭和天皇对将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军事审判（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等供奉在靖国神社一事“表示不快”。日期为1988年4月28日。

大概因为由时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引发的争论正酣，各媒体均将该资料与靖国神社问题作了详细的报道。由此产生了诸多的见解，但令我有所顿悟的是，从前提来说这本《富田笔记》准确地记录了天皇的发言，但是昭和天皇对战后靖国神社的定位心存疑问点，这事实上是否定了战前曾作为军国主义组成部分的靖国神社。只不过，不知这是天皇的真心话还是违心之言。



同时，不能不让人感到《富田笔记》与《昭和天皇独白录》等所记录的昭和天皇对东条英机的态度大相背离。昭和天皇曾经最信赖的东条英机化为英灵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后竟会引起天皇的如此不快？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因为《独白录》收集的是1946年3月至4月昭和天皇的言论录，与此次发言之间具有相当长的时间间隔，或许是在此期间“变化”了，不过毕竟有些令人费解。

也可以说，《笔记》或多或少混入了富田前长官的笔墨，那么，对靖国神社表示批评的言辞，其目的是否意味着作者标榜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呢？

《朝日新闻》曾报道防卫厅长官（当时）增原惠吉的内奏问题，“这是将天皇的语录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很可能伤害其‘国民统一的象征’的地位”（1973年5月30日）。另外，独家报道《富田笔记》的《日本经济新闻》也就同一问题指出：“‘增原见解’即使被认为是将天皇关于增强防卫力的指示从政治上加以利用也毫无办法”（1973年5月30日），严厉劝诫对昭和天皇的言论从政治上加以利用。

一方面存在将昭和天皇的言论从政治上加以利用是与现行宪法相抵触的观点，另一方面尽管各媒体在对于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毕竟或多或少存在。不得不说的是，30多年来，媒体的历史认识比预想中的更差。面对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我们更加希望媒体能努力培养和加深自身的历史认识。

其二，有报道说发现了1945年9月25日昭和天皇会见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记录，电视台还制作了专题片（2006年7月26日朝日电视台《报道站》等）。其中披露了天皇的言论：“偷袭夏威夷珍珠港是根据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的命令执行的。”

总而言之，昭和天皇回避了自己的开战责任。从开战的程序看，即使东条英机首相进言，最终的责任者仍是昭和天皇，这是不言自明的，也正如本书所述。问题在于为什么战败一个多月后，便说出了开战责任否定论。显然，是为了防止在东京审判上被追诉而事先计划的托词。

在天皇很可能被审判的情况下，《独白录》中作了各种狡辩，这自然是逃避追诉的穷余之策，其实在更早就已经对美国记者做出辩白了。然而，正如本书所探究的那样，昭和天皇与战争的直接关系以及战争指导过程，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现在的问题是，昭和天皇的意图另当别论。恕笔者直言，在现今，这样做意味着将划清承担侵略战争责任的东条英机与昭和天皇的关系。本书在开头已经提到，通过与象征军国主义的东条英机拉开距离，或者与其对立，就可以将一个象征和平主义者的昭和天皇普及开来，固定下来。毫无疑问，“圣断论”的目的本在于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普及“圣断论”来赞美天皇的方式正在“失去价值”，特别是促使年轻一代认可昭和天皇是和平主义者的资料或记录的“发现”其本来意图何在尚无定论，但的确感到其正



在蔓延，或许还会不断地报道“发现”相似资料、记录。

概而言之，我一直认为，用战后的资料来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或指导者责任缓和或相对化，这才是对历史事实的掩盖和歪曲。应当正确且客观地回顾历史事实，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找所应当吸取的教训。绝对不允许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进行实用主义的解释或重新解读。

作为真凭实据，这些资料和记录的确非常珍贵。但是，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则需要不断地密切关注，在今天似乎更为必要。

最后，对了解到本书意图，并不断围绕昭和天皇进行的历史考证工作中不辞辛劳的出版事务，付出努力的新日本出版社和编辑志波泰男先生、久野通广先生深表感谢！

承蒙新日本出版社将拙作变为精美读物，不胜欢欣。如广大读者能将拙作作为回顾昭和天皇“圣断”含义的研究素材来读，鄙人则将不胜荣幸。

纘纘 厚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战败后第六十一年之夏

## 引用·参考文献（按出版时间）

### 记录·回想录·日记·传记等

- [1] 近卫文麿（手记）．为和平的努力 [M]．日本电报通讯社，1946年
- [2] 近卫文麿．迷失的政治——近卫文麿公手记 [M]．朝日新闻社，1946年
- [3] 铃木贯太郎（著）．终战的表情 [M]．劳动文化社，1946年
- [4] 作田高太郎．天皇与城门 [M]．平凡社，1948年
- [5] 高木惣吉．终战觉书 [M]．弘文堂，1948年
- [6] 冈田启介（著）．冈田启介回想录 [M]．每日新闻社，1950年
- [7] 丰田副武著，柳沢健遍．最后的帝国海军 [M]．世界的日本社，1950年
- [8] 木舍幾三郎．近卫公秘闻 [M]．高野山出版社，1950年
- [9] 加濑俊一．走向密苏里号之路 [M]．文艺春秋新社，1951年
- [10] John Gunther. 阿克曼之谜——日本·朝鲜·远东 [M]．（木下秀夫．安保长春译）时事通讯社，1951年
- [11] 风见章．近卫内阁 [M]．日本出版协同，1951年
- [12] 盐原时三郎．东条笔记——天皇获救 [M]．handbook社，1952年



- [13] 矢部贞治. 近卫文麿 [M]. 弘文堂, 1952 年
- [14] 池田纯久. 陆军葬仪委员长——从中国事变到东京审判 [M]. 日本出版协同, 1953 年
- [15] 绪方竹虎. 军人的生涯 [M]. 文艺春秋新社, 1955 年
- [16] 田中新一. 战争爆发的真相 [M]. 元元社, 1955 年
- [17] 东久迩揆彦. 皇族的战争日记 [M]. 日本周报社, 1957 年
- [18] 冈田丈夫. 近卫文麿 天皇与军部与国民 [M]. 春秋社, 1959 年
- [19] 石川信吾. 珍珠湾事件的经过——开战的真相 [M]. 时事通信社, 1960 年
- [20] 铃木贯太郎传记编撰委员会编刊. 铃木贯太郎传 [M]. 1960 年
- [21] 佐藤贤了. 东条英机与太平洋战争 [M]. 文艺春秋社, 1960 年
- [22] 藤田尚德. 侍从长的回忆 [M]. 讲谈社, 1961 年
- [23] 河边虎四郎. 从市谷台到市谷台——最后的参谋次长的回想录 [M]. 时事通信社, 1962 年
- [24] 富田健治. 战败日本的内侧——近卫公的回忆 [M]. 古今书院, 1962 年
- [25] 小矶国昭自叙传刊行会编. 葛山鸿爪 [M]. 中央公论事业出版社, 1963 年



- [26]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回想录. 上. 下卷 [M].  
（津嶋一夫译）朝日新闻社，1964年
- [27] 林平马. 终战运动密录 [M]. 博文社（改订版），1964年
- [28] 高公太平. 米内光政 [M]. 时事通信社，1964年
- [29] 正木弘. 周边战争政策争论的记录 [M]. 弘文堂，1964年
- [30] 佐藤贤了. 大东亚战争回忆录 [M]. 德间书店，1966年
- [31] 木户幸一. 木户幸一日记. 上下卷 [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6年
- [32] 参谋本部编. 杉山笔记. 下卷 [M]. 原书房，1967年
- [33] 原书房编辑部编. 战败记录 [M]. 原书房，1967年
- [34] 现代史资料. 第三十七大本营 [M]. 观铃书房，1967年
- [35] 秋定鹤造. 东条英机的生涯与日本陆军兴亡秘史 [M]. 经济  
往来社，1967年
- [36] 官冈定俊. 开战与终战——人与机构与计划 [M]. 每日新闻  
社，1968年
- [37] 共同通讯社，近卫日记編集委员会编. 近卫日记 [M]. 共同  
通讯社，1968年
- [38] 高木惣吉. 私观太平洋战争 [M]. 文艺春秋，1969年
- [39]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 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 联合  
舰队（6） [M]. 朝云新闻社，1971年
- [40] 宇垣一成. 宇垣一成日记第三卷 [M]. 观铃书房，1971年





- [41]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 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 (10) [M]. 朝云新闻社, 1975 年
- [42] 矢部贞治. 矢部贞治日记 银杏卷 [M]. 读卖新闻社, 1974 年
- [43] 东条英机发行会. 上法快男编. 东条英机 [M]. 芙蓉书房, 1974 年
- [44] 佐藤贤了. 佐藤贤了的证言 对美战争的原点 [M]. 芙蓉书房, 1976 年
- [45] 伯纳德·克里. 专访——从天皇到不破哲三 [M]. 仙名纪译, 西丸出版会, 1976 年
- [46] 冈田贞宽编. 冈田启介回想录 [M]. 每日新闻社, 1977 年
- [47] 细川沪贞. 细川日记 [M]. 中央公论社, 1978 年
- [48] 外务省编. 终战史录. 全六卷 [M]. 北洋社, 1977—1978 年
- [49] 森元治郎. 终战工作 [M]. 中央公论社 (新书), 1980 年
- [50] 矢次一夫. 东条英机与他的时代 [M]. 三天书房, 1980 年
- [51] 松谷诚. 大东亚战争操控真相 [M]. 芙蓉书房, 1980 年
- [52] 木户日记研究会编. 木户幸一日记 东京审判期 [M].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80 年
- [53] 龟井宏. 日本的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生涯与军国日本下卷 [M]. 光人社, 1981 年
- [54] 勝田龙夫. 重臣们的昭和史下卷 [M]. 文艺春秋, 1981 年

- [55] 伊藤隆，野村实编．海军大将 小林跻造觉书 [M]．山川出版社，1981 年
- [56] 野村实编．侍从武官 城英一郎日记 [M]．山川出版社，1982 年
- [57] 岸田英夫．侍从长的昭和史 [M]．朝日新闻社，1982 年
- [58] 柳田邦男．赞助 [M]．新潮社（文库），1983 年
- [59] 河原敏明．裕仁天皇的昭和史 [M]．文艺春秋社，1983 年
- [60] 千田夏光．天皇敕语与昭和史 [M]．汐文社，1983 年
- [61] 太平进一．最后的内大臣 木户幸一为“天皇制”的存续而战斗 [M]．恒文社，1984 年
- [62] 高木惣吉．高木惣吉日记——日德意三国同盟与东条内阁倒台 [M]．每日新闻社，1985 年
- [63] 芹泽纪之．谋略 吉田茂逮捕 [M]．芙蓉书房，1985 年
- [64] 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 [M]．（新版）芙蓉书房，1985 年
- [65] 半藤一利．圣断——天皇与铃木贯太郎 [M]．文艺春秋社，1985 年
- [66] 赤松贞雄．东条英机秘书官机密日志 [M]．文艺春秋社，1985 年
- [67] 粟屋宪太郎他编．东京审判资料 木户幸一询问调查 [M]．大月书店，1987 年



- [68] 杉森九英. 近卫文麿 [M]. 河出书房新社, 1987 年
- [69] 实松让. 海军大将米内光政觉书 [M]. 光人社, 1988 年
- [70] 读卖新闻社编. 天皇的终战 激烈的 227 日 [M]. 读卖新闻社, 1988 年
- [71] 野村实. 天皇 伏见宫与日本海军 [M]. 文艺春秋, 1988 年
- [72] 高桥紘编著. 昭和天皇发言录 大正九年至昭和六十四年的事实 [M]. 小学馆, 1989 年
- [73] 东乡茂德. 时代的一面——大战外交手记 [M]. 中央公论社, 1989 年
- [74] 冈部长章. 侍从回想录 剧变时代的昭和天皇 [M]. 朝日出版社, 1990 年
- [75] 胜野骏. 昭和天皇的战争 [M]. 图书出版社, 1990 年
- [76] 入江相政. 入江相政日记 第一卷 [M]. 朝日新闻社, 1990 年
- [77] 木下道雄. 侧近日志 [M]. 文艺春秋社, 1990 年
- [78] 丰田让. 最后的重臣冈田启介——为终战和平尽瘁的无名人的生涯 [M]. 光人社, 1994 年
- [79] 高松官宣仁. 高松官日记全八卷 [M]. 中央公论社, 1995—1997 年
- [80] 佐藤荣作 (伊藤隆监修). 佐藤荣作日记 (全六卷) [M]. 朝日新闻社, 1997—1999 年
- [81] 德川义宽. 德川义宽终战日记 [M]. 朝日新闻社, 1999 年

- [82] 伊藤隆编. 高木惣吉日记与信息下卷 [M]. 观铃书房, 2000年
- [83] 松本重治 (听者. 国弘正雄). 昭和史的证言 [M]. 立花出版社, 2002年
- [84] 有马赖宁. 有马赖宁日记第五卷 [M]. 山川出版社, 2003年
- [85] 重光葵. 重光葵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记录. 手记 [M]. 中央公论新社, 2004年
- [86] 道越治编. 近卫文麿“六月终战”的脚本 [M]. 每日一次, 2006年

## 研究书

- [87] Herbert Fyth. 第二次世界大战 珍珠港之路 [M]. 大湫愿二译. 现代史大系列7, 观铃书房, 1956年
- [88] 日本外交学会编. 太平洋战争终结论 [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8年
- [89] Robert Butte. 终战外史——至无条件投降的经过 [M]. 大井笃译. 时事通信社, 1958年
- [90] Robert Butte. 东条英机 [M]. 木下秀夫译. 时事通信社, 1961年
- [91] Leicester Bruches. 终战秘话——帝国终止的秘密战争. 井上勇译. 时事通信社, 1968年



- [92] William Blake. 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M]. 浦松佐美太郎译. 河出书房新社, 1968 年
- [93] 家永三郎. 太平洋战争 [M]. 岩波书店, 1968 年
- [94] 石田雄. 日本近代史大系 8 破局与和平 [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8 年
- [95] 栗原健. 天皇 昭和史觉书 [M]. 原书房, 1970 年
- [96] Arvin Cooks. 天皇的决断——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M]. 加藤俊平译. 产经新闻出版社, 1971 年
- [97] 西岛有厚. 为什么会投下原子弹 [M]. 青木书店, 1971 年
- [98]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 讲座日本史 7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1 年
- [99] 冈义武. 近卫文麿——“命运”的政治家 [M]. 岩波书店 (新书), 1972 年
- [100] David Bergamini (饭田桃译). 天皇的阴谋. 莱奥鲍尔书店, 1973 年
- [101] 大宅壮一编. 日本最长的一天——命运的八月十五日 [M]. 角川书店 (文库), 1973 年
- [102] Herbert Feis (佐藤荣一他译). 原子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M]. 南窗社, 1974 年
- [103] Charles Me. 波茨坦会议 决定日本命运的十七日 [M]. 大前正臣译. 德间书店, 1975 年



- [104] 井上清. 天皇的战争责任 [M]. 大前正臣译. 现代评论社, 1976 年
- [105] 藤原彰. 天皇制和军队 [M]. 青木书店, 1978 年
- [106] 五味川纯平. 御前会议 [M]. 文艺春秋社, 1978 年
- [107] David Titus. 日本的天皇政治——官中职务的研究 [M]. 大谷坚志郎译. 联合出版社, 1979 年
- [108] 池田清. 海军和日本 [M]. 中央公论社（新书）, 1981 年
- [109] 藤原彰. 太平洋战争史论 [M]. 青木书店, 1982 年
- [110] 野村实. 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军部 [M]. 山川出版社, 1983 年
- [111] 藤原彰他. 天皇的昭和史 [M]. 新日本出版社（新书）, 1984 年
- [112] 秦郁彦. 裕仁天皇的五个决断 [M]. 讲谈社, 1984 年
- [113] 荒井信一. 原子弹投下之路 [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5 年
- [114] 藤原彰编. 冲绳战和天皇制 [M]. 立风书房, 1987 年
- [115] 波多野澄雄. 大东亚战争的时代——从中日战争到日美英战争 [M]. 朝日出版社, 1988 年
- [116] 栗原健, 波多野澄雄编. 江藤淳监修. 终战工作的记录 [M]. 讲谈社, 1988 年
- [117] 儿岛襄. 天皇和战争责任 [M]. 文艺春秋社, 1988 年



- [118] 荒井信一. 日本的战败 [M]. 岩波书店 (岩波小册子), 1988 年
- [119] 藤原彰, 今井清一编. 十五年战争史 3 太平洋战争 [M]. 青木书店, 1989 年
- [120] 五百旗头真. 日美战争和战后日本 [M]. 大阪书籍, 1989 年
- [121] Christopher Thorn. 所谓的太平洋战争史是什么——1941—1945 年的国家 [122] 社会以及远东战争 [M]. 市川洋一译. 草思社, 1989 年
- [123] 茶园义男. 密室的终战诏勅 [M]. 雄松堂出版, 1989 年
- [124] 坂本孝治郎. 象征天皇制的实现——昭和时期天皇出行的变迁 [M]. 山川出版社, 1989 年
- [125] 栗屋宪太郎. 东京裁判论 [M]. 大月书店, 1989 年
- [126] 中村政则. 象征天皇制之路 美国大使格鲁及其周边 [M]. 岩波书店 (新书), 1989 年
- [127] 千本秀树. 天皇制的侵略责任和战后责任 [M]. 青木书店, 1990 年
- [128] 渡边治. 战后政治史中的天皇 [M]. 青木书店, 1990 年
- [129] 赤间刚. 昭和天皇的秘密——在地狱中漂泊的天皇裕仁 [M]. 三一书房, 1990 年
- [130] 三田朗. 昭和天皇的战争指导 [M]. 昭和出版, 1990 年



- [131] 藤原彰. 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 [M]. 青木书店, 1991 年
- [132] 藤原彰他编. 彻底验证·昭和天皇“独白录” [M]. 大月书店, 1991 年
- [133] 山田朗, 纈纈厚. 过迟的圣断——昭和天皇的战争指导和战争责任 [M]. 昭和出版, 1991 年
- [134] 大江志乃夫. 御前会议 [M]. 中央公论社 (新书), 1991 年
- [135] 田中伸尚. 档案昭和天皇 第七卷 [M]. 绿风出版, 1992 年
- [136] 吉田裕. 走向象征天皇制 [M]. 岩波书店 (新书), 1992 年
- [137] 中村政则. 战后史和象征天皇 [M]. 岩波书店, 1992 年
- [138] 信夫清三郎. 圣断的历史学 [M]. 劲草书房, 1992 年
- [139] 山田朗. 大元帅 昭和天皇 [M]. 新日本出版社, 1994 年
- [140] 栗屋宪太郎他编. 东京审判之路 [M].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94 年
- [141] 栗屋宪太郎. 未决的战争责任 [M]. 柏书房, 1994 年
- [142] 由井正臣编. 近代日本的轨迹 5 太平洋战争 [M]. 吉川弘文馆, 1995 年
- [143] 纈纈厚. 日本海军的终战工作 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再检证 [M]. 中央公社论 (新书), 1996 年
- [144] 山田朗. 军备扩张的近代史 [M]. 吉川弘文馆, 1997 年
- [145] 细谷千博他编. 太平洋战争的终结 [M]. 柏书房, 1997 年
- [146] 保阪正康. 变幻之终战——如果中途岛海战使战争结束的话





- [M]. 柏书房, 1997年
- [147] 升味准之辅. 昭和天皇及其时代 [M]. 山川出版社, 1998年
- [148] 东野真. 昭和天皇的两个“独白录” [M].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98年
- [149] 松浦总三. “天声人语”的天皇与战争——“神之国”报道研究 [M]. 蜗牛新社, 2000年
- [150] Peter Wetzler. 昭和天皇和战争——皇室的传统和战时的政治军事战略 [M]. 森山尚美译. 原书房, 2002年
- [151] 小林俊二. 对美开战的原因——是什么使日本陷入对美战争. [M]. 南窗社, 2002年
- [152] 山田朗. 昭和天皇的军事思想和战略 [M]. 校仓书房, 2002年
- [153] Herbert Bix. 昭和天皇 下卷 [M]. 吉田裕监修, 冈部牧夫, 川岛高峰, 永井均译. 讲谈社, 2002年
- [154] 栗屋宪太郎. 东京审判之路上·下卷 [M]. 讲谈社, 2006年

### 欧文研究书

- [155] Robert J. C. Buttow.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Cal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156] He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Potsdam



- [157] Conference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58] Harold H. Sunoo. Japanese Militarism Past and Present (Chicago:  
Nelson Hall. 1975)

## 关联年表（1941～1945年）

### 1941年（昭和十六年）

- 1月16日 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与《对支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 1月30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对法属印支、泰施策要领》
- 2月3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对德意苏交涉案要领》（苏日外交调整）
- 3月24日 松冈洋右外相与斯大林会谈（4月12日再次会谈）
- 3月27日 松冈外相与希特勒会谈
- 4月1日 松冈外相与墨索里尼会谈
- 4月13日 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 4月16日 美日交涉正式开始
- 4月17日 大本营海军部初步制定《对南方施策纲要》
- 6月6日 大本营正式通过《对南方施策纲要》（计划建立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军事基地）
- 6月16日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汪精卫）访问日本
- 6月22日 苏德战争开始
- 6月25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
- 7月2日 决定举行陆军、关东军特别大演戏（简称关特演）（为配



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

- 7月2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 7月28日 开始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
- 9月6日 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对英美开战)
- 10月16日 近卫文麿和他第三次内阁全体辞职
- 10月18日 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 11月5日 御前会议通过对美交涉的甲乙两个方案以及《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 11月15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关于促进对美英荷中战争结束腹案》
- 11月20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
- 11月25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从中国撤退
- 12月1日 御前会议通过《战争经济基本方略》(决定对美英荷中开战)
- 12月8日 (凌晨2点)日本陆军登陆马来半岛的哥打巴鲁和泰国的宋卡(凌晨3点20分),日本海军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凌晨4点20分)。野村驻美大使发布通告,停止美日两国交涉(上午11点40分)。公布对美宣战的诏书。
- 12月12日 内阁会议将包括侵华战争在内的战争名字定为“大东亚战争”



12月25日 日军占领香港

### 1942年（昭和十七年）

1月2日 日军占领马尼拉

1月10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关于伴随情势进展的当前施策文件》

1月18日 德意日军事协定

2月3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对德意交涉案纲要》

2月15日 日军占领新加坡

2月18日 日本政府通过《大东亚战争翼赞选举贯彻运动基本纲要》

2月23日 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成立

3月7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4月4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关于印度人的印度东条英机首相谈话》

4月18日 16架美国的轰炸机（B25）对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城市进行初次空袭

4月30日 第二十一次全体选举（翼赞选举）

5月20日 翼赞政治会结成（走向一国一党的状态）

6月5日 中途岛大海战中，日本海军4艘主力航母被击沉

8月7日 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 12月10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关于当面的战争指导上的作战和物资国力的调整并行以维持增进国力的文件》
- 12月21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
- 12月31日 日本政府决定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

### 1943年（昭和十八年）

- 1月14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关于缅甸的独立施策文件》
- 2月1日 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撤退
- 3月1日 大本营海军部决定对苏联保持不抵抗
- 3月2日 公布修改后的兵役法，对朝鲜实行征兵令
- 3月10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缅甸独立指导纲领》
- 3月18日 公布《战时行政特别法》《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经济动员方面首相权限得到强化）
- 4月28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后轴心国战争指导文件》
- 5月29日 阿图岛的日军守备队（约2500人）全灭
- 5月31日 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战略指导大纲》
- 6月25日 动员令（战败为止动员了约300万人的学徒）
- 6月26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菲岛独立指导纲要》



- 9月8日 意大利无条件投降
- 9月30日 御前会议通过了《今后应实行的战争指导大纲》以及《关于右倾当前紧急措施的文件》，设定了绝对国防圈
- 11月5日 大东亚会议召开（日本、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缅甸以及中国汪伪政权等代表参加）
- 11月22日 《开罗宣言》发表

#### 1944年（昭和十九年）

- 2月2日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兼任陆军大臣与参谋总长
- 3月8日 日军开始英帕尔战役（以失败告终）
- 6月6日 反法西斯联合军在诺曼底登陆
- 6月15日 美军占领塞班岛
- 6月19日 马里亚纳大海战中，日本海军战败（丧失三艘航母，及大约430架飞机）
- 7月18日 由于宫中、重臣会议进行打倒东条英机内阁的工作，东条英机内阁全体被迫辞职
- 7月22日 小矶国昭内阁成立
- 8月5日 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更名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试图强化首相对战争指导的发言权）
- 8月19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世界情势判断”以及《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 8月25日 联合国军进攻巴黎
- 9月5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
- 9月23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德国骤变情况下的对外措施腹案》
- 9月28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关于对“苏联”措施的文件（草案）》
- 10月24 日莱特岛海战（日本海军丧失航母三艘、战舰三艘等，共计26艘、战机215架事实上的破坏毁灭）
- 11月21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对印度伪政府指导的相关文件》
- 12月13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现地对重庆工作指导的相关文件》

#### 1945年（昭和二十年）

- 1月11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中国战时经济确立对策》《中国物资调运统一要领》
- 1月18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今后应该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
- 1月25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决战非常措施要领》
- 2月1日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应对情势变化的法印处理的相关文件》
- 2月4日 雅尔塔会议
- 2月14日 近卫上奏（败战必至、主张即时讲和）